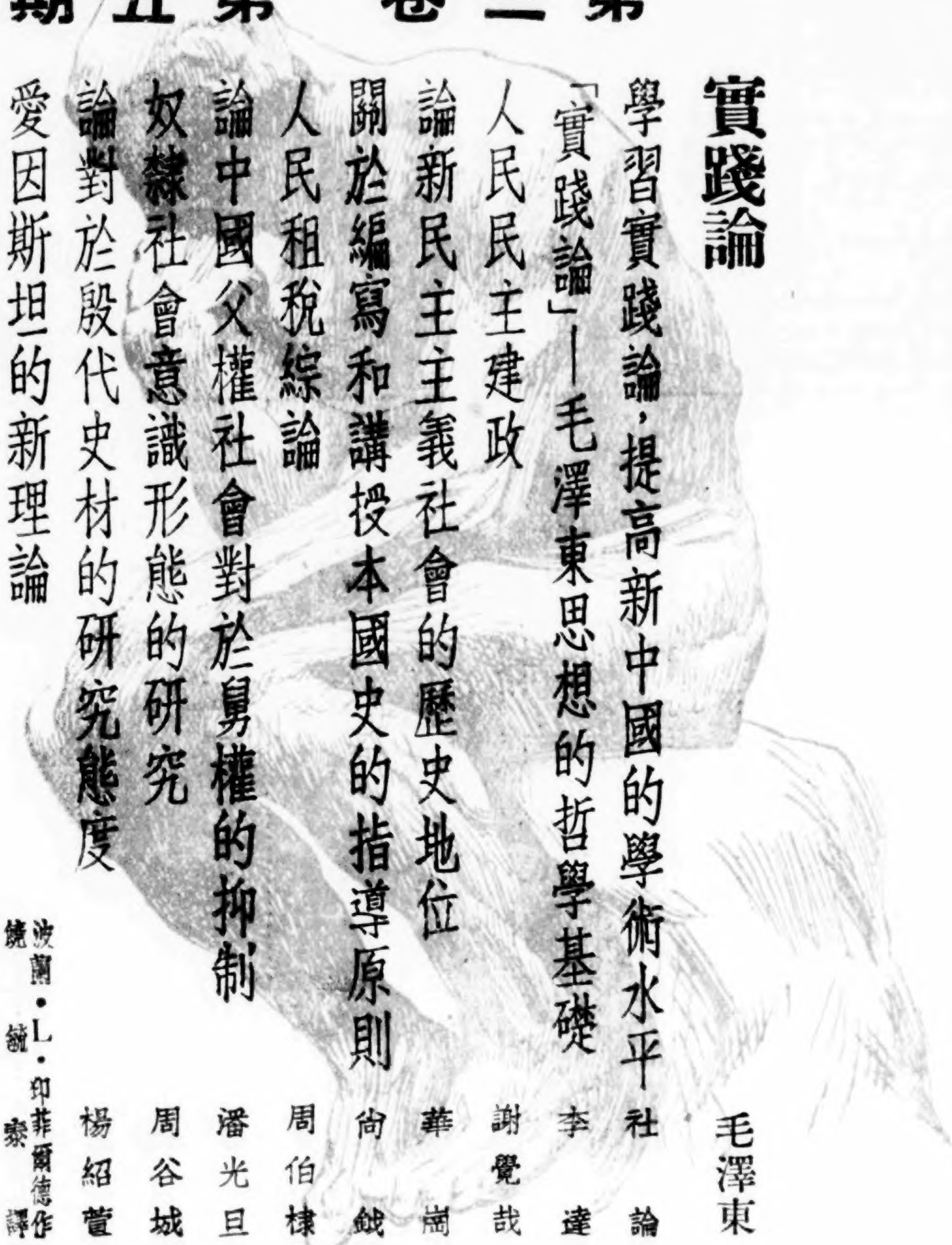
新建設

第三卷　第五期



實踐論　毛澤東

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　社論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達

人民民主建政　謝覺哉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華崗

關於編寫和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　尚鉞

人民租稅綜論　周伯棣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舅權的抑制　潘光旦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　周谷城

論對於殷代史材的研究態度　楊紹萱

愛因斯坦的新理論　波蘭·L·印菲爾德作　饒毓泰譯

新編「哲學史」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李光霖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五十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周刊

世界知識

普及國際時事知識
加強國際主義教育
輔助工人、學生、幹部，
學習的大衆化刊物！

★ ★ ★

國際時事學習資料之六

美帝在西歐的備戰（京版）

薛謀洪作 2,200元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二十

美國的兩極（京版）

趙尙等編譯 2,000元

金圓帝國主義

列昂節夫原著 葛辛譯

這是一本解剖美國帝國主義的、有系統的、完整的著作。概括、提要、深刻透澈是它最大的特點。雖然本書主要部份是分析美帝國主義在西歐的擴展，（原書名金圓帝國主義在西歐），但讀此却使我們對於整個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全面的基本認識。全書廿八萬字，分爲七章，第一二章從縱的方面解剖美帝國主義，駁斥了美國資本主義『和平』長成的神話，從資本主義總危機說到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性，並透澈分析世界主義與種族主義是完全爲美國擴張服務的；第三章歷述美帝怎樣在經濟危機逐漸增大的信號下，步上希特勒的後塵；第四五章分析馬歇爾計劃的經濟基礎和它對於西歐各國的影響，以及美帝發動新戰爭的政策；第七章指出了和平陣營較戰爭陣營爲强大的不可駁倒的事實。在全國熱烈展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今天，列昂節夫這冊有系統的著作，是我們認識美帝的最好參考讀物。（每冊一五〇〇元）

世界知識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人民教育

二卷四期

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的開幕詞……馬敘倫
認識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質……方直
生物科學與愛國主義……周建人
關於工農幹部文化教育的幾個問題……李致遠
中國人民大學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張騰霄等
東北區中等學校採用新教科書的初步經驗……蘇林
各科教學法講座……徐特立
蘇聯高等教育情況介紹……程今吾
性格與性格的培養……包利索娃
蘇聯的初等教育（上）……卡爾波娃
越南民主共和國是怎樣掃除文盲的……黃敏中等
中學語文規律教學的初步研究……郭繩武
問題解答·書刊評介·教育文獻

人民教育社編
北京西城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新建設

第三卷　第五期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實踐論……毛澤東（四）
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社論）……（一一）

·專著·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李達（一二）
人民民主建政……謝覺哉（一六）
從犯罪分類上談肅清舊刑法觀點……王紀新（二〇）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華崗（二三）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尚鉞（三〇）
人民租稅綜論……周伯棣（三四）
剩餘價值說與馬列主義經濟學……王台（三九）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舅權的抑制……潘光旦（四二）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周谷城（四四）

學術討論

論對於殷代史材的研究態度……楊紹萱（四七）
關於「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蔣學模·樊弘（四九）
關於「希臘時代的藝術爲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朱光潛·常任俠（五一）

·譯 文·

愛因斯坦的新理論……波蘭 L.印菲爾德作 饒毓泰譯（五三）
新編「哲學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五七）

學術問答

什麼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聯合國組織與戰前的國際聯盟有沒有不同？聯合國是否也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梁純夫答）……（六四）
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可以實行計劃經濟以避免經濟危機？（季陶達答）……（六五）
我們說，在黑格爾的手上，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馬 特答）……（六六）

·書 評·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李光霖（六七）
——附劉大年答覆

學術文摘

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李四光（七〇）
美國對華侵略的作風和路綫……邵循正（七一）
論民歌……何其芳（七二）

學術簡訊

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新史學研究會編輯中國近代史料叢刊——華東展覽革命文物——上海生物學會舉行第四屆年會——一九五〇年蘇聯學術界兩大討論：「語言學」和「生理學」——一九五一年蘇聯文學出版事業計劃……（七七）
一九五〇年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七三）
編後記……（六六）

實踐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在我們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眞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是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爲着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爲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爲『實踐論』。毛澤東同志曾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大學作過講演。

——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與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與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

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爲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爲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爲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証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証唯物論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强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眞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㊃。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與羣衆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與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與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與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澈底的、誠懇的、與眞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眞實的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眞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爲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

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與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三]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爲：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爲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爲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爲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爲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與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與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四]，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爲『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僞與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與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爲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爲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爲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與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系。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爲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衆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與戰術，因而能夠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爲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爲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與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與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與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與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頓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與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與論理來。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着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爲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爲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顚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㊄。如果以爲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

階段，以爲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眞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他們僅是片面的與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與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物論』與『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眞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與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與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爲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㊅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爲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着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爲眞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發現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爲眞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爲普遍眞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眞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眞理的標準，所謂『實踐是認識論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㊆，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斯大林說得好：『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㊇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覆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

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與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爲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爲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証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與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與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眞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及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與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爲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原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派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眞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

唯心論與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爲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爲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眞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眞理性。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眞理[註]。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証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

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强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與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的時代。

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與發展眞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文內附註：

(一) 此段引自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二) 參看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和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六節。

(三) 此段引自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四) 裏手，湖南方言，內行的意思。

(五) 參看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所說：『爲了理解，必須在經驗上開始理解、研究，從經驗升高到一般。』

(六) 引自列寧『做什麼？』第一章第四節。

(七) 引自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參看該書第二章第六節。

(八) 引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參看該書第三個部分。

(九) 參看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五節。

——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社論

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實踐論」，這是一篇極重要、極光輝的哲學論文。它簡明而精密地分析了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並且具體而深刻地揭露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嚴重錯誤。在這篇論文裡，毛主席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關於認識過程的基本原理，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以及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的基本原理。這篇論文的發表，對於新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是有極大意義的。

學術研究工作，不論多麼高深，就其基本上說來，仍不能不是依賴於社會實踐的。學術研究成果之是否正確，最後也必須從社會實踐中予以檢證。學術研究工作離開了社會實踐，就不能生根，更談不上開花結果。許多人雖然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述，雖然學習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但並不是從實際出發來學習理論，也不是從實際出發來運用理論。很有一些人，還多少抱着「爲學術而學術」的主觀主義的研究態度，甚至不免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片言隻語，去嚇唬別人，像這樣把理論與實踐割裂了開來，就很容易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翼空談主義的毛病，前者把理論變成死的教條，變成脫離實際生活的公式；後者更把幻想看作眞理，也完全離開了當前的活生生的實踐。要糾正這些錯誤，要使我們的理論水平提高一步，我們就得接受「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眞理，我們就得努力學習和潛心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精神，用來做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的指針。

我們認眞學習了「實踐論」，就會更深切地了解「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爲實踐服務」；我們認眞學習了「實踐論」，就能澈底地領悟「一切正確的認識，都必須是在實踐中通過感性的階段而上昇到論理的階段」；我們認眞學習了「實踐論」，就會眞正懂得「通過實踐而發現眞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眞理和發展眞理。」一句話，我們認眞學習「實踐論」，就是爲了使我們可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的科學規律知識，來指導我們的理論學習和研究工作，也就是說，爲了使我們可能從實際出發來學習理論和運用理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把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唯有如此，理論才不是空洞的、而是與實踐相聯系的，同時，實踐才不是盲目的、而是與理論相聯系的。

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的統一，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眞理，就是一切理論學習和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導原則。在今天，對於我們學術工作者來說，它就是一盞照路的明燈。在它的照明之下，我們才會懂得怎樣來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怎樣來研究中國革命的問題；在它的照明之下，我們才能更好地展開與新中國的國家生活與社會生活的發展相適應的思想鬥爭與思想建設的工作，才能使學術研究更好地爲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服務，才能不斷地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

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學術工作者，來熱烈展開「實踐論」的學習運動，努力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共同推進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

專著

「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

李　達

一　「實踐論」——無產階級實踐的哲學

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馬列主義實踐理論的發展，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它是中國革命行動的理論，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的科學總結。

「實踐論」特別指出辯證唯物論兩個最顯著的特徵，即階級性與實踐性，表明了辯證唯物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它首先說明實踐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爲認識主體的人是屬於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的人，是屬於特定社會的特定階級的人，而人的實踐，也是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的實踐是生產和階級鬥爭。人類對於自然和社會的認識（知識），對於階級社會的規律性的認識，都是在生產和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得到的。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這樣指出過：「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所以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的精神，貫串於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鬥爭的領域，因而，關於經濟政治及文化領域的知識，「無一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類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知識的歷史，適應於社會實踐發展的歷史，「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在近代大工業發達而無產階級展開階級鬥爭的時代才形成的。正因爲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鬥爭中鍛鍊起來的，所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它的眞理性，首先由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了。

列寧說過：「認識是面向着眞正存在的東西，這東西是對主觀的意見獨立地現存着的現實性。人類的意志以及他的實踐之所以不能達到目的，是因爲它把認識和自己分開，把外的現實性不當作眞正存在的東西來看待。認識和實踐的合一是必要的」。毛主席的「實踐論」，正是發展了列寧的這一論點，在「實踐論」中首先指出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從毛澤東同志這樣的結論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人們的認識，是從實踐發生而又復歸於實踐，認識必定不能離開實踐，實踐又必然地滲透於認識當中。

無產階級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是和無產階級分不開的。馬克思說得好：「哲學在無產階級之中找到了它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在哲學之中，找到了它的精神武器。」所以，這一哲學是當作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武器，在無產階級鬥爭中，由馬克思所創造所鍛鍊出來的，它爲着無產階級，並專屬於無產階級。它是一種既具有實踐性又具有階級性的科學。倘若有人把辯證唯物論

單純地當成一門書本上的學問，那便是根本不懂得無產階級哲學的物質基礎，因而也就永遠不會明白辯證唯物論是戰鬥唯物論；同樣，倘若有人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單是主觀地企圖盜用無產階級的武器，那也就是永遠做不到的事情。

一九四七年，在解放戰爭期中，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指出人民解放軍所以打敗蔣匪幫的主要方法之後，接着說：「蔣介石匪幫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毛澤東同志的這樣的論述，正是論證着無產階級的軍略思想，是有着高度的實踐性和階級性，其他階級是不能盜用的。

「實踐論」正是這樣軍略思想的哲學基礎，因而「實踐論」也就必然是無產階級的實踐的哲學。

二 「實踐論」——論證了實踐是眞理的唯一標準

認識是否是眞理，要拿什麼標準來鑑定呢？這鑑定的標準，只是實踐。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裡，特別强調了這一點。早年馬克思指出過：「關於離開實踐的思惟是不是眞實的論爭，乃是一個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企圖在實踐以外，提出「客觀的眞理，是否符合於人的思惟」這一問題，乃是煩瑣哲學，那是資產階級御用學者的工作，我們不但要鄙棄它，而且要打擊它，鬥爭它。讀過了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便可以透澈地了解，只有實踐才能證明認識的眞理，糾正認識的錯誤。列寧曾不斷地指出過：「人類和人類一般的實踐，是認識的客觀性的檢驗和規準」，只有「實踐才提供着眞理的客觀標準」。斯大林也指出過：「科學所以叫做科學，就是很仔細地傾聽實踐的呼聲，所以；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認識了中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這一認識的眞理性，已由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兩年來新中國建設的成就完全證明了。又如毛澤東同志在領導反帝的鬥爭中，分析目前國際間的情勢，估計中國人民的力量，認識美帝內部各方面的矛盾，就斷定美帝是一個紙老虎。這一認識的眞理性，也由中國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在朝鮮粉碎美帝侵略軍戰爭，完全證明了。所以實踐所證明爲眞理的那種認識，又反過來能够指導實踐，在這裡也得到了說明。

爲什麼只有實踐纔是認識的眞理性的唯一標準，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標準呢？這有兩個理由：第一、認識從實踐發生，爲實踐服務，是實踐的一個因素。我們做某種工作，遇到困難，發生了問題，於是就想辦法，認識這困難的癥結所在，就依照這一認識的指示去做，困難果然克服了。這一認識便是眞理了。我們修復淮河大橋時，困難重重，但我們運用科學的知識，定出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照着去做，這大橋便勝利地完成了。這淮河大橋的完工，是我們人民實踐的產物，而我們對於這大橋所運用的知識（認識），就體現於這大橋之中。這表示着知識是實踐的成分，並與實踐相統一。第二、認識離開實踐，就失其社會的意義。認識是意識的活動，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假使人們物質的生產的實踐，一經停止，社會生活就跟着停止，意識的活動也失其存在了。所以，眞理的標準，只是實踐。

馬克思說：「人的勞動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又說：「在勞動過程終結時出現爲結果的東西，即是在開始時已經存在於勞動者的印象中，因而已經存在於觀念中的東西，他不單使自然的形態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之中實現自己的目的——他所意識着並當作規律決定其行爲種類的並使自己意志隸屬於它的那種目的」。這即是說，人要製造某種東西，就必須對操作的對象與工具有充分的研究，預先在頭腦中擬好圖案，然後按照去實現它。所以；我們要從事於物質的生產，或實行階級鬥爭，或做科學的實驗，必先就各種客觀條件，做詳細的研究，有了明確的認識，然後照着去做，以期達到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只有這樣，我們的認識纔會發生力量，纔能指導實踐，增加我們勝利的信心和勇氣。

但是，人們的認識常有因爲不能正確地反映外界事物的規律性，以致引起實踐上的失敗，不能達到預想的結果。譬如；罷工鬥爭、軍隊作戰、民族革命都不能取得勝利，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只是因爲人們的認識沒有按照外界過程的實況去反映這些過程的規律性，所以在實踐活動中都不能達到預想的結果。人們要想在工作中達到預想的結果，必先正確地認識外界的規律性，然後適應於這種規律性去工作，纔能勝利地成功，否則便招致失敗。但「失敗是成功之母」，中國人民革命的戰爭，曾經歷了大小若干次的勝利與失敗，而由於人民

領袖毛澤東同志能够吸取這些次勝利與失敗的經驗，逐步認識了這一革命戰爭的發展規律，改正戰術與戰略，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

還有，爲眞理之標準的實踐，完全是客觀的。我們依據對於某一自然物的認識去改造它的時候，若能達到豫想的結果，這認識便是眞理，反之便是謬誤。眞理與謬誤，由實踐來鑑定，完全是客觀的，絕不雜有主觀的成分。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哲學，實驗主義，主張主觀的眞理論。它把效用的有無，作爲眞理的標準，主張任何概念，任何謬論邪說，任何神鬼的概念，只要某一階級某一個人在主觀上認爲於實踐上有效用，便是眞理。這種主觀的眞理論，一直爲美帝所利用。所以，美帝對於侵略戰爭、殺人放火、鍊血成金等理論，都認爲是眞理，因爲它們是便於增加利潤的。辯證唯物論與實驗主義完全相反。辯證唯物論認爲凡是由實踐證明爲眞理的東西，都是有用的，而有用的東西，不一定是眞理。美帝的侵略論，雖便於美帝增加利潤，難道它還能算是眞理麼？

總之：眞理的標準只能是實踐，此外別無標準。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極其精闢地論證了這一點。

三　「實踐論」——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的認識論

列寧說過：「從活的直覺到抽象思惟，從抽象思惟到實踐，這是認識眞理的辯證法的路程，是到達於客觀實在的認識路程」。「實踐論」發展了列寧這一原理，把由感覺（直覺）到思惟和由思惟到實踐這兩個過程，分別地作了透闢的說明，在由感覺到思惟這一認識發展過程中，指出感覺是認識的低級階段，思惟是認識的高級階段，前者是感性認識，後者是論理認識或理性認識。在前一階段，只看到事物的現象，外部聯繫，在後一階段，却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內部聯繫。只有從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人們纔能發見事物的規律性，引出論理的結論。但這兩個認識階段，並不互相獨立，互相隔絕；兩者的差別，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兩者互爲條件，互相滲透。所以說，「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不懂得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法的聯繫，把兩者切離開來，各執一偏之見。唯理論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所以它流於主觀主義；經驗論只承認經驗（感覺的重復）的實在性，所以它流於庸俗事務主義。

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從實際出發」，「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客觀眞實情況出發」，就是從感性認識的材料出發。革命工作者担任某一任務時，必先調查「周圍環境」以及和這一任務有關的一切條件，搜集有關的一切材料，吸取羣衆的經驗，詳細調查各階層的生活及其相互關係，即「詳細地占有材料」，作爲「了解情況」的根據。於是我們來了解這些材料，進入思惟過程，運用思考能力，就所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僞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改造製作工夫」，「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爲行動的嚮導」。這便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

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主持農運工作，了解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認識了廣大農民羣衆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他早已建立了革命政權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理論。他爲了認識農民的革命力量，於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二月，就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典型縣農運情況，作了系統周密的調查，分析了農民各階層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認定農民有莫大的力量能「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路上迅跑」。所以；依靠並發動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的反封建主義的革命理論，早在那時候樹立了。

「實踐論」分析了由感覺到思惟的認識過程以後，接着分析由思惟到實踐的認識過程，即由理論到實踐的過程。關於革命具體環境所得的理性的認識，即是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只有在革命的實踐中得到了證明，才是眞理。所以，毛澤東同志說：「眞正的理論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在這裡，「實踐論」發展了馬克思所說的「哲學的任務不是各色各樣的說明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這一原理，主張我們的認識不僅以曝露客觀的規律性爲滿足，而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接着；「實踐論」更進一步發展了列寧「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的學說，發揮了理論對於實踐的重要性，進而說明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問題。理論由實踐發生，仍須回到實踐中，由實踐來證明。由實踐證明的理論，才能組織實踐推動實踐。所以理論與實踐兩者形成爲統一，其統一的基礎是實踐。

此外毛澤東同志對於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的關係的問題，也做了精闢的論述。從他的論述裡，我們可知道：客觀世界是可以完全認識的，這是客觀的眞

理。世界既然可以完全認識，人類就能達到於絕對眞理。但客觀世界，我們不能一次地完全地無條件地認識它，而只能近似地有條件地逐漸地去認識它，即只能是相對眞理的認識。隨着社會實踐的世代綿延的發展，人類一步又一步地認識世界的新方面，即由低向高地到達於各階段的相對眞理的認識，這各階段的相對眞理，匯成爲「絕對眞理的長河」，而絕對眞理成爲相對眞理的總計。

人類社會都要到達於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在百年前認識人類社會所得到的結觀。這一結論是客觀的絕對的眞理。由於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努力，已經逐步接近於這一絕對眞理了。蘇聯勞動人民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已表示着即將到達於這一絕對眞理；中國和許多人民民主國家正在向它邁進着。世界勞動人民在改造世界的鬥爭中，一面改造世界，同時又改造自己的本性，「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關係」，「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與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四 「實踐論」——革命行動的指針

「實踐論」在最後對我們特別指出思想與實際的統一聯繫的問題，本來人類的認識，常是適應於客觀世界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的。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基於當時革命的具體形勢的正確認識而擬訂的策略、計劃、方案等，在當時革命具體形勢沒有顯著變化時，只要是具備了適當的條件，是可以達到預想的目的的。但到革命的具體形勢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時，那就必須分析當前的形勢，來決定新的任務，因而從前的策略、計劃、方案就必須加以改正，才能達到預想的新結果。

革命的形勢是不斷發展的。毛澤東同志最善於應用辯證唯物論的武器，對於新鮮事物有敏銳的感覺，不斷地從分析新的形勢中「找出方針，制定政策，拿出辦法來」。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說明着這一事實。

我們知道：馬列主義的理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鎖鑰，而作爲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實踐論」，自然就是指導中國革命行動與建設新中國的總指針。在現在，中國人民正面臨着一個新興的時代，一切都隨着時代的發展而滋長着。新時代必然帶來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產生着新問題。我們爲要向前看，爲要使主觀不落後於客觀，爲要使思想不落後於實際，爲要使思想能與實踐相結合，那就必然勇於正確認識新事物，善於解決新問題，不能讓認識落後於形勢的發展而鬧倒車，不自覺地墮落爲頑固派。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批判了這一點，指示給我們奮鬥的方向。

同時，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同志又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這是主觀認識超過於客觀實踐的發展，這和上邊所指出的錯誤，雖然是由不同的兩極出發，但在本質上都同樣是唯心的，都不合乎「實踐論」。像這樣的兩種錯誤，必須加以糾正。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我們的結論是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是「實踐論」在最後給我們最大的啓發和鼓勵。當前的國際間的和國內的形勢，也確切說明了這一點。在一九五〇年，中國人民剛一展開抗美援朝的運動的時候，國際間的形勢是另一種樣子，而今天的形勢大不相同了。在去年三四月間，國內的經濟情況是那麼一種形勢，而今天也大不相同了。我們面對着這些新形勢、新事物、新發展，那就必然要在實踐中把認識不斷地提高。因爲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我們的身上。

在現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新中國，一切都在飛躍地前進着。這時倘若我們不能掌握「實踐論」中所指出的革命原理，對新鮮事物缺乏感覺，或讓「勝利沖昏頭腦」，那便必然會犯右傾機會主義或左翼空談主義的錯誤。這兩種錯誤都是在認識過程中把認識和實踐相分裂，其結果對革命是有害的。土改中「和平分田」或「亂打亂鬥」；生產競賽中單純地顧量不顧質；教學工作中只扣書本不顧時事，那都是不對的，那都是從主觀主義出發，那都是違背了「實踐論」。所以說，我們爲要保持認識與實踐經常一致，少犯錯誤，那就必須透澈地領會了「實踐論」中的革命原理，掌握了「實踐論」中的革命原理。

蘇聯眞理報鄭重指出：毛澤東同志這一著作，是「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的基本原理、關於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和關於革命理論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的意義的基本原理」。我們非常同意這樣的指出。的確，「實踐論」是一個極其富有指導意義的革命文獻，它是毛澤東同志長期革命經驗的科學總結，在這裡綜合了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指導原理，在今天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當中，在全國人民積極從事生產建設和通過自我教育要求改造聲中，「實踐論」的發表是值得我們歡迎的，我們應當把它當爲一個革命行動的指針來學習，應當認眞地當作一個任務來學習。

人民民主建政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聯合辦事處的講演——

謝覺哉

不久以前，在中央內務部召開的全國民政會議上，我作了一個報告，講人民民主建政的問題，曾在報上發表。今天我不想重複民政會議上所講的。想講下面四個問題：一、政權是什麼？二、人民民主與資產階級舊民主的基本區別。三、對舊民主制度的批判。四、目前全國民主建政的情況。

一 政權是什麼？

政權、國家、政府……不管叫它作什麼，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社會中，壓迫階級用來統治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同一類型的社會，都是剝削社會，其區別只是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都是剝削階級統治被剝削階級。除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以外，一切政權的本質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專政，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專政的工具就是軍隊、警察、法律、監獄，和官吏等等，資本主義加強了這個專政工具，集中的軍隊和官僚制度，是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日趨完備的。古書孟子上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是貴族，野人是農奴，在他們看來，勞動人民天生成是供剝削的。禮記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見刑是專門對付被壓迫階級的。剝削階級管理政權的形式，花樣很多，還在奴隸制度時代，已經有過君主政體和所謂共和政體。封建制度時代，也是如此，我國西周時代，就有過「周召共和」的事，但不管採用什麼花樣，本質總是一樣，總還是剝削階級的政權。列寧說：「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全體，但仍然是奴隸主的全體，是奴隸除外的全體。」恩格斯說：「給與公民的權利是跟他們的財產狀況相吻合的，在封建國家裡面，政治地位是由所有土地的多寡來決定，這不啻正面地宣稱，國家乃是有產階級用以保護自己以防無產階級的組織。」資本主義社會，給這種明顯的統治加上一層欺騙，說甚麼「人人可以參政」、「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甚至宣佈普選權。為什麼要如此呢？因為資產階級當其反對封建制度時，要動員全體人民的力量去作戰，而結果，只不過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已。斯大林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民主，只不過是「加上強力壓迫的『民主』欺騙；以『民主』欺騙為掩飾的強力壓迫，」而已。這種欺騙，也會生過效，但一到欺騙生不了效時，本來的猙獰面目就出現了，這就是近代帝國主義走向法西斯的原因。資產階級當年反封建時，用過「民主自由」的口號，現在嫌這些束縛自己了，嫌人民用民主自由來反對它，于是，連形式的自由也取消了，公開走向法西斯了。

十月革命帶來了一個根本的變化，產生了社會主義社會，被剝削者當權了，掌握政權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多數人來統治少數人。勞動人民成了統治者。政權變了，眞正的民主出現了。中國人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還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階段。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各民主階級合作，但和歷史上階級社會不一樣，它不是反動的剝削階級當權，而是人民當權，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而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在人民內部，是民主的，而對于過去壓在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個敵人，則是專政的。

所以，政權是掌握政權的階級壓迫敵對階級的機器。誰掌握了政權，政權對自己就是自由的、民主的，而對自己的敵人，則是專政的。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一定要將這種專政的情況掩飾起來，而打着「民主」的假招牌呢？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又一定要公開宣佈是人民民主專政，要明白地說，而且說得愈透愈好呢？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這些少數人的生存，要依賴於多數人的勞動，他們的政權，目的就是為着維護他們少數人合法地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所以他們不敢明白地說：「我對你專政，」他們有講不得的苦，講穿了，人民就會拆他的台。我們就恰恰相反，我們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而這些少數人，這些壞傢伙，這些帝國主義勢力、地主階級、官僚資

產階級、以及作爲他們的代表的反革命份子，對於我們的國家與人民是一點好處也沒有，消滅得越乾淨越好。該鎭壓的鎭壓，能改造的改造，直到反動階級全部消滅爲產階級，以止。

二　人民民主與資產階級舊民主的基本區別

人在社會上需要生活，民主對人的生活有幫助，才會受到歡迎。反之，便不受歡迎。資產階級歡迎資本主義式的民主，一羣資本家或其代理人坐在一堂討論怎樣增加自己的錢袋與奪取他人的利益，自然認爲必要而說它是「永恒眞理」。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則對之不感到興味，選舉只不過幾年決定一次誰來當權剝削自己而已，投票與不投票都一樣，在這樣的「民主」下，勞動人民只是待宰割者，如他們也感到興味，那才是怪！中國資本主義很落後，有的是官僚及依附官僚的大小政客和流氓。中國也搞過國會、省議會、及蔣匪的「國大」等，流氓政客，如蟻趨羶，希望得點嚼頭，廣大人民知道是害他們的，只有厭惡與反對，絕不對他們寄托任何希望。這裡說明民主應先看實質，而不是止看形式。

把蘇聯憲法和資產階級的憲法拿來比較一下。資產階級的憲法說得很漂亮，甚麼人權宣言、議會制度、人民權利平等……等等。實際有甚麼，說不出！蘇聯的憲法規定人民有勞動權、休息權、享受物質保障權、受教育權……等等。任何人都有權受教育、有權工作、遭受災難有權受國家和社會的救濟，而且這些都有物質保證。是已經做到了的，把它寫出來鞏固到憲法上。人民必須在經濟上有了民主，然後對政治上、文化上的民主感到興味，然後才有眞正爲人民服務的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民主，才能使人民的經濟生活更加發展和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艱難困苦中創立起來，過去長期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摧殘與壓榨，當然目前人民生活的水準不能和蘇聯相比，但一年以來壓在地來經濟建設上的成就是很大的，我們實行土地改革，幾千年主封建制度下的幾萬萬農民，得以翻過身來，建立起自己勞動自己享受的社會，這是天大的民主。我們穩定物價，使在反動政權下長期受通貨膨脹之苦的人民，生活得到安定。我們救濟災荒，發展生產，興修水利，使今年全國大部分地區獲得豐收。我們又撥了很大一筆款子，救濟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並且設法使他們就業，失業已日漸減少。我們解放一個地區，把舊有工作人員「包下來」，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不使他們失業。對於私營的有益國計民生的工商業，設法幫助他們，使在反動統治下極端蕭條的現象，很快成爲過去。一年來人民政府做的工作，處處是爲人民打算。收到的成績很不小。這是眞正的基本的民主。由此人民生活改善了，人民的文化要求就自然提高，現在的文化面向工、農、兵，一年來也收到了很大的成績。以前政府裡作事，是陞官發財，現在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是爲人民服務，雖然現在只保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們十分明白，只有人民經濟的發展，才有其他一切。

經濟上的民主是基本的，但還得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保障，要政權組織搞得好，所有人民認識政權是自己的，積極參加政權的建設工作，發揮他們共同的智慧與力量，各種建設才會有更大的成績。經濟上的民主，是統一戰線的，反映在政治上，也是統一戰線的，我們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聯合所組成的統一戰線的政權，這樣廣泛聯合各民主階級的聯合政權，歷史上還未曾有過。

這種政治上的統一戰線，不是散漫的無組織的集合，它必須有領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沒有澈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勇氣，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今天的中國，只有領導人民進行了多年激烈鬥爭，戰勝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匪幫的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領導中國走向無限光明的前途，他們的組織性、團結力、大公無私的精神，和革命的澈底性，使他們具備了領導的資格。我國的工農，佔人口的最大的比重，他們是一切社會生活的創造者，依靠他們，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才能建設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事業。所以共同綱領上明白規定：「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毫無疑問了的。有人問：將來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是還要採取激烈手段呢？我們回答：業已取得國家領導權的工人階級，正在創造條件和其他人民一道進入社會主義。今天在一道的，對人民有貢獻，進入更好的社會時，人民仍然將歡迎他們，只要他們不反對人民，而是同人民一道。如果有，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武器，也就不怕誰造反了。

我們是聯合政府，人民政協文件就是我們的憲法。任何事都照着共同綱領的規定來作。

幾個階級的聯合，中間是不是有矛盾呢？回答是：矛盾是有的，但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因爲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

義，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新國家，乃是我們共同的目的。達到這個目的的辦法，也是共同的，而且定成了共同綱領。在共同的利益之下，總的目標之下，照顧到各方面，解決各種不同的要求。依據經驗，解決的方法就是協商。

去年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階級、各黨派、各界、各地區、各民族的人都團結在共產黨的週圍。他們有共同的目的，又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要求，在製定共同綱領時，考慮周到，顧到總的，也要顧到個別。凡是問題，儘量討論，反覆討論，分小組討論，對的意見加以採納，不對的加以說明，最後乃求得全體或絕大多數一致的通過。 這種方法比舊的不作充分協商只靠簡單表決的方法好得多。資本主義的表決方法，少數人操縱着多數， 表決只是形式，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數要服從多數，同時多數又照顧少數， 少數的意見經過協商，能採納的均盡量採納，所以到最後，意見常得一致。

協商的方法推行到省、縣、市的人民代表會議，某省一位代表說：「我在未參加會議以前，我很懷疑報上說的一致贊成是民主，世上那有這樣的事，這回自己參加會議才恍然大悟。知道這樣的民主，才是眞正的民主」！

人民解放軍初解放的地區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一種協議性質的會議。開過幾次會以後，便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軍事行動完全結束，土地改革已徹底實現，人民有了充分組織的地區，便實行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步驟是非常切合實際的，因而也是非常民主的。也許有人說人民政府還沒舉行普選，不民主；實則如果現在就急於普選，倒是不民主。在反動派統治了很久的地方，解放軍剛去，土匪特務尙未肅清，人民還沒有組織起來，人民不完全了解我們，我們也不淸楚情況，我們雖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對當時當地人民利益的具體要求尙未充分具體地了解，因而也就未能系統地解決，這時即行普選，不會有好結果。我們的方法，這時，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使政府和人民逐漸加強聯繫，等到多開幾次會，人民組織已建立，人民的覺悟已提高，就可經上級批准，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選舉人民政府。

但還不是馬上就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既可由各界選舉或推選，又可由政府特邀，這樣，就可保證代表的廣泛性，他們來自人民的各方面，實際上代表各方面人民的利益。

只看去年的人民政協會上，有許多代表講話，戲劇界代表周信芳說：「封建統治者從來看不起幹戲劇的。所謂「倡優隸卒」是聯在一道的，從滿淸皇朝、北洋軍閥到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的統治，一貫的壓迫戲劇工作者，他們糟蹋我們，今天我們幾個舊劇工作者也被邀請來參加這一個曠古未有的開國盛典，有機會參加這樣偉大的人民建國事業，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要從我們算起」。戲劇是人類生活裡一件極大的事，而從來却把劇人當作無關輕重。要憑選舉，當時恐很難選得出來，舉此一端，可知我們的代表雖不是經過選舉，但比選舉要好得多，沒有遺漏那一角落的人民，自然就不會忽視那一角落的人民的利益。我們的代表：一方面由各黨派、團體、地區、民族推選，一方面由政府特邀。這個方法歷史上未有過，而現在產生了。

另外，代表的嚴肅性，也是要注意的，不容許反人民的份子混進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的代表性，也要加強，使代表眞正成爲各階層人民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這些都不是一開始就可以搞好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這樣的制度，就便於使我們在歷次的會議中，加以不斷的改進。

現在，有些老區的縣或鄉，已進行選舉，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但也不是一定要多少公民才選出一個代表，不一定要經過像資本主義那樣繁重而形式的手續。人民要求的是會議能解決問題。代表能代表大家的意見就成。我們的民主是實際的民主，假如要以資產階級的腐朽的形式主義的觀點來衡量我們的制度，就容易發生錯誤。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過時了，落後了，而我們是不斷地前進。

普選制度，像蘇聯現在所採取的，我們也必要採取，但現在我們還沒有實行這樣制度的足够條件。

三　對舊民主制度的批判

我想把舊民主裡面的幾個東西，提出來說一說。中國過去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比資產階級制度的社會落後，某些知識份子曾對資產階級的那一套，發生過興趣。現在我們不採用它了。有些人也許還有些留戀。所以需要提出來說一說。

（1）三權分立制。這是資產階級用來騙人的。在階級社會裡，那一個階級掌握政權，政權就是他們的，祇有一權沒有三權。過去書上也講過：「統治權不可分割」。那有所謂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分立的理？三權制是歷史上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爭權的時候產生的。那時資產階級有錢，皇帝向他們要錢，他們便要過問政治。說「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皇帝拿不到錢，只好讓步，這就叫做立法權。立了法，皇帝不遵守怎辦？于是提出法律高于一切，誰都要遵守，法官問案，皇帝不能干涉，這就叫做司法權。但皇帝仍保留他的行

政。後來資產階級革命，有的國家革得澈底，法國的皇帝上了斷頭台，美國都是移民，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封建制度。「一統江山服晉朝」，資產階級獲得了全權，爲甚還要保留三權的形式呢？其理由是這樣：一、可以調劑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在議會裡吵一吵，同時保持政府行政獨立的一方面，如議會內吵得開不好交，行政上又可以調劑調劑。二、各派資本家都可以養一批政客，一方面免得他們在社會上鬧事，一方面又替自己分贓。三、還有最大的理由，可以欺騙被剝削人民，好像他們很民主，互相制約，絕不專制，以掩護他們比獨夫專制利害萬分的少數資本家的專制。

有些舊概念，在我們這裡根本不存在。比如立法與行政方面的矛盾及其制約與調和，資產階級學者說過不知多少，而在解放區發展的歷史上，連端倪都找不到。毛主席在全國委員會第二屆會議上說：

「這種總結經驗和決定方針的工作，是我們大家一齊來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來做的。……這樣，我們就能集中廣泛的意見，檢查過去的工作，決定今後的方針。這種方法，我希望我們以後繼續採用，並且希望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採用這種方法。我們的會議，在暫時還是建議性質的會議。但實際上我們在這種會議上所做的決定，中央人民政府是當然會採納並見之實行的，是應當採納並見之實行的」。

建議性質的會議，尙且如此，不用說正式的人民代表大會了。我們的代表大會制度，就是立法與行政一致的制度。

又如舊的法學家特別關心的所謂不受行政干涉的司法獨立，解放區則自有司法以來，從沒有過司法要正當判決而行政要使他不正當判決的事，相反，行政負責幹部常常是幫助司法負責幹部使之判決適當，以提高司法在人民中的威信。司法本來是行政的一部分，任何法律，主要依靠行政去積極使之實行，而不能單靠法院消極去「司」他，資本主義的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就未會做到過，至多只不過做到「審判」獨立而已，而我們則審判也是由法院或人民法庭去進行的，這不是什麼司法獨立，而只是整個政權機關的一種分工而已。這都是很明顯的現實。人民的政權，是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權的性質根本不同的，如還拿舊概念來測量，那叫做無的放矢，也可說是荒謬了。

（2）政黨政治。有人說政黨政治最好，這黨當權，那黨在野。在野的可以批評當權的，並準備自己在下次也當權，豈不是很民主麼？其實，所謂「政黨政治」也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產物，說得再早一些，還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鬥爭時的產物，英國最初產生王黨與民黨，王黨代表封建勢力，民黨代表資產階級，以後轉化爲保守黨與自由黨。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起源於南北經濟的分歧，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產生兩黨的制度，各黨爭權，藉議會作戰場，以調協內部的矛盾，避免隨時暴發內戰的危險，同時，又可以欺騙人民，似乎只要通過已有的兩黨制度，就可以解決一切的政治問題，藉以阻止無產階級政黨的興起，而到了後來，所謂兩黨也者，只不過都是金融財閥手中掌握的兩個政治玩具而已。他們都是一樣的反動，一樣的仇視人民，有時候沒有政見的紛歧，有時候雖有紛歧，只不過各人爲統治階級的打算各有不同吧了，這種情形，連英國今天的工黨也是一樣。因此，資產階級的所謂的反對派，是他們內部的反對派，他們不許有在它階級之外的「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對派存在。例如：美國的共產黨被抓去坐牢，法國共產黨勢力比較大，國會裡也有許多共產黨議員，資產階級的黨派便聯合起來反對它。

此外，還有很多問題，如中央與地方制度、選擧制度、人事制度等，都與舊民主不同而優於舊民主。有的我們已刱造，有的還正在刱造。

四　目前全國民主建政的情況

大革命失敗以後，我們搞人民革命，凡已建立政權的地方，都開過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或參議會。但因爲是戰爭環境，這種會議制度常不能成爲經常的。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全國大部地區解放，召開各級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成爲全國性的運動。截至現在止，全國二十八省、八個相當於省的行署，已開過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有：吉林、松江、黑龍江、遼東、熱河、河北、山西、察哈爾、山東、浙江、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廿省，行政區已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有：蘇南、蘇北、皖南、川北、川西、川東、川南等七行政區，全國二〇六九個縣，今年七月民政會議時，開過縣各界人民會議的有一七〇七縣，至現在根據二十六個省、六個行政區、一個自治區（缺貴州、西康、川南、川東報告）的統計一九〇七個縣旗，開過縣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有一八〇〇個縣旗，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三。全國三萬人以上的城市，大都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鄉則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普遍都開了，新區也有些在召開。縣市鄉有些已代行了（下轉29頁）

從犯罪分類上談肅清舊刑法觀點

王紀新

一

一年餘以來，公安司法部門處理各種刑事案件，在犯罪分類上，開始是很不統一的，有的把犯罪分成十幾類至二十幾類，有的就分成六七十類以至一百類左右。分類多少，暫置不論，問題在於從這些分類中，我們看到依據舊刑法的成分都相當大，特先提出研究。

我們知道：國民黨反動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公布施行的「刑法」（以下簡稱僞刑法，以別於一般舊刑法），分總則、分則兩編，總則共十二章、九十九條，分則共三十五章、三百五十七條。分則是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各地依據舊刑法的重點，就是在因襲僞刑法分則方面：分類少的，只是對三十五章所舉犯罪類型的删減合併；分類多的，則是把三百五十七條中的某些具體罪行和三十五章中的某些類型，並列起來。例如：個別地區的人民法院，在前年一至二月，分刑事案件爲殺人、傷害、烟毒、擾亂金融、妨害風化、妨害自由、竊盜、詐欺、侵佔、妨害家庭、共他等十一類，三月加貪汚、僞造印文、賭博、贓物、漢奸、遺棄、毀損等七類，四月加强盜一類，六月加公共危險、虐待、特務等三類，七月加妨害秩序一類，除「共他」一類外，前後共二十二類，一直援用到去年二月。二十二類中，除特務一類是新加的、漢奸一類另見僞「懲治漢奸條例」外，其中二十類中，十八類和僞刑法分則相同（有個別是簡稱的，如「詐欺」是「詐欺背信及重利」的簡稱，「毀損」是「毀棄損壞」的簡稱；有個別是改稱的，如「貪汚」是「瀆職」的改稱——其他地區也有不改稱的），僅「擾亂金融」是「僞造貨幣」和「僞造有價證券」的合稱（其他地區有仍然分稱的），「虐待」是從「傷害」中分出的（其他地區有仍然不分出的）。

又例如同一地區的公安機關，自前年二月至去年八月，刑事案件分類由四十多種陸續增加到一百種左右，其中除去有的屬於「違警」範圍（如「妨害交通」、「漏報戶口」、「妨害戶政」、「行爲不檢」等），有的是同罪異名（如「隱匿武器」與「匿槍不報」、「過失殺人」與「過失致死」等），有的還不能確定爲犯罪（如「可疑」、「運物可疑」等），可以不計外，餘下還不下六、七十種。這六、七十種，有一部分和法院一樣，相同於僞刑法分則類型；另一部分則是類型中所包含的具體罪行：如「强姦」、「誘姦」、「通姦」、「姦拐」等，包含於「妨害風化」和「妨害婚姻及家庭」，「傷害致死」包含於「傷害」，「過失殺人」包含於「殺人」。

像這樣的犯罪分類我們舉的例子固然是個別地區的，但其他地區的司法公安機關頗多類似的情形。當然，我們不主張廢除一切法律上習用的術語，而使人民的某些法律概念，在表達上發生困難。可是，必須分清：沿用某些習用法律術語和因襲反動法律觀點或法律體系，是完全不能牽强比附的。我們若是把僞刑法分則和前述許多地區的刑事案件分類放在一起，對照審核一下，就會發現，那不簡單是什麼術語的沿用，而値得檢討的是其中多少有舊的觀點、體系的因襲。

祗要把僞刑法分則所舉各種犯罪類型及其條文中所規定的各種具體罪行，聯系僞刑法總則精神，加以綜合考察，就不難認識：它是一部極反動的刑法，連一般資產階級反動刑法裡假裝照顧一下勞動人民的僅有遮羞布，如規定某些破壞「保護勞動」的罪行及輕微處罰，也撕掉了的。試問：在分則的三十五章、三百五十七條裡，除瀆職罪一章、十五條是爲了保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而對其內部個人（實際還祗能施行於很小的走卒）所規定的罪行與處罰外，其餘的三十四章、三百四十二條，有那一章、那一條不是國民黨反動派把鋒芒緊逼着人民大衆所進行的威脅或欺騙?!

除去沿用術語的說法之外，還有採用形式的說法：以爲即使依據了僞刑法分則的分類體系，也不過是形式問題，殊無傷於人民法律的本質。這仍然是錯誤的，因爲如上所述，僞刑法總則、分則的整個體系，是被其極端反動的法西

斯本質所決定的，不能截然分開。拋開社會、國家、法律的本質，來談刑法，就必然會支持『犯罪祇是法律禁止並加以刑罰裁制的行爲』這一類資產階級通用的形式主義的定義，而認爲沒有成文的刑法，就無從處理案件，「惡法勝於無法」；就必然不能深切體會『犯罪乃是危害統治階級利益的作爲或不作爲』這一類的實質定義，並根據罪行的社會危險性去進行審判工作。——其結果就必然是敵我混淆，輕重不分。正因這樣，所以前華北人民政府曾頒佈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及司法審判不得援引其條文的訓令，我們共同綱領第十七條更明白宣布了「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目前我們尙無新的刑法可資依據，確是事實上的困難，但是，離開僞刑法分則好像就無從審判刑事案件的思想，恐是我們革命的人民的司法工作者所不應具有的。

二

特別重要的是對反革命罪的分類問題。我們研究不少的分類，一般都列有漢奸、特務、僞黨、黨特、叛徒等，但其所佔比重或地位，僅僅足以標明這是新加入的項目。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在不同時期，或同一地區的同一部門在不同時期，均有不同，這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綜合許多法院和公安部門的材料研究，在不同的分類統計中，有以下各種情形：（1）祇列漢奸、特務等罪行，不另列反革命罪，而漢奸、特務等罪行也祇是雜列在竊盜、通姦等其他罪行之中；（2）除列有特務、惡霸等罪行外，另列有反革命罪，而所有這些，也都雜列在其他罪行之間；（3）分漢奸、特務、反革命、惡霸等類，將前三類列在其他罪行之前，將後一類列在其他罪行之中；（4）或列出反革命或不列出反革命，而將所有反革命一類罪行都列在其他罪行之前。

這說明了：不同地區的不同部門對於什麼是反革命罪和反革命罪的嚴重性這樣基本問題的認識，還是糢糊而且不一致的，至少不如對其他犯罪的認識那樣一致。我們認爲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只能有鎭壓革命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防止異黨活動實施辦法」等特別刑法，及在僞刑法分則裡的所謂「內亂罪」、「外患罪」，而沒有「反革命罪」，這就使得我們有一些不肯拋棄舊法觀點而慣於依據「刑法」分則的人無所憑藉，難以措置，甚至難於措置到連漢奸、特務都列在反革命之外的程度。也正因爲如此，對於量刑，就感覺漫無標準，於是將在舊法律上處理一般刑事案件的未遂犯、從犯、預備犯等概念經常無原則地運用到處理反革命案件上去。他們苦於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之難於掌握。以至把反革命案件與一般刑事案件混淆一起，敵我不分毫無政策界限到「寬大無邊」的程度。

三

舊的司法統計制度是和舊的法律相適應的，其特點之一就是形式主義和重量不重質，因爲這樣的統計制度可以幫助反動統治階級掩蓋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眞像。例如：在那些統計上，「竊盜」案多於「妨害自由」案，並不能據以說明小偷之危害社會比特務更爲嚴重，而特務的妨害人民自由罪行（還不說其他罪行），則是不列在統計之內的。又如：在那些統計上，人民的「殺人」，如張三「仇殺」了李四，是算數的；而統治者的殺人，如杜魯門集團殺害了多少黑人，蔣介石匪幫殺害了多少革命志士，是不算數的。這就使人祇能瞭解假像，不能瞭解眞像。

我們人民的司法機關，把人民的死敵——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明白地統計並揭露出來，這是應該的。但是，把敵人的反革命罪和人民的其他犯罪如竊盜、烟毒等，都放在一個表上，並按收案、結案及犯人數目等排列起來或還求出百分比來（而且百分比還「精確」到有兩位小數的程度），這就很不應該。因爲這樣統計的作用，祇能使人發生一種錯覺，以爲目前危害社會的主要犯罪，是人民內部的竊盜、煙毒等，而不是敵人的反革命。至如個別公安機關，還曾把件數較多的竊盜等案，特別註明爲「重要案件」，而把件數較少的反革命一類案件均置於「重要」之外，那就更不應該了。

每個運用統計材料的人，必須瞭解一項淺近的道理，就是把性質全不相同或全不相關（指「相關度」而言）的材料，列在一起統計、比較，是毫無意義的。

去年以來，犯罪分類有逐漸統一的趨勢，一般司法機關的統計表格，已在採用着一些新分類，例如把刑事案件分爲：反革命、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妨害公共秩序、妨害公務、貪污、瀆職、姦淫、殺人、妨害身體自由名譽、危害個人財產等十類，也有把貪污、瀆職併爲一類而成九類的。這個分類雖然在某些術語上還沿用着僞刑法而沒有援用「蘇俄刑法」（如稱「貪污瀆職」，不稱「職務上的犯罪」；稱「妨害公共秩序」，不稱「妨害管理秩序」等），但在整個體系上卻已相當接近「蘇俄刑法」分則，不再是僞刑法分則的變相或因襲了

。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這個分類上，不但明確列出「反革命罪」，而且把它列在首要地位，並繼之以「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罪」、「妨害公共秩序罪」，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進步。統計表格當然還不能代替創制的新刑法，同時新的分類中，也還很有值得研究改進的問題，但總已反映了一種新的要求，即決心突破舊刑法圈子，依據已頒佈的綱領、政策、法令、指示等運用新民主主義法律思想處理審判工作，爲創造新刑法準備條件。

這裡須指出的，就是有些地方用舊分類的，固然還在用舊的統計辦法；而採用新分類的，也還在用舊的統計辦法：不分性質，把反革命罪和其他犯罪的各類型、各罪行，都列在一起，並按收案、結案件數及罪犯人數統計、比較。這就說明，有些司法工作者仍然表現舊觀點或者是不用腦筋，例如按案件次數製成的全國範圍的刑事突出案件圖表，說明全國刑事突出案件，第一是竊盜，第二可能是毒品的，也已出現。不難瞭解，所有這些統計圖表，都不足以說明一項千眞萬確的事實，即當前危害國家和人民的最重要的犯罪是反革命罪。

四

一年來，我們的公安、司法工作人員在執行鎭壓反革命保護人民利益的嚴重任務上，是努力的並有很大成績的，特別在最近這一時期。但在工作中，也反映着我們許多人的理論政策以及業務水平亟須提高，特別是我們有些人在思想上、認識上還或多或少地被舊的國家觀、法律觀所束縛、所影響，對馬列主義國家觀與法律觀的態度，往往不是很切實的，而是浮面的，不能很好聯系實際去改造思想和改進工作。例如毛主席明白指出：「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明白指出「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的重要性。明白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明白指出「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這些，我們都學習過了，可是我們沒有很好在實際工作中貫澈，表現在審判工作上，還不能堅決擺脫舊刑法觀點和「超階級的」形式主義思想的束縛，或明或暗地因襲舊刑法辦事，感到舊刑法分則上沒有「反革命罪」，無所依據，就把敵人的反革命罪和人民的其他犯罪混淆在一起，漠視原則的區別，有意或無意地使敵人和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把寬大政策誤解爲對敵人也要「仁慈」，把處罰人民犯罪有時反誤解爲對人民也要鎭壓。再例如：毛主席明白指出「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若干地區內採取了土匪游擊戰爭的方式，煽動了一部分落後分子，和人民政府作鬥爭。國民黨反動派又組織許多秘密的特務分子和間諜分子反對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佈謠言，企圖破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圖離間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和合作。特務和間諜們又進行了破壞人民經濟事業的活動，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暗殺手段，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收集情報。所有這些反革命活動，都有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背後策動（這種策動，在美帝發動對朝侵略戰爭以來，是更其加緊了——作者）。這些土匪、特務和間諜，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些，我們也都學習過了，可是同樣地，我們也由於沒有擺脫舊觀點的束縛，表現在實際工作中，是對反革命犯罪的認識仍是模糊，有的仍然繼續沿用着一種不正確的分類，不分性質、不分目的、籠統地把「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罪」、「妨害公共秩序罪」等類型中所包含的有些應以反革命治罪的，和反革命罪截然分開。這會產生什麼結果呢？結果是：有些以反革命爲目的的破壞經濟建設犯罪會受到「寬大」，因而會削弱了經濟保衛工作的作用，給敵人從經濟上進行破壞造成機會。

所有這些，都說明在犯罪分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表現着我們政策思想的學習是不够的，特別是由于我們的學習方法不够踏實，沒有從階級立場的改造上用更多功夫，因此舊的觀點還不可能澄清，也就不可能正確執行新的人民的司法政策，不可能正確建立新的人民的司法制度。所以我們提出用犯罪分類這樣的具體問題，作爲我們理論政策與實際工作聯系的學習課題，也就是說我們業務學習應採取這樣切實的辦法。

本刊啓事

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已委託全國新華書店代售代訂。至原在本社及本社上海辦事處訂閱者，仍由本社繼續寄發，至期滿爲止。惟因本刊已改爲月刊，篇幅增加，定價調整，故原訂兩期者折爲一期，折算後不滿一期之餘數，以一期計算，此啓。

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韋崗

一 新民主主義社會產生的時代背景

隨着社會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生產關係的變更和發展，因此也就產生使上述兩者相統一的生產方式。人類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五種基本的生產方式，決定着五種順序進步的社會制度，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與社會主義制，這是社會發展史的一般規律。

除了以上所說的一般規律外，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還有特殊規律。例如封建社會，在一般規律上，是直接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再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可是在某些國家，由於社會發展與歷史條件的不同，它的封建制度，却不是直接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演變成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例如我們中國，就是這樣一種情況。這樣一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雖然不能完全超越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在這種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却出現了特殊規律，那就是這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才能走上社會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社會主義與民主陣營取得勝利而結束以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人民革命勝利的產物。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根本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十月革命結束了帝國主義列强支配全世界的舊世紀，開闢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在十月革命以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被帝國主義列强所統治，十月革命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防線，使帝國主義世界喪失了六分之一的土地，在一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裡推翻了獨佔資產階級，並使向來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羣衆取得了政權。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裡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外圍，震撼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附庸國裡的統治。十月革命既推翻了俄國地主和資本家，便打斷了帝俄民族壓迫的鎖鍊，使一個幅員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既把革命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的中心和後方，既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於是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都發生問題了。

十月革命使資本主義制度爆發了總危機，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的俄國帝國主義已經永遠被消滅，其餘資本主義制度雖還存在，但却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非更加依靠剝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便不能過活，這樣就更加促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而且因爲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從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求解放的世界問題，它給這一民族解放運動，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眞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引導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這是說，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絕不是像過去那種用一種新剝削方式去代替舊剝削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要根本消滅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革命一經出現，並能鞏固勝利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更在事實上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不知道要優越幾千百倍，一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出現的毛病和無法解決的困難問題，如經濟危機、失業、浪費、文盲、災荒、戰爭、人格墮落、以及民族歧視與虐殺等不幸現象和悲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都可予以澈底消滅，這就使全世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苦難人民，找到一條新生與幸福的康莊大道，而使帝國主義者及一切反動派深惡痛絕，千方百計地採取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的辦法，企圖消滅社會主義。爲此目的，資產階級甚至不惜毀滅最後一點民主遺跡，實行赤裸裸的金融寡頭專政，乞靈於最野蠻的法西斯主義與侵略戰爭。於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舊世紀，便被無產階

級世界革命的新世紀所代替。於是在十月革命後就已開始了的完全新式的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爲推翻資本主義而創設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就不能不採取更積極的步驟向前邁進。『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到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毛澤東著：新民主主義論）。因爲這個時代，是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完全腐朽和反動到法西斯主義的時代；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鞏固建立，而且日益强大，並宣佈它願意和在事實上做到爲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同時也是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已經一天一天認淸其階級立場和國際主義的眞義，並在實際行動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採取積極贊助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勢力的革命，它就不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而是屬於新的範疇，亦即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本身性質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然而它必須得到蘇聯和世界勞動人民的援助，和社會主義國家及世界勞動人民團結一致去反對帝國主義，才有勝利的希望，因而它也就變成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以中國革命來說，雖然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本來動機，並不是想建設社會主義，而是想建設資本主義；但他們既要開闢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就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官僚資產階級，因爲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官僚資產階級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處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新時代，他們既然反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官僚資產階級，在客觀上就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這一方面由於世界已經分成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陣營：『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不但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僞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著：論人民民主專政）。另一方面，更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它本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他們決不能獨力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官僚資產階級，而必須在工農勞動羣衆中找同盟軍，用孫中山的話來說，就是必須『喚起民衆』和『扶助農工』，而且還必須『聯共聯蘇』，才能取得革命勝利，以實現『國家之自由平等』。如果民族資產階級不願意這樣，或開始願意而中途變卦，那他們就只好放棄革命以至背叛革命，去投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像民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後期所做的那樣，而他們一旦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那就連民族獨立和民族資本主義都完蛋，甚至還要招來帝國主義的新侵略，『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族的苦難歷史，就是明顯的實例。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他們受了事實的教訓，其中有一部份仍想要求得到民族獨立和發展自己的經濟，那就只好重新再來參加革命，重新再來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運動，而他們既然參加了無產階級及其他政黨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運動，那就不能不參加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陣線，就根本不容許再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老路，因爲國際形勢早已改變，歷史車輪早已轉到社會主義革命，並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解放運動變成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的新時期，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早已終結了。

不過，我們不能從這裡出發，就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人民解放運動的本身性質，就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說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完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就等於完全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因爲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建立在封建廢墟和工業農業生產都很落後的基礎上，而只能建立在國內民主統一及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革命的性質主要應由革命任務的屬性來決定。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人民，第一步只能完成民族獨立和推翻封建及取消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第二步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步必須分開先後來進行，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就是說不能一次完成。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間，雖然並沒有一條「萬里長城」，但卻必須經過一定的準備階段和轉變過程 。在沒有具備這些必要的準備條件和轉變條件以前，就只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

二　新民主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徵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由於革命力量的推動和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使社會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機器的使用和城鄉商品經濟的逐漸發達，是新的生產力發生和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過程。

但是這種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卻遇到舊的生產關係的桎梏，亦即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因而發生了嚴重的矛盾，這就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

地之間的矛盾，以及封建勢力和人民大衆之間的矛盾。由於這種新生產力和舊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及鬥爭，就不能不掀起和促成新的革命運動的發展。這種革命運動，按照它直接所要解決的歷史任務來說，按照它的社會性質來說，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以後，則正如上節所分析，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由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社會生產力得到相當大的發展機會。例如以中國來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不過一年多工夫，中央人民政府就完成了全國財政管理的空前未有的統一，使收支接近於平衡，物價趨於穩定。在一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把財政開支約百分之二十三點九，用於經濟建設的投資，這個數字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般經濟建設來說，當然還大大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但這個數字却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的建設投資都要大，再加上其他的積極因素；就取得了財政經濟的初步好轉。這主要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包括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在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了這個偉大的積極因素，使最廣大的人民羣衆，由重重壓迫之下翻過身來，變爲國家的主人，就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以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爲決定力量，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

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是以人民民主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爲基礎，即是將壟斷性的大企業歸國家所有，合作社及集體農場財產歸集體組織所有，獨立小生產者（包括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經濟和中小私人資本所有的新民主主義所有制爲基礎。這裡的生產勞動者——工人和農民，在公營企業、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及獨立小生產者經濟中，一方面是企業的主人，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一方面又是生產工作者，體力勞動的担當者。生產工具和生產勞動者結合起來）進行社會的和獨立的生產，這是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的代表性的一面。此外，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工作者還是僱傭勞動者，不過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地位比較起來，已經有所不同。他們一方面出賣勞動力給私人資本家，替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受資本家的剝削；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和公營企業中的工人一樣，是國家的主人，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者。因而雖受資本家的剝削，却是有一定限度的剝削，即須受「勞資兩利」原則的約束。這是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又一面，這一面同樣是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有機構成的一部分。

這種生產關係的基本特徵，就是廣大的人民羣衆，主要是工人和農民這些生產勞動者，已由生產工具的奴隸，一變而爲生產工具的主人。以這種生產關係爲代表性的生產關係，在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領導下，在今天中國即以共同綱領爲依歸，爲指導原則，使各種經濟成份，都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成爲一種特定的生產關係，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

這種生產關係已經不是舊民主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但也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因爲舊民主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係，以生產工具的私有制爲基本特徵；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則以生產工具的公有制爲基礎。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和公有制並存。例如以今天中國來說，就有五種經濟成份——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營資本主義的經濟——同時並存，不過以國營經濟爲領導力量。在數量上是私有制佔優勢，在質量上則國營經濟是最進步的經濟成份。同時，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之內，上述私有制也還有提高生產的進步作用；因此，人民民主政權也就容許它存在，並容許它在共同綱領內有所發展，但人民民主政權只保護它那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部分，至於對於國計民生有害的部分，則必須加以改造。當然，私營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和經濟建設的計劃性是有矛盾的。但在這裡却必須看到：第一、在一切最重要的經濟部門，我們已經有了强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並已開始發展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第二、私營經濟是處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其中還包含着日益發展的爲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因爲這樣，我們就有根據來說，可以使中國的經濟一步一步地避免過去的無政府狀態，而帶有較大的計劃性。

同樣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調整各種經濟關係的問題上，中國合作事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具有重要的意義。據一九五〇年七月的統計，全國合作社已經有了社員兩千萬人以上，資金五千五百餘億元，在一九五〇年第一季度購銷業務的總值已達三萬八千五百億元。合作社的發展主要地區是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的老解放區。東北合作社一九四九年採購和推銷的總值，合高粱一百三十餘萬噸，等於東北公營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目前我國最需要發展的合作社是農村中的供銷合作社和城市中的消費合作社，這兩種合作社的任務，就是保護

小生產者和消費者少受或免受中間剝削，促進生產的發展，這是我國勞動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上述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起來之後，就反轉來影響社會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過自力更生的努力和蘇聯的友誼援助，以及經過相當時期恢復與奠定工業化鞏固基礎之後，機器化的大工廠大企業將逐步發展起來，原有落後的生產技術將逐步提高，許多手工業生產將被機器生產所代替。在農業方面，則經過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的生產力將較前提高，互助和合作方式將逐漸發展。隨着對於農民羣衆教育的加强，廣大個體勞動者覺悟的提高，根據自願原則，就可逐漸把農業和手工業中的個體勞動轉變成集體勞動。土地的使用方式，將由分散的粗笨工具耕種的小農經營，逐漸進步到集體的根據最新科學和使用農業機器的集體農場經營。不過，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殘存着手工業和小農經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般情景。

在這種新民主主義生產力的基礎上，人民用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助合作，以從事生產。這樣的把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生產力和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的生產方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生產方式。在這裡，廣大勞動羣衆對於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大大地發揮出來，生產競賽和勞動英雄以及各種羣衆性的發明發現，將不斷湧現出來。這些以及其他經營方式的改善，都將變成提高社會生產力的積極因素，而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向上發展。

這種生產方式產生在歷史科學和革命結合指導革命實踐的時代，有人民民主的生產關係作保證，又有蘇聯先進科學技術及其他各種友誼援助，就使得新民主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爲自覺性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自覺性，表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及解決上面。當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建立以後，首先就反轉來影響生產力，加速生產力的發展；但生產力不斷提高的結果，又必然會引起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新的矛盾，這時候，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便作自覺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需要，例如掌握稅收政策與金融政策，簽訂勞資合同，調整工商業的公私關係等等，就是這種自覺調整的一些辦法。這樣不斷矛盾和不斷調整的結果，就使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適應着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這種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有鬥爭，也有團結。到了轉變條件完全成熟的時候，這種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生產方式，可以避免流血，而以最少痛苦的方式，達到轉變成爲社會主義的新生產關係。這種自覺調整與可能和平轉變的生產關係，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

三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

新民主主義在社會發展史上究竟屬於什麼範疇呢？這是曾經發生爭論過的問題。有人認爲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務是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尚未達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前，新民主主義總越不出資本主義的範疇。同時又根據新民主主義社會保留生產工具的私有制，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容許私人資本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剩餘勞動以求資本增殖，以及土地改革以後，土地歸農民所有，也是保存私有制度等事實，因此得出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社會發展史上的地位，應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結論。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而且是錯誤的，因爲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只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同時還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創造前提。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建設任務，不僅要讓有利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有所發展，而且還要使社會主義性質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有更大更快的發展。這樣經過一定時期發展的結果，私人資本的絕對量是增加了（這種增加對人民經濟的發展有好處），但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及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比較來說，却是相對地縮小了（這種縮小對於保證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有好處）。何況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私人資本，當它作爲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部分，它已不同於舊時資本主義的性質，它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所起的作用，已經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私人資本所起的作用。因爲經過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變革，它已從資本主義社會居於代表性的主要地位，變爲從屬地位，它已服從於新民主主義的利益。它的發展，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適應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需要，爲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而發展。由此可知，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方面爲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同時即爲社會主義的建設創造前提。因此，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歷史上地位，不能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

其次，新民主主義社會保存一定限度的私有制，並不能以此就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因爲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私人資本剝削勞動者以求資本增殖，是有許多限制的：首先是受人民政府的限制，其次是受工會的限制，還要受社會輿論的限制。工會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合法地位和强大力量，以及它與人民政府合作規定私人資本家執行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和工資原則，以及

工人衛生勞動保險等法律，便會限制私人資本對工資勞動者的過度剝削。在這樣的限制下，私人資本對於勞動者的剝削依然存在，但已不同於舊時資本主義社會那種無限制追求利潤的那種剝削制了。

對於農業方面，在土地改革以後，土地已由地主私有變爲農民所有，雖然都是私有，但情況已起了重大變化：過去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佔有土地以之剝削農民的血汗，如今則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回到農民手裡，使生產者和所有者的矛盾統一起來，使農民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不但農村經濟獲得發展，而且刺激市場的繁榮與資金的增加，因而使工業也得到更好發展的條件。這種情形，在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後，自然不免要大量產生資本主義，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並因此加强資本主義的統治；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結果却不一樣。雖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土地改革後，也不免有着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趨勢，可是人民民主政權却有把握可以採取鞏固工農聯盟和組織集體經濟等方法，有步驟有計劃地領導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這個過程是一個重要的教育過程，同時又是一個鬥爭過程，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爭取這個教育和鬥爭的澈底勝利。

總之，新民主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有着本質的區別：（一）資本主義制度否定獨立生產者之存在，是以直接生產者之被剝奪一切生產手段爲前提，即採取大魚吃小魚，大資本吞併小資本的方法，促成獨立小生產者紛紛破產，做爲自己發展的代價。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則不是大資本否定小資本，乃是獨立生產者——農民與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的廣泛發展，不是直接生產者之被剝奪生產手段，乃是直接生產者與生產手段之結合。（二）在舊民主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必然的趨勢乃是從自由競爭變成壟斷獨佔。而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恰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消滅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因爲這三者都已成爲社會進步發展的障礙物。（三）在舊民主主義國家中，農民在得到土地後，變爲私有者，並沒有更進步的生產方式來領導發展生產，結果農民擺脫了舊時封建的壓迫，又變成獨佔資本的奴隸。而新民主主義則不然，因爲有了和私有制並存的，雖然目前數量很小，而將來有極大發展前途的進步的生產方式，即通過合作社經濟而進入集體農場的生產方式，這就能幫助和領導獨立生產者——農民與手工業者，使他們組織起來，有步驟有計劃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四）在舊民主主義國家中，所謂國家資本乃是少數獨佔資產階級私有經濟的變名，因爲獨佔資產階級竊踞和控制政權，他們就利用國家名義掠奪財富。例如中國過去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是這樣做法，名義上是國家資本，實際上是他們的私有財產。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國家資本，却是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爲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由於上述幾個基本區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新民主主義不應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並且認爲它是資本主義的修正和改良，也是錯誤的。因爲資本主義的修正派和改良派，首先肯定資本主義制度應該永久存在，不過它本身產生了一些缺點，需要修正和改良一下，而他們主張修正和改良的目的，就是爲了想使資本主義制度永久存在下去，以延長人類的痛苦。新民主主義者則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成爲腐朽和垂死的東西，應該被進步的社會主義和制度所代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雖然還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但那是爲了使它可以善盡歷史責任，像一些懂得社會發展的道理的資本家所說，中國資本主義生來就是苦命，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可以自覺地領導它們沒有痛苦或最少痛苦地『壽終正寢』，因而新民主主義制度決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正和改良。

新民主主義既不屬於資本主義範疇，那麼可否說它屬於社會主義範疇呢？也不能這樣說的，因爲新民主主義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及爲數很少的集體農場經濟，誠然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而且是將來到達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可是新民主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究竟還是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第一、社會主義所有制表現爲兩種財產形式：一種是國家的財產，即全民的財產；一種是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財產。此外，法律僅容許絕不剝削他人勞動爲限的小規模私有財產。而新民主主義經濟則在國營經濟和合作社及很少數的集體農場財產之外，還有相當大量的私人資本，即資本家私有生產工具及生活資料，並僱傭生產勞動者從事生產和進行剝削。可見新民主主義社會只能限制剝削，而社會主義社會則根本消滅剝削。第二、社會主義社會不但工廠礦山和銀行等，完全歸社會公有，即土地亦歸社會所有；而新民主主義社會則實行耕者有其田，只有一部分土地收歸國有，大部分則實行土地農有。第三、在社會主義社會，工業比農業佔優勢；而新民主主義社會，如中國工業與農業是一與九之比，這就表明還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第四、社會主義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値」，而新民主主義社會則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第五、社會主義社會的合作社或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財產，這是與社會主義生產手

段公有制相一致的；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合作社經濟，是參加合作社的人們的集體財產，還只能算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第六、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完全實行計劃經濟，而新民主主義社會則只能實行初步的經濟計劃，逐漸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

最後，從政權性質上說，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新民主主義社會則是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其目的在於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人民民主專政則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工具，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包含中小資產階級在內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權，藉以鎮壓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抗。所以人民民主專政對於四個朋友是民主，對於三個敵人是專政，其目的在於把人民民主革命進行到底，以便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既不屬於資本主義範疇，又不屬於社會主義範疇，同時也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綜合。因爲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之內，含有資本主義的成份，帶有資本主義的某些屬性；同時也含有社會主義的成份，帶有社會主義的某些屬性。這兩種制度是要進行鬥爭的，最後鬥爭的結果，社會主義因素將戰勝資本主義因素，進步到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永久綜合並存下去。

根據客觀事實研究，我們可以這樣說：新民主主義在社會發展史上，一方而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另一方面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形式。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有它自己的生產方式，這個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徵，就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的程度上，廣大的人民——主要是工人和農民，這些生產勞動者由生產資料的奴隸一變而爲生產資料的主人，他們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用社會生產方式和獨立生產方式進行生產。它不是舊的私有制社會那種生產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生產方式，也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是一種包括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亦即爲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創造條件的新民主主義的生產方式。

四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前途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的重大轉變，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更是異常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世界歷史。因爲中國有五萬萬人口，有九百五十九萬七千多方公里的面積，是地球上僅小於蘇聯的第二個最大的國家，有極豐富的資源和極巨大的勞動力，是帝國主義列強最重要的市場和生命線。現在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出現，已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中國人民由長期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擺脫出來，變成爲新中國新社會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代替那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並公開宣佈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首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最近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更在朝鮮以自願正義行爲制止美帝的瘋狂侵略，這就在事實上大大加強了民主和平陣營的力量，使帝國主義陣營遭受了極嚴重的失敗。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不會甘心於這樣的失敗，必然要作最後的掙扎。毛主席說：「在全國平定以後，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事實上，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正在使用一切方法來干涉和破壞新中國，從經濟封鎖到空軍轟炸，從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進入聯合國到訓練和派遣匪特鑽入新中國搗亂，從阻撓中國人民解放台灣到武裝侵略朝鮮準備進攻中國等等，其目的無非想取消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勝利。因此，我們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並須在事實上加強國防力量，開展與深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以制止美帝侵略和爭取持久和平，這是我們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環節。

在經濟戰線上，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應該努力完成土地改革，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解放社會生產力；更要切實建設國營企業，廣泛組織合作事業，以便爲建設社會主義打下可靠基礎。同時，在取得民族獨立和推翻封建壓迫之後，革命掃除了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國家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能避免的結果。當然，不容否認，這只是這種經濟落後國家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全部結果；因爲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同時也就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而且在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專政領導之下，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可以比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得更快。只有經過這種以及其他必要的準備階段和轉變

過程，才能把國家經濟政治制度順利轉到社會主義軌道上去。

保證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使國家工業化。因爲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建立在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後的農業基礎上。假使工業的成分不能超過農業，工業不能領導農業，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過去有過農業社會主義計劃，但事實證明那只是一種幻想，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現在我們主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在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只有我們的工業眞正發達了，才能建立更強大的國防，我們的民族才能得到全部的眞正的獨立。同時也只有我們的工業眞正發達了，才能推動全部國民經濟的改造，才能推動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各方面的廣大建設，以促進中國社會歷史的進步發展。

爲了促成國家工業化，就必須使農業集體化。因爲社會主義社會仍然要有農業，不過是要有進步的農業。農業集體化是和國家工業化相關聯的，要使國家工業化，那麼僅是零碎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是不能解決工業的原料、市場和資金等需要的，必須使農業由手工生產轉到機器生產，由土地農有轉到土地國有，由個體生產進到集體生產，才能滿足國家工業化的要求，這是使新民主主義社會轉入社會主義社會，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當然，要使農業社會化必須經過一定的步驟，而且必須根據農民的自願原則。新民主主義轉到社會主義的速度，就是以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社會化的速度的轉移。

在政治上的條件，主要是要保持與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其次，必須要有鞏固的工農聯盟，如果沒有鞏固的工農聯盟，工人階級如果不能爭取廣大農民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如果不能把廣大的個體私有主義者變爲集體主義者，就不能走向社會主義。此外還必須始終如一的和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文化保持合作，我們已經有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作保證，建立了中蘇兩大國家的強固友好關係，還需要繼續把這種友誼鞏固和發展起來，以加速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並創造將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條件。

（上接19頁）

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省則一開始就代表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所有各級會議，開得好的多，開得不好的少。一般的看法開比不開好，後幾次會總比前幾次好。人民對於民主的熱情很高。民主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已打下了基礎。曾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的古老的中國，在解放後這樣短的期間就得到這樣的成績，很可使人興奮。目前的問題，是怎樣使民主成爲一個經常的制度。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省縣市人民代表會的組織通則。規定省縣市每年開會的次數，現又已頒佈大城市的區與鄉村的區、鄉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各級政府的一切重要的問題，都要提到代表會議上來討論，討論時應儘量發揮民主。這樣就可使全體人民在自己實際掌握政權的過程中很快轉變過去老百姓怕政府的態度，轉到作主人翁的態度。同時某些政權工作幹部的強迫命令官僚主義作風，也會因人民的監督而得到糾正。

省、市、各大行政的建政工作，因爲幹部強，代表有開會習慣，易于搞好，縣是一個關鍵。縣的代表會議開得好，下面區鄉的會，也會開得好些，上面佈置下來的工作，也因經過縣代表會議易于深入開展，目前各級民政部門，正用力在開好縣人民代表會議。

鄉是基礎，很重要。有些地方，鄉幹部犯強迫命令的毛病。原因是羣衆文化水準低，而少數幹部又受了舊的封建惡習的影響，加以戰爭時期，任務多，少數區鄉幹部辦法少，不知道怎樣動員老百姓去作。這樣只有開好代表會議才能糾正。東北經驗證明：開好代表會，強迫命令可以不發生。東北在支前時，一般都在代表會議上動員。代表回去傳達到村裡去，大家都了解，大家來做，強迫命令便用不着了。一九四五年在陝北的鄉選，選舉時，首先檢查工作，老百姓提出的問題很多，有一種是對幹部的批評，然後在代表會議上解決，幹部因批評而作風改變了，上面去管，不如人民管的好，人民自己管事，其成就常有出人意料所不及的。

中國有將近五萬萬的人口，過去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要改變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們有了正確的方針與步驟，要做好也是不難的。

★

★

★

★

關於編寫與講授本國史的指導原則

尚鉞

現在各種本國史教本的編寫和本國史課程的講授，所採用的大抵是這樣兩種方法：一種是偏重一般規律，一種是偏重歷史人物的活動。此外，也有人在叙述歷史過程中，採取歐美資產階級歷史學的機械的分門別類法。他們把政治、社會、經濟、農業、工商業、官制、兵制、學術、……工藝、文學……等等一一分別列舉。這，不僅把本國史吃香腸似的按朝代切開，而且把每一朝代的社會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分開；把社會的這一部門與那一部門分開，使本國歷史的有機性、整體性遭到支解，變成枯燥無味的零零碎碎的史料排列，或偶然現象的堆積。這種歷史的叙述，只能作爲歷史資料中的不完全的目錄或索引，是很明顯的。因此，本文對於這種叙述，是不打算作專門研究的。

一

就偏重一般規律的歷史叙述方法說，編寫與講授歷史按照社會發展史的系統，本來是正確的。因爲歷史科學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種支配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什麼？在馬克思以前一直是一個謎。自從馬克思以後，才知道這種規律不存在「天上」和「神靈」的什麼寶庫裡邊，也不存在在偉大人物的頭腦之中，而存在在衣服、房屋、粮食等等的生活的物質資料的生產之中。就是說，這種規律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依這種發展爲轉移的社會經濟生產過程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所以，按着這種規律來編寫或講授歷史，原則是正確的。不注意這種規律，就不能理解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之所以只是那個樣子而不是其他；也就不能理解我們今天的社會何自而來，現在怎樣以及將來向怎樣的前途發展。從而也就不能認識自己和自己所生存的社會與國家，在人類歷史中所起、及將要起的是什麼作用。我們是新中國的新歷史的創造者。如果不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就不懂得如何把自己配合進創造這偉大歷史的必然潮流中去，或者說，把自己的活動變成這偉大歷史發展鏈鎖中的必要的一環。

所以，重視歷史規律是好的，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在這樣編寫或講授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到：怎樣才能使學生和廣大青年羣衆，通過歷史材料走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呢？是否只提供給他們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就能達到這一目的呢？或者說，代替按照具體的時間、人物和重要歷史事件的生動活潑發展線索的正確的叙述、分析與總結，只把中國歷史中不明確的，或不完全的東西（如摘取片斷歷史事實，部分歷史現象，或歷史人物的個別言行等等），硬嵌在社會發展史的某些階段中間的公式主義標語上，就能達到這一目的呢？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答復是否定的。因爲正確的歷史觀點，（1）不是從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定義中所能培養得起來的，而是按照年代次序，具體地研究、分析重要歷史現象、歷史人物的特點，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地總結歷史事件，才能使青年學生們由明確的具體的歷史材料和系統，走向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認識。（2）公式主義的歷史編製方法或講授方法，是在削趾適履的基礎上，勉強自圓其說的辦法。這方法往往一開始就陷進斬斷或割裂歷史，破壞歷史科學的系統性和完整性的主觀主義的偏見之中。

由於偏重講授歷史規律的原故，有些歷史教師更進一步把歷史課當一般政治課來講授，對於具體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特點，不從發展線索，及多面性上作具體的研究、分析，也不總結歷史事件，僅只抽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某一部分現象和特點，或某一方面，某一時間的言行，來附會政治宣傳上的臨時號召。例如要培養青年學生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丟開歷史課本不講，只在歷史上找出一些民族英雄和農民羣衆的反抗外族侵略的鬥爭事件，來大加強調與渲染。特別愛舉的例子，如南宋時代北方的民兵堅持反金人的英勇鬥爭，和元代紅巾軍的反元蒙鬥爭等等，大有在宋、元時代，中國農民就已經有了現代意義的民族觀念。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首先，那些時代的農民生活條件，是在中國莊園制度發展到相當成熟的時期，以個體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分散的封建主義的自然經

濟。因之，那時絕大部分的土地都被皇帝、朝廷、官僚、以及強門豪族地主等所強佔，所以皇莊、官莊，以及以官僚貴族個人的姓氏爲名的莊園「遍天下」，因之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土地，或者即使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有很多被繁重的賦稅和徭役逼迫着將土地獻給強門豪族而托其庇蔭，淪爲農奴式的佃客。所以，那時農民所能有的只是原始的基於土地侵奪和殘酷剝削、壓迫的強烈的階級仇恨，而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觀念。其次，中國廣大農民羣衆，那時是處在本國絕對主義的封建專制的壓迫之下，國家對於他們除了災害以外，幾乎什麼都不能給，因此，現代意義的愛護自己國家的觀念，那時是很難產生的。但當外族侵入時，他們的家庭被破壞，妻女被姦淫，父母兄弟親朋被屠殺，田園被侵佔，祖宗墳墓被踐踏，生活陷於顚沛流離的痛苦深淵。同時，侵入者還要以不同的和落後的風俗習慣，來強制中國人民服從。這才激起了人民大衆的民族反抗意識。在保衛鄉土的基礎上，他們堅強地豎起反抗的旗幟來。總之，以現代意義的民族觀念硬派在過去千百年代的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大衆的頭上，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的原則的（參看浦劍著：「二千年間」）。所以，就是爲着培養青年學生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只有從正確地分析、批判及總結具體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着手，使青年們學習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來認識與自己有血統關係的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從而使他們認識中國民族經過如何困難的鬥爭，才能生存和發展到現在，以及中國共產黨如何在長期的瘋狂的白色恐怖下，領導着全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鬥，才把帝國主義趕出去，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推翻，把中國引導到自由獨立的光明道路上來，使每一個中國人，獲得從未享受過的平等、自由與工作、學習及生活有保障的幸福生活。只有這樣，才能培養起青年們的正確的愛國主義精神來。

因此，公式主義地偏重一般規律，對於發展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和提高我國的歷史教育，不僅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倘若掌握得不好，這種偏重就有變成對歷史科學的取消，和爲反科學的觀點作保障的危險。不是嗎？我們現在就常常聽見「研究歷史觀點不是研究歷史」的說詞，其實，離開了「歷史」還有什麼「歷史觀點」好研究呢？恩格斯曾在給施米特的信中，嚴厲地批評那些不瞭解、不研究歷史具體性的重要意義的人說：

「唯物史觀現在有了許多朋友，這些朋友利用唯物史觀作爲不去研究歷史的藉口。」

這話是值得我們深深警惕的。

在這裡，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中央所宣佈的「關於蘇聯各學校中教授本國史」的著名決議，是值得我們鄭重參考的：

『按照歷史年代的次序講述歷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這是學生能夠切實領悟歷史課程之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保證學生們所必需的歷史教材之易於理解性、明確性和具體性。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分析和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這都是使學生對歷史走向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才有可能。』

因此，編寫或講授本國史，偏重於一般規律的指導原則是對的，正確的。但是這種偏重一走上只『提供給學生們一些社會經濟的抽象的定義，而不用生動有趣的方式按照年代的次序，講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實，以及歷史人物的特點等以教授本國，這史樣，就以抽象的社會學的規式，代替了本國史之有系統的講述。』（同上決議）就不對了，也不正確了。因爲這樣的編寫和講授是『用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來代替客觀的歷史認識，代替對具體史料的研究，這就障礙了根據馬列主義的方法來敍述本國歷史。』

我們知道，列寧經常嚴厲斥責那些對具體問題不從具體分析中去找回答，而從一般眞理的邏輯中去找回答的傾向。如在一九一四年，他反對普列漢諾夫時說：『普列漢諾夫同志，後來這樣可笑而又可悲地想從其中擺脫出來的那些可笑而又可悲的誤解的來源，就在於違背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對於具體問題必須從它的一切具體方面去加以分析。』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也說：『在估計歷史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都不要以「永恒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爲觀點，……而是要以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關連的那些條件爲觀點。』毛澤東主席也說：『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眞正具體的了解，眞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又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些話，移作我們研究和處理中國歷史問題的指南，是再好不過的。

二

以歷史人物個人活動爲中心的編寫或講授歷史的方法，在馬克思以前，幾乎是全世界歷史學領域的統治原則，中國也不是例外。中國舊有的歷史，不問是編年體、傳記體、紀事本末體，可以說都是以人物爲中心的歷史。我們今日從事史學研究的人

，幾乎絕大部分都是在舊史學的發霉的書庫中培養出來的。因之，舊史學的傳統我們多少都保留着。中國史學上最早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稍後的「法先王」與「法後王」，再後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最後的「英雄造時勢」等等，大抵都是屬於這一類。因之，中國舊有的一部二十四史，以及現有的大學通史，中學的歷史課本與課程，可以說絕大部分，大抵都是有意無意地遵循着這個法則來編寫和講授的。這些皇帝家譜和人物傳略式的歷史，雖然有很多的材料，可以作爲叙述中國社會發展規律的史料，但是不經過馬列主義的濾濾，仍然只是一堆偶然現象的湊合，病態人物和事件的纍陳的故紙堆，提不出歷史發展規律的說明來。我們很感謝近代的許多新史學專家，如王國維先生，郭沫若先生等，爲我們作了許多先驅者的工作。但是先驅者並沒有把工作做完，因此，還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我們。譬如歷史人物的作用問題，就是今日一般歷史教程的編寫和講授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很多教師都提出了這樣的呼聲：對於歷史人物應該怎樣處理呢？有的教師問：是不是過去歷史上的好人，現在都要講成壞人；歷史上的壞人現在都要講成好人呢？也有教師這樣說：「講到曾國藩和李自成還好講，講到王莽和王安石就很難下斷語了。」對於處理歷史人物的問題，這樣的一些提法，固然有偏差。但這也反映出歷史人物如何作用於歷史的問題，在目前已經成爲一般歷史教師很傷腦筋的問題了。因此，我想在這裡提出一些研究這一問題的意見，和先進及專家們商討。

首先，我們是不是否認英俊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呢？回答是：我們不但不否認，而且還肯定歷史人物在歷史上有一定的作用。譬如就中國近代史說，毛澤東主席在「論中國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講到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以後，代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的先進人物——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等向西方尋找眞理來救中國的歷史性的活動。結果，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都失敗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的雖然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最後，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俄國人舉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是，中國人從俄國人的介紹，找到了馬列主義。「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時，以李大釗、毛澤東爲代表的先進中國人學習着『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爲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因此，中國人在這些先進的共產主義者的影響和領導下，發動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這些先進的共產主義者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才有了正確的領導，明確的鬥爭目標，和堅強而善戰的組織；也從此漆黑一團的中國，才有了光明的前景。

這些，都是歷史的必然，沒有一件事，一個歷史人物的這樣或那樣的活動是偶然的。只有在事件和人物的這樣或那樣之間，才是受個人的特點影響對於必然的表現方式。

因此，這裡就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人對歷史如何才能發生作用？二、什麽是決定個人發生一定歷史作用的動力？

就中國近代史來說：自一八四〇年起，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各方面的侵略，都爭先恐後、一步緊迫一步地針對着滿清腐敗的封建帝國來了。緊跟着的是滿清帝國的軍事失敗、經濟破產和政治上失去獨立自主。中國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但在另一方面，隨着這嚴重危機而俱來的，中國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結構，是不容許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因之，從中國社會結構中就提出了資產階級性的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要求。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等等先進人士，不管他們的行動和主張，是革命的活動，或是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基本上都有着催促滿清的封建專制賣國政權起變化的作用，都是代表了近代中國社會內部結構所提出的偉大的要求和任務而出現的。

早就有人說過：『凡是存在着便於英俊人物發揮其材能的社會條件、地方和時候，總會有英俊人物出現的。』

洪秀全首先起來領導中國人民解決這一問題。就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說，它所表現的不過是當時中國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危機所決定的，它是中國必須走的道路與方向而已。這情形可以從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許多制度設施上看得出來。如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土地改革問題，典官制度提出了保護工商業的問題等等。它的總方向很明顯的是推翻滿清的封建專制賣國政權，把中國從滿清的民族牢獄中解放出來。這個總方向——完成資產階級性民主的民族的革命的方向——毫無疑問是由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整個歷史條件所決定的。但這個總方向表現在以洪秀全爲領導者的運動中又有其獨具的特色。就洪秀全個人及其時代環境說，與他同時，中國北方有捻黨，南方有天地會等等，都是中國人民反滿清的起義軍。這些起義

軍，反抗滿清的壓迫，其目的是同一的。但太平天國革命却與其他起義者不同，只有它——在洪秀全、楊秀清幾個人的領導下，提出了原始社會主義政策。爲什麼呢？這現象除了從個人特點來說明以外，就不能解釋。洪秀全「熟讀經史」，從傳說中知道一些中國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人類生活的糊糢狀況，他又讀過基督教的許多經典，知道基督教義中的一些原始社會主義的曚朧情形。加之他「天資聰明」，「很有才學」，自然他也具有一般漢人，特別是廣東一帶的中國人所具有的反滿，和反資本主義國家侵略的意識和決心。這些，都是洪秀全之能成爲太平天國形式的革命領袖的原因。

因之，對於歷史事變和歷史人物，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與其他的農民起義一樣，是當時社會內部所提出的社會要求，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戰爭之獨具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形式，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却主要的是由洪秀全個人的特點，與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韋昌輝等人的個人特點，錯綜揉搓，互相衝突，互相補充，互相配合的結果所決定的。因此，我們確認歷史人物的特點，對於各個歷史事變的局部外貌，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因爲，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起着決定作用的，是具有意識的「人」。因此，在社會發展的歷史中，無論什麼事情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向的。所以，在歷史中的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而不是絕對的。就是說，在表面上呈現着偶然性統治的地方，而這種偶然性自身就是受着隱藏着的內在規律支配着的。

拿洪秀全這個具體的歷史人物來講，根據許多歷史的記載，他原來是懷抱着兩種矛盾的意向的：一是一般中國人民的反滿意向，一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滿清存在着幻想的意向。因之，他個人的特點和材能，如果沒有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中國特有的社會危機，戳穿了滿清政府的紙老虎；如果一八三七年他到廣州應試及第了，使他對滿清政府所存在的幻想部分得到滿足，而不是考試失敗「激起反抗意識」，恐怕他的個人特點和材能的發揮，會完全是另外一種形態的吧？但是他在科場屢次失敗，根本消滅了他對滿清政府的幻想，激發了他內心存在的反滿思想和情緒；加之鴉片戰爭的失敗，暴露出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當時各地農民風起雲湧的起義等等歷史現象，提高了他對革命的信心；同時，他又於無意中得到梁亞發的「勸世良言」。這就決定了他從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及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獨特形態。

從洪秀全的遭遇及造成他是太平天國領袖的因素看，許多事情表面上好像是偶然性的。而實際上，諸如鴉片戰爭失敗暴露出滿清政府腐敗無能，科場的黑暗，英國瑪理遜到廣州傳教，和梁亞發的入教及著作並在街頭散發「勸世良言」等等，又無一不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腐敗所造成的必然現象。因此，洪秀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所表現的個人特點和材能，也是受着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必然性的支配，是很明顯的。

普列漢諾夫曾說過：「每一個眞正顯出了本領的英俊的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英俊人物，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由此可以看出，英俊人物……只能改變當時事變的個別外貌，却不能改變這種當時事變的一般趨勢。他們自己是完全順應着這種趨勢而出現的，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是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檻的。」因此，當這種「社會趨勢已經存在，並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一定的任務的時候，那麼，這種任務沒有被英俊人物解決之前是始終吸引着英俊人物的注意的。」所以解決中國的歷史任務，在一八四〇年由鴉片戰爭的失敗提出之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近百年來的先進人物，始終都在注意，並且不斷地在尋找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這中間雖經過洪秀全、康有爲、孫中山等等的努力，但都遭到失敗。這就是當時中國社會向全國人民提出的偉大歷史任務沒有解決。直到一九一七年最優秀的先進的中國人，從蘇聯找到馬列主義，繼之更由毛澤東主席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了，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員在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下，把自己鍛鍊成中國革命中的精銳基幹，領導着、團結着全國人民經過二十九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把解放中國的偉大任務基本上完成了。自然，當這一歷史任務完成了以後，全國優秀青年和英俊人物的注意力，就立刻轉到另一對象上去，這就是建設新中國。

由此，我們知道所謂英俊人物，不過是他具有一種特定的智慧與材能，使他最能致力於解決社會趨勢所提出的問題與任務。普列漢諾夫說：『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爲他的個人特點使各個偉大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爲他自己所具備的特性，使他最能致力於當時在一般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的社會需要。』因此，個人對於歷史的關係就很明確了。偉大的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有高瞻遠矚的目光，察精析微的智慧，善於順應社會趨勢，完成偉大社會需要的任務。就是說，他有最能爲人民服務的材能與智慧。所以，歷史上沒有什麼大人物能强迫社會開倒車，違背社會向前發展的趨勢的。

對於歷史人物的這樣認識，是符合科學的、馬列主義的、也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未完）

人民租稅綜論

周伯棣

一　租稅的地位與使命

租稅在公共收入中的地位，是跟着時代而不同的。在封建時代以前，無所謂租稅。到了封建時代，才有租稅的發生。然租稅在封建時代的形式與地位，顯然與後世不同。原來封建時代分為領主封建與地主封建兩時期。在領主封建時期，領主之主要的收入是地租（rent of land），不是地稅（land tax）。到了地主封建時期，土地漸歸地主所有，於是地主向佃農收租（rent），政府向地主徵稅。這才發生了稅（Taxes）。封建時代的租稅離不開土地，因為土地是封建時代主要的生產手段，國家的財用自然也得取給於是。不過地租與土地稅之外，自然還有些其他的財源，例如西歐古代的特權收入（regalia）；我國古代的關市之征。（工商稅的性質）但這些收入究竟是次要的。主要的收入來自土地，那是無疑的事。例如我國歷代的田賦直到清朝末葉為止，常佔國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便是明證。

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除農業之外，其他的產業——工商業，日益發達了。於是除土地稅之外，工商業稅亦隨之發達。關、鹽、貨物等稅的收入，寖假而有超過土地稅之勢，及至財富集中，所得稅的收入，更有獨占鰲頭之概。至此國家的收入遂以租稅為大宗，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公共收入的意義上，遂有『租稅國家』之稱。自然，在資本主義國家，除租稅收入外，還有其他的收入，例如公產收入，公業收入，行政收入；但這些收入綜合起來比之於租稅收入，還是卑不足道的。

到了社會主義的時代，人民做了政權的主人，同時也是生產手段的主人，政府代表人民保有了經濟資源，這經濟資源同時即做了財政源泉；於是經這些源泉中，政府自有收入，不必專靠租稅收入以充國用了。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收入，若借用資本主義的名詞來說，是一種『企業收入。』那便是『社會主義經濟收入』。即就蘇聯而論，社會主義經濟收入，便約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而對個人經濟課稅收入，僅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由此可見，租稅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上已不佔重要的地位了。

但在新民主主義國家，於其社會經濟的構成中，除國營經濟外，還保留着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對這些經濟成份，是通過租稅而取給國用的。所以租稅在新民主主義國家，還有必要。同時，國營企業收入在將來固將佔重要的比重，以至成為國家財政最主要的收入；『但是目前國營企業還需要經過一個恢復時期，人民政府還不能從這裡得到大的收入』（一九五〇、三、二二。人民日報社論。）所以租稅在現階段，更有其重要性。自然，這樣的重要性，將日益減退，代之而興的，是公營企業收入，將日益增加，這兩者恰巧是互為消長的。

在目前，租稅的地位是重要的，即如在一九五〇年的概算中，各項稅收亦佔歲入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九，再加上公糧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四，那麼租稅收入便佔歲入的百分之七二・三。

二　人民租稅的政策

租稅在新民主主義的我國，至少在現階段還是很重要的。然則這些租稅該是怎樣徵收的呢？這裡首先便涉及租稅的政策了。關於人民租稅的政策，有下列數點值得我們注意。

（1）照顧財政——新民主主義的財政不是消極財政而是積極財政，還具

總言之，在軍事方面，『必須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共同綱領第二條），從而在財政上，必須『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同上第四十條）尤共在目前，大陸方面，除西藏正在進軍外，雖已全部統一，但美帝侵據台灣，進窺朝鮮；我們爭取和平，抵抗侵略，在財政上更不能不有相當的準備。次之，在經濟方面，須『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及國家建設的需要』，（共同綱領第四十條）從而在財政上須掌握物資，收購物資；更須作生產的投資。凡此均非錢莫辦，而籌款的方法，不能依賴發鈔，亦不能完全依賴發債，故『必須增強稅務工作』（全國稅務實施要則）。因增強稅務工作，雖未必即爲增稅，但因減少走漏，自然增加稅收，充裕財政。

（2）照顧生產——爲獎勵生產，工業稅輕於商業稅；同是工業稅，那生產機器或必需品的工業，應比生產奢侈品與安適品的工業，課稅較輕。這便是課稅的時候，共所採用之稅率，應該是『工輕於商，日用品輕於奢侈品。』然則稅率如何減輕的呢？以工商業稅（所得稅部分）爲例，乃看製造業的類別而予以遞差的減徵的。即『根據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分別行業，減稅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以資獎勵』（新工商業稅暫行條例第十條）

（3）照顧負担能力——舊時代的租稅負担甚不公平，違反正義。人民租稅須謀負担的公平。這就現階段言，有下列幾點可以申述：（甲）『實行合理負担。』（共同綱領四十條）這因舊時代的稅政，稅制過於繁複，稅負輕重難於測定，於是有的個人或企業，負稅太重，有的則太輕，所以『簡化稅制，』使各行各業的稅負有一個分別的計算，那才能『實行合理負担』，例如一種稅源負一種稅，比一種稅源負多種稅是較易察出其負担之輕重，而可作相互的比較的。在舊時代，本有『國民黨萬稅』之稱，可見其苛雜之多。人民租稅，依據全國稅政實施綱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已簡化爲十四種。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依據薄一波財長關於調整稅收問題的報告，稅已減至十一種了。這都是爲實行合理負担而簡化稅制的明證。（乙）『平衡城鄉負担』（全國稅政實施綱要）。我國的租稅向來是農業稅重於工商業稅。而且農業稅有無限的附加，工商稅是不容許有附加的，這便是城鄉負担絕不平衡，即在一九五〇年的概算裡，農業稅佔歲入的百分之四一·四，而工商稅僅佔百分之三八·九，但經過一九五〇年二月全國財政會議精確計算後，上列這個比重，已經變化了。『城市稅收已提到歲入的第一位，佔歲入百分之四〇·一，農業稅已降爲第二位，僅佔歲入的百分之三七·二；國營企業收入昇到第三位，佔歲入的百分之一七·九。共他收入爲百分之四·八。』（見人民日報社論，稅收在我們國家工作中的作用，一九五〇、三、二二）

（4）改善稅務行政——『據北京、廣州、漢口等城市的調查，國民黨的稅收，大體上是三成歸國庫，三成被貪污中飽，四成是漏稅。』（見前揭文）這可見在舊時代，稅務行政是腐敗萬分的。因此改善稅務行政，自得成爲人民政府租稅政策之一，關於此點，約可分爲下列數項：

第一、統一稅收——過去租稅的征收是很不統一的，在國家稅方面，有海關、鹽務局、直接稅局、貨物稅局；在地方稅方面，有地方稅務機關，例如在上海一地便有市財政局。機構分立，各自爲政，稅款也就不易集中。現在除關稅與鹽稅仍有專設機關（海關總署與鹽務總局）收稅外，共他各稅均由統一機關徵收。例如上海的直接稅局、貨物稅局、上海市財政局，已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起合併而爲上海市人民政府稅務局，統一了貨物稅、直接稅、地方稅的征收。征收以後，當日入庫，（人民銀行代理公庫）然後分期報解於中央或地方政府（按國地劃分）。這樣統一稅收，責有專規，自可提高行政效率。

第二、合理計徵——在徵收城市工商業稅，本有『自報公議，民主評定，』和『自報實繳，輕稅重罰』等經驗。自報公議，本可鼓舞商人們的自尊心，但實際因假賬太多，結果容易成爲假報虛賬，不足徵信。民主評議亦不免有以大擠小，以小擠大的流弊。故自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以後採取三種不同的方式，此三種方式，現已明白列入於新的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即『甲、會計制度健全，經稅務機關審定，認爲可資徵稅確據者，得採用自報查賬，依率計繳方法；按其營業額及所得額分別計徵；乙、不合前款標準者得採用自報公議，民主評定方法，結合調查資料，依率計徵；丙、較小業戶，得於民主評議之基礎上，採用定期定額方法計徵。』如此三法並用，可保證稅收的穩固。

第三、輕稅重罰——自一九五〇年三月統一財經工作，全國財政收支統一於中央以後，中央人民政府便能權衡全局，分別緩急輕重來合理支配，因此節省許多不必要的開支，人民負担亦得以減輕，例如食鹽稅率減了一半，農業稅率亦由百分之十七減至百分之十五，工商業稅及共他各稅經調整後亦已適當減輕。但對於逃稅是採取重罰的。

要而言之，人民租稅的征收，共目標是爲了籌集革命建國所必需的資金，共徵收的政策是要『平衡城鄉負担，』『實行合理負担，』並獎勵生產事業，至改善稅務行政，那還是補助的政策。

三　人民租稅的體系

為了實行上列的租稅政策，人民租稅又選擇了那些稅種？並且這些稅種，構成怎樣的租稅體系呢？

關於人民租稅的稅種，根據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全國稅政實施要則，有下列幾種：

1、貨物稅　　2、工商業稅
3、鹽稅　　4、關稅
5、薪給報酬所得稅　　6、存款利息所得稅
7、印花稅　　8、遺產稅
9、交易稅　　10、屠宰稅
11、房屋稅　　12、地產稅
13、特種消費行為稅　　14、使用牌照稅

上列稅種中，有薪給報酬所得稅，遺產稅已停徵，房產稅與地產稅已合併為一。於是現行之稅種實際上只有十二種。這十二種是貨幣租稅。而農業稅在一九五〇年是徵收實物，亦即為實物租稅，貨幣租稅入於公庫，實物租稅入於中央公糧庫。其處理的方法是不同的。

我們如把現行的稅種，按其性質，列成下表：

人民租稅的體系
- 收得稅（直接稅）
  - 收益稅
    - 工商業稅
    - 房地產稅
    - 農業稅
  - 所得稅——存款利息所得稅
- 支出稅（間接稅）
  - 消費稅——貨物稅、鹽稅、關稅、屠宰稅（間接稅）
  - 特種消費行為稅（直接稅）
- 流通稅（準間接稅）
  - 財產流通稅——交易稅
  - 價格流通稅——印花稅
  - 交通稅——使用牌照稅

上列這些是重要的稅種。此外各地因地制宜的地方稅，自然還有，例如牙稅、碼頭使用費，亦還見之於『統一管理一九五〇年度財政收支的決定』中。

其次之，上列這些租稅，一年以來，有的有單行的暫行條例，有的沒有，但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政務院修正通過了工商業稅暫行條例、貨物稅暫行條例，並通過印花稅暫行條例、屠宰稅暫行條例、利息所得稅暫行條例。以下我們對幾個重要的租稅來加以論列。

四　幾個重要的租稅

第一、工商業稅——工商業是由營業稅、特種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一時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演化過來的。也可說把上列這些租稅統一起來，—主要是把營業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統一起來了。但工商業在課稅方法上與舊有的稅捐，有着顯著的不同。

（1）課稅範圍較廣——凡在本國境內之工商營利事業，不分公營、私營、公私合營或合作事業，除另有規定者外，均依條例於營業行為所在地納稅。這便是採屬地主義；不僅課及本國工商業，而且課及境內的外國工商業；不僅課及私營企業，而且課及公營企業，至於公私合營或合作事業，原則上亦均須課稅。這因為工商稅為成本之一，故一切工商業原則上均應課及。尤其是公營事業，在舊時代曾經免稅，而在新時代，則國營企業將日益重要，而成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因素，國家如不予課稅，將失去一重要之稅源，且為謀國營企業成本會計的精確亦應課稅。所以公營企業亦在工商業稅的範圍以內。

（2）課稅標準——工商業以經營方式，分為固定工商業、臨時商業及攤販業。除臨時商業稅及攤販業稅的稽徵辦法，另由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制定外，固定工商業應納之工商業稅，分為依營業額計算部分（以下簡稱營業稅）及依所得額計算部分（以下簡稱所得稅）。唯公營企業之工商業稅，其營業額部分，就地交納營業稅，其所得額部分，則另定辦法，提取利潤，不交納所得稅，試列表說明如下：

（課稅標準）	（私營企業）	（公營企業）
營業額部分	營業稅	營業稅
所得額部分	所得稅	提取利潤

營業稅是按月或按季交納，所得稅於年終結賬後交清，但為便民，先於每年第二季度終了時估徵一次。所以營業稅是按利益說課稅，任何工商業均可課及，而所得稅是按能力說課稅，實際其所得額不到三百萬元的是不被課稅的，所

以這兩種稅未必重複課及；如被重複課及，那便表示該企業能力較强，多取之不爲虐。那是一種形式的重複課稅。

（3）計算方法——工商業稅的計算方法，分爲兩部分，即營業額與所得額。前者減除甚少，（也可說是沒有）乃爲一種毛益法，後者減除甚多，乃爲一種純益法。營業額的計算規定如下：（甲）營業總收入額—按銷貨總額減除銷貨折讓及銷貨退回後之銷貨淨額計算，（乙）營業總收益額—按報酬金、手續費、匯費、利息、保險費及其他收益額計算，不得減除任何成本及費用，但保險業之分出保費應自保險費總額內減除之。（丙）佣金收益額—按其全額計算，不得減除任何成本及費用。總之，營業額的計算，是說不上有什麼減除的，但所得額的計算，是按每營業年度或實際經營期間之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用及損失而得，故其減除的項目是很多的。

（4）稅率——工商業稅之中，營業稅是按利益說課稅，故其稅率亦用比例稅率。其稅率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乃依各企業的性質而應用輕重不同的稅率。所得稅是按能力說課稅的，故其稅率亦用累進稅率。（全額累進）共稅率共分二十一級，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是按所得額的遞增而累進的。但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又另定有優待辦法，即如本文第一節所述政府爲獎勵生產，定有『工輕於商，日用品輕於奢侈品』的原則。故於重要的工業，稅率方面予以一定的優惠，有的照原級的稅率減徵百分之四十，有的則減徵百分之三十。有的百分之二十，有的百分之十五，有的百分之十。這使重要的工業容易發展，而有助於國民經濟的繁榮。

第二、貨物稅——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公佈貨物稅暫行條例。茲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通過。貨物稅在形式上近似於城市稅，但因其爲消費稅，經過轉嫁，結果是城鄉共同負担的稅。作爲人民租稅的貨物稅與舊時代的貨物稅，有若干不同之點：（1）是擴大稅目；即在國民黨時代，貨物稅的稅目較少，少至四、五項，多也不過十餘項。課稅品的選擇，多限於大衆消耗品；至有許多奢侈品未能列入，結果，資產階級負稅獨輕。自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貨物稅暫行條例公佈後，改爲十大類，四十二目，一九五細目，一一三六品名。至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中央以二屆稅務會議討論修改的各種稅法尙須作補充整理，故將簡化與合併的稅目稅率作一初步調整，於是應徵品名由一一三六種減爲三五八種，減少達三分之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貨物稅將稅目減爲八類，而應徵品爲一百九十六種。（2）實行生產課稅；即大生產應用駐廠徵收或駐場徵收，中等生產用查定徵收，非廠場生產用起運徵收，舶來品而屬於貨物稅的範圍之內者，用就關徵收的方法，要之，課稅的形式雖有不同，其要旨均在生產過程課稅，一稅之後，通行全國不再徵課。（3）貨物稅的計徵均用從價稅法；這一方面，也許爲謀稅收的穩定，他方面也爲謀負担的合理。貨物稅稅率是用比例稅的。稅率依課稅品的品目而不同，最高的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例如紙烟甲級）最低的只及百分之三（例如煤、生鐵、麥粉等）一般言之，奢侈品或嗜好品稅率較高，日用品稅率較低，必需品稅率最低。如此，庶可『實行合理負担。』

第三、關稅——政務院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公佈海關政策與海關工作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的有兩點要義：一、是從財政關稅到保護關稅；二、是解除與關稅無關的海港管理權。因我國自一八四二到一九二二年（八十年間），海關大權落入總稅務司，甚至海關行政權、海港管理權、關款存放權，均落入外人之手，而海關徵稅，亦惟以財政收入爲依歸，所以去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決定，是奠定了海關自主的基礎。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政務院發佈關於設立海關原則和調整海關機構的指示，更明白敘述『設立海關的基本原則：必須一反過去反動統治爲服從帝國主義大量傾銷外貨並廉價吸取原料的經濟侵略措施，濫行開放對外貿易，到處設立海關機構的方針，而嚴格以獨立自主精神根據國家經濟情況的需要，在應開放對外貿易的地方設立海關機構。』因此，根據了設關原則，決定暫在全國範圍內，設立地方海關（或關）二六處，分關九處及支關三五處。關稅由海關徵收，海關行政由海關總署負責。海關總署是統一集中的和獨立自主的國家機關。

第四、鹽稅——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一日政務院公佈關於全國鹽務工作的決定。在這個決定裡規定，鹽政由財政部鹽務總局辦理，一掃過去總稽核（外人）大權獨攬的恥辱。鹽制是生產運銷，公私兼營，而且是按銷定產；鹽稅是從量核定，就場徵稅，自由賣買。但此就食鹽而言，至於工農業用鹽則特予免稅，漁業用鹽乃按稅率百分之三十徵收。凡此均所以減輕工農業的成本，鼓勵工農業的生產。

第五、印花稅——印花稅爲流通稅之一，舊的印花稅凡（1）商事憑證；（2）人事憑證；（3）產權憑證；（4）許可憑證，除另有規定者外，均須課稅。故國民黨的印花稅目，便有三十五項之多。但依據新的印花稅條例，其課稅範圍便顯然不同。印花稅的對象，只限於『因商運產權等行爲所書立或使

用之憑證，』（印花稅暫行條例第一條）故其稅目亦只有二十五項，即比過去少了三分之一。這裡所減少的項目，主要是人事憑證與許可憑證。例如婚姻證書、延聘書據、學校畢業證書、證明身份或資格之執照以及運輸護照及旅行護照等項目，均不見於新稅法中了。印花稅率，有比例稅（比例貼花）與定額稅（定額貼花）兩種。比例貼花的稅率，分爲萬分之一，萬分之三及千分之三；定額貼花之稅額，分爲二百元、五百元、二千元及五千元。印花稅由中央財政部稅務總局監製發交各地稅務機關銷售，各地稅務機關並得委託銀行、郵局、合作社等代售，其納稅義務人爲憑證書立人、領受人、或使用人。

第六、利息所得稅——凡在本國境內有下列利息所得之一者，除另行規定者外，均課利息所得稅：——（1）存款利息所得；（2）公債、公司債及其他證券之利息所得；（3）股東職工對本業戶墊款利息所得。利息所得稅的稅率爲百分之五，按利息所得額比例計徵。由支付利息或經付利息者扣交。但下列各款利息所得免納利息所得稅：（1）教育、文化、公益、救濟機關或團體之事業基金，其存款之利息所得，全部用于本事業者；（2）銀錢業之放款及其總分支機構或同業間往來款項之利息所得；（3）投資于企業之股息所得；（4）工農個人相互間借貸之利息所得；（5）每次利息所得不滿五千元者；綜上所列，便是獎勵文化教育事業，獎勵生產投資，以及優待小額的利息所得。

第七、屠宰稅——凡屠宰猪、羊、牛等牲畜者，須納屠宰稅，但自養、自宰、自食的牲畜，可以免納，如有出售者其出售部分，仍應納稅。至耕畜、運輸畜、種畜、乳畜、胎畜、幼畜應予保護。屠宰稅的課稅乃按牲畜屠宰後的實際重量從價計徵，稅率爲百分之十。其徵收方法係由稅務機關直接征收，不得採用包稅制。如距離稅務機關較遠之地區，得委託區、鄉（村）人民政府或合作社代徵；代徵機構得在代徵稅款內，提給百分之三以下的手續費。

第八、農業稅——以上這些租稅，多少是屬於城市稅的範圍。與城市稅相對立，則有農業稅。農業稅是由田賦演化過來，它將田賦公粮、等一條鞭化、而實行累進課稅，農業稅的課稅對象爲土地，納稅人則爲土地收入的所得者。計徵的方法，則以戶爲單位，按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平均農業收入不超過一五〇市斤之糧者免稅。其在一五〇市斤以上直至三四一一市斤以上，劃分四〇級，按級課以全額累進稅。農業稅率，平均爲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去年秋徵率爲百分之十七）。

第九、其他的租稅——有特種消費行爲稅（如筵席捐娛樂稅等），使用牌照稅（如船車等交通工具的牌照稅）以及碼頭使用費等，均爲地方稅的性質，這些稅除用特殊的例外，收入均不多，此處不贅。此外地產稅亦爲地方稅。

五 國地租稅的劃分

上列這些租稅如何作國地的劃分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關于統一國家財經工作的決定』（一九五〇、三、三）與『關于統一管理一九五〇年度財政收支的決定』（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作初步的認識。尤其從後一決定中，可以知道國地稅收的劃分有如下表：

- 中央稅
  - 公粮——（農業稅）
  - 關稅、鹽稅、貨物稅　工商業稅。
- 地方稅
  - 地方附加公粮——（農業稅）
  - 存款利息所得稅、印花稅、交易稅、屠宰稅、特種消費行爲稅、房地產稅、使用牌照稅、牙稅、碼頭使用費等。

地方稅實際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留用部分，乃由人民政府財政部根據各大行政區，各中央直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財政預算劃定。一部份是各大行政區所屬省（市）人民政府留用部分，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財政部予以劃定。爲了簡明，表列如下：

中央直轄省（市）留用部分——由中央財政部劃定。

各大行政區所屬省（市）留用部分——由各大行政區財政部劃定。

一般言之，目前重要的租稅，多集中於中央，地方稅劃撥之權亦掌握於中央，這因爲我國實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收入集中，他方面支出亦是集中，如此才能發揮行政的效率。我國目前國家可以機動使用的現金與實物尚不十分富裕，如不掌握在中央而任其分散在地方，自不利於平衡財政，繁榮經濟，所以對於財力的集中，是一件明智的事。

其次我國國地租稅的劃分，主要是採獨立稅制（亦稱稅源劃分制），就是中央有中央的獨立稅收，地方有地方的獨立稅收，這樣鞏固了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源，也就助長了各級地方事業的發展。但也不無附加稅制的存在。（下轉41頁）

剩餘價值說與馬列主義經濟學

王台

剩餘價值說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礎與中心，因而我們對於它的重要性，是必須認識清楚的。

一　剩餘價值說的階級性和戰鬥性揭露了資本家生產的本質

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者，爲着替資本主義辯護，對於資本家的生產，有幾種說法：

（1）資本家所以能有資本，是因爲他們積蓄了自己的勞動生產物；因爲他們節約，不願滿足自己的迫切需要。（西尼歐）

（2）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在於進取的、精明的、幹練的事業人材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精神。（桑巴特）

（3）資本家與工人根據相互服務原則來交換，資本家拿資本來替工人服務，而工人拿勞動來替資本家服務。（巴師夏）

上述這些說法，雖各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從表面現象來說明問題，有意地企圖欺騙工人階級，而否認資本家生產剝削的本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說則從階級關係上有力地駁斥了這些胡說而揭示了『資本就是死價的勞動，它和吸血鬼一樣，只靠吸取活的勞動爲生』。

資本爲甚麼能進行剝削呢？這就必須承認資本不是物品，而是一定歷史時期的階級關係。換句話說，離開階級關係，就無法說明資本。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時代，不僅商品是大量的、普遍的、佔着支配地位的東西，而且勞動力本身也變成了商品，所以有勞動力的買賣，乃是資本原始積蓄——少數人用極端殘酷野蠻的手段，掠奪大多數人的生產手段——的結果；使生產者脫離自己的生產手段就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成爲無產者。所以馬克思說：

『自然界未曾在一方而生產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在他方而生產祇有勞動力的人。這種關係，不是自然史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代共有的社會關係，那分明是既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多次經濟革命全系列古代社會生產組織滅亡所得的產物』（資本論第一卷一一九頁）

可是，造成有充分數量的自由人力，只解決了資本主義生產所必要的條件的一半，而另一半的條件，就是積蓄財富。

資本是從那裡來的呢？是一方而採用對外貿易、掠奪戰敗國、販賣人口、搶掠最富庶的海外各國；另一方而是對自己本國人民的掠奪：如經營高利貸、海上掠奪，及做高利貸式的販運洋貨，或者是用徵稅、發公債等等方法，——這種積蓄財富，在資本原始積蓄的歷史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見，有了大批的「自由」勞動者和大批的財富，才能進行資本家的生產。

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生產，乃是在一定的階級關係下的生產。勞動力的買賣，馬克思用科學方法，就其純粹情況上來看，是等價交換的平等關係，但在事實上，情況更爲複雜，勞動力的價格，往往是低於它的價值而出賣的，特別是在工人大批失業的情況下，工資更是降低，這是因爲在勞動力買賣的市場上，工人是處於不利的地位。勞動力買賣的契約的締結，即在生產過程中間，開始了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這時榨取與被榨取的關係，就代替了原先的「平等」關係。因而，從勞動者看來的貨幣、生產手段等物品，現在在資本家手中却變成了剝削勞動者的工具了。

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秘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由於階級利益的限制，是不能說明也不願揭露的，因而他們只是從商品流通的表面現象去說明。他們認爲是：『使用價值在交換雙方的使用利益不同而增加了新的價值；』又認爲是：『「從高價販賣」與「低價收買」而增加了新的價值，』——這兩種錯誤說法，都不能說明剩餘價值的源泉及剝削的秘密所在；因爲前者是商品所有權的轉移；後者的結局都會彼此抵銷，一切照舊，——即使不等價交換，也是欺

騙行爲罷了。馬克思說：

『假令互相交換的是等價物，那不會發生剩餘價值；假令互相交換的不是等價物，那也不會發生剩餘價值。流通或商品交換，不創造任何價值。』(資本論第一卷一一四頁)

那麼資本家榨取剩餘價值的秘密，究竟何在呢？剩餘價值說揭破了這個問題的秘密。

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是可以創造價值的。資本家發現了它，而按照它的價值把它買進來。勞動力的價值，也如其他一切商品一樣，是由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所決定。(就是由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所決定)貨幣所有人買得了勞動力，就能隨便使用，即強迫工人整天作工，比方做十二小時的工，實在工人在六小時內(「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能創造出足以抵銷其生活費的產品，而在其餘六小時(「剩餘」的勞動時間)內，則創造資本家所不償付任何代價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這就是剩餘價值的源泉及剝削的秘密，也就是資本家生產的本質。

剩餘價值說代表着無產階級的利益，以戰鬥的姿態，揭穿了資本家生產的階級關係，因而也就撕破了資本的拜物教者的假面具，粉碎了企圖掩蓋剝削實質的一些資產階級代言人對工人階級的騙局，從而使工人階級的鬥爭有了自覺的思想上、理論上的武器；同時剩餘價值說(與馬克思的哲學學說、社會主義革命學說)一經掌握了無比強大的工人階級大軍，也就贏得了，無產階級革命必然要走向勝利的物質力量。

二 剩餘價值說的科學分析得出資本主義必然死亡的結論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由於見解的狹窄性，及其階級利益的限制，他們不能發現資本主義滅亡的規律；他們認爲：資本主義在人類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已存在，因而認定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與永恒性。馬克思則發現了資本主義歷史性的限制，而明確指出：『資本主義不是永恒的、自然的、和絕對的人類社會形態，相反的，它是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產物，它完成了它的一定的歷史任務之後，是必然要滅亡的。』馬克思這一科學的預見性，是從分析『生產手段的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這一基本矛盾而來的；同時也是剩餘價值說的必然的結論。

資本家生產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利潤和更多的利潤，因此就想盡一切辦法來改良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創造出新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之物質基礎。但他們之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其用意就在於積累起過去的「物體化」的勞動，用它支配現在活的勞動，而使它變爲資本；因此，也就使階級的矛盾愈益尖銳，工人階級的鬥爭，也就隨着資本的積蓄而猛烈地展開了。所以生產力的提高及再生產的擴大，同時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各種矛盾的不斷增長。

由於生產技術不斷的改進，其必然趨勢就是機器代替了人的勞動，形成了機器排擠工人的現象，而造成了人口的相對過剩，造成了龐大的產業後備軍。當饑死的危險迫在失業工人的眼前時，他們是顧不得條件好壞的，只要有工做就行，這就又影響了在業工人的工資，使其不斷地降低。這樣一來，就使整個工人階級處於絕對貧困的地位，社會購買力亦因而低落，尤其因爲資本家生產的盲目性及無政府性，大批商品沒有銷路，結果使資本家不得不減縮或停止生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商品堆積如山，或任其霉爛，或將其焚燬，或倒入海中……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旣因生產更多的商品，而走上飢餓與死亡的道路，因此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自然受到了劇烈的破壞；資本家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也就無力支配其財富了——這樣的經濟危機，便週期性地爆發出來，由一個生產部門擴張到其他生產部門，由一國擴張到別國，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到垂死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由經濟危機發展到侵略戰爭，而它所帶來的災難，又落到了無產階級的頭上。資本家自已創造出來的掘墓人，(強大的有組織力量的無產階級)這時就起來進行強力革命，把資本主義送到死亡的道路上去——這就是『生產手段的集中與勞動社會化，一達到與資本主義外殼勢難兩立之點，這種外殼就要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六五二頁)

剩餘價值說就這樣地判斷了資本主義的命運。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雖然有一些(布倫塔諾、霍布森、斯特魯威、桑巴特之流)也不直接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但是却認爲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的矛盾，漸形緩和，可以和平地生長成爲社會主義。又如托洛斯基及其他孟什維克等叛徒，更無恥地高唱着『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這些歪曲論調，其目的無非是想把工人階級從對資本家的鬥爭中拉出來，藉以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或者是叫工人階級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理論上的事情，不用在實際行動中去理會它，工人們祗要安心在工廠裏受剝削就行了。

剩餘價值說決不是僅從理論上判斷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而且進一步指出：它怎樣才能滅亡，以及用甚麼方法才能使其滅亡。這就是說：一方面用這個理論把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告訴了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又從理論上來指導工人階級的實踐鬥爭，用行動來消滅剩餘價值的剝削，來改變無產階級的地位。

資本主義的滅亡，不能以和平的方法實現，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以至强力革命，才能建立代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和東南歐新民主主義諸國，都是顯明的例子。

三　對剩餘價值說的基本認識

剩餘價值說在馬列主義經濟學中，所以成爲理論的中心；所以能够科學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成長和滅亡；所以能够揭露了資本家生產的本質，乃是由於它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之具體運用。

資本主義的生產，乃是兩個階段對立之下的生產，存在着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矛盾，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愈益展開了尖銳的階級鬥爭。這一特徵，離開階級對立關係是無法說明的；因而，剩餘價值說的首要任務，就是按照辯證法的「事物含有內在矛盾」的規律，來澈底暴露和揭開這一矛盾。

剩餘價值說在分析資本主義矛盾之後，而得出「資本主義必然要死亡」的結論，乃是運用了辯證法的運動規律；從而，粉碎了所謂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恒原則」，也粉碎了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恒觀念」等胡說八道。

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

資本主義不會自動崩潰，它是由無產階級經過無數次的階級鬥爭以至强力革命，才能使其滅亡的。

由此可見：剩餘價值說的理論性與實踐性的一致，不僅是在於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本身問題，而且在於它是一個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傑出範例。

這一傑出的經濟學說，使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胡言亂語，遭受可恥的破產；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傑作的光輝照耀之下，也是眞相畢露，無所遁形；從而這個理論就成爲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鬥爭的革命武器！

（上接38頁）例如地方附加公粮與城市附加政教事業費，都是地方附加稅的性質。但這些附加稅與過去不同。過去的附加稅，可不問用途，任意附加，附加到如何程度亦漫無限制，例如過去的田賦附加便是最好的典型。但目前的附加稅，其用途限于一定的目的，例如地方附加公粮，係用以解決鄉村各項經費，屬於縣人民政府征收。附加政敎事業費，係用以充當城市的市政建設費，郊區行政敎育費，小學敎育文化衛生費三項支出。以上兩種附加稅的稅則，稅率，及征收方法等，均須報中央財政部核准後始能征收，且地方附加公粮最高不得超過正粮的一五%。從此可知人民租稅的附加稅與舊時代的攤派性的附加，不論在本質上與形式上，均是不同的。

*　　*　　*　　*

一年以來，稅務工作的加强，輔以支出的節約，現金的管理，終使通貨膨脹，無形消滅，全國物價趨於穩定。經濟也由復蘇而走上繁榮之路。但國內反動勢力雖已顚覆，而國外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猶未肅清，我們在財政上不能不有準備，亦即是在租稅方面不能不有繼續的改進，以謀租稅收入的加强與負担的更趨於合理。

我國的租稅就形式言，當爲資本主義租稅的體系，但從本質上看，由於社會經濟日在演變，我國的人民租稅亦日在蛻變中，不能再列入資本主義的租稅體系了。例如工商業稅，因加重了公營事業的因素，自然加重了社會主義經濟收入的性質，貨物稅的擴大稅目，自然平衡了貧富間的負担。農業稅的採用全額累進，加重了地主的負担而使封建勢力遭遇到嚴重的打擊。此外，消極方面薪資所得稅尚未征收，這使勤勞階級多得一喘息的機會。總之，人民租稅，一方面對一般人民與生產事業有其保護性，一方面對反動勢力有其戰鬥性，這樣的精神爲舊租稅中所絕對找不到的。

從實質上看，人民租稅是依據負担能力課稅的。爲了革命建國，籌集國用，必須使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而且使錢愈多的出得愈多；這不專爲國用，同時也爲了資金的積累，社會主義經濟的加强，使我國的經濟，從新民主主義日漸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一九五〇、一一、一〇、上海大雪日）

論中國父權社會對於舅權的抑制

潘光旦

恩格斯在他的「家族、私產、與國家的起源」一書的第二章裡有如下的一段話：

在日耳曼人中間，在它恭圖斯作記㊀的時候，從母權轉進到父權的過程大概完成得還沒有多久，因爲我們從記載中知道，母親的弟或兄，在母權的社會裡，原是氏族中最親密的男的血親，到此雖已進入父權社會，而對他的親密的程度，在大家看來，幾乎比一個人對父親的還要高些。

中國當初的情形又如何呢？這是一個值得加以探討的問題。中國歷史，比日耳曼的歷史要長得多，從母系社會轉入父系社會，也要早得多。這種轉變雖是一定發生過的，但因爲時代悠遠，證據的尋找，一定比日耳曼方面的還要難。直接的證據固然無法尋覓，間接的證據，有如恩格斯所說的舅甥關係的親密程度，尋覓起來，怕也未必容易。我想在這篇短稿裡姑且試一試，如果能找到一些，然後再作父系必從母系轉變而來的推論，我們便可以多一些把握了。

舅甥關係的問題就是所謂舅權㊁的問題。母系社會裡的母舅，事實上就是舅權。摩爾更㊂以後的人類學的發展可以說是已經把這一層確定了的。中國社會，自進入父系與父權以後，舅權的命運究竟如何了呢？表面上它當然是很快的消滅了，以客觀的情勢而論，它也自非消滅不可，但在消滅的過程中，是不是會經發生過死灰復燃的危險？或事實上雖無此種危險，而關心社會制度與維護社會秩序的人深怕此種危險發生，是不是有過一些防杜的措施？這一類的問題是不妨提出的。至於答覆如何，則要看歷史所能給我們的資料了。

恩格斯所說的關於日耳曼人的情形，我想我們也有過一些，父權社會的初期裡固然有，即在父權已經確立以後，也非完全沒有，不過在程度上究竟比父權要差得遠就是了。而正因爲父權已經確立，對於舅權的復活，已不再有所恐懼，父子之間所不能有的親密程度，有時候反可以求諸於舅甥之間。近時研究殷代文化的人說：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太甲悔過，始復迎歸於亳；太甲是君，伊尹是臣，何以有此權力呢？有一個解釋是：伊尹是太甲的舅父，彼時去母系社會不遠，進入父系社會未久，所以舅權還很大，舅甥之間的親密程度還很高，恩威並重，所以才敢這樣做。如果伊尹和太甲眞有舅甥關係，我認爲這解釋是很對的；可惜我記不得提出這說法的作家了，因而一時無法作更具體的徵引。不過舅父的恩威並重，即在父權已經根深蒂固的後世，也還是一個尋常的事實。例如成年的弟兄吵架，到不得開交時，總要請娘舅出來調解；兄弟分爨分家，也總要把他請來做中正人；老父母健在，要請他，不健在，當然更少不得他。別處我不敢說，至少大江下游南北有此習慣。

在華北與江南，至少在河北省和太湖流域的一部份地區，女兒出嫁，要娘舅背上喜轎，我認爲也是很有意義的。在母系時代，婚姻是男就女，不是女就男，如今要女的『移樽就教』，非有一個恩威並重的人加以推挽不可，這人當然又是娘舅了，別人都不够分量。然則背甥女上喜轎也未始不是母系與舅權社會的一個變相的殘留。

舅父的恩威並重，這是一些零星的正面的證據，但都不重要。重要的倒是一些反面的證據。我相信父權成立而尚未確立的初期，舅父的恩情與權力是特別受到過抑制的；否則父權的確立就成問題，就要延緩。這一點從喪服的沿革上就可以看出來。父權成立後，喪服對於父黨與母妻黨之分甚嚴，父黨的服比母妻黨的服要重得多，服的對象也多得多。儀禮喪服子夏傳說到一個原則，『外親之服皆緦。』所以舅父與外甥之間，岳父母與女壻之間，姑舅表兄弟之間，一方死亡，一方即服緦麻三月。表兄弟之間，三月也許不算太少，但舅甥翁壻之間總若恩情見得薄了一些。舅對甥，翁對壻，三月也可以算不少，但甥對舅，壻對翁，也總像太短了一些。表兄弟，屬平輩，所以平等相報；舅甥翁壻不屬平輩，何以也平等相報，也是不易索解。這一些疑問的解釋，就是當初定服制的時候，有過一番故意的抑制。舅父是必須抑制的。起初的娘舅後來往往成

爲岳父，父系氏族成立之初，實行兩氏族間的對換通婚，娘舅變岳父，外甥變女壻，更成通例，甚至於不可避免。（自來舅、姑、甥三稱謂各有兩種用法，即由於此。）於是女壻對岳父的服也就跟着被抑制了。

喪服把外甥對娘舅的服規定爲三月，又何以知其必爲抑制呢？直接的說明沒有，自然不會有。間接的是有的。喪服子夏傳也叙到一個人對外祖父母，或對從母，即姨母，應服小功，即五個月。這兩個例子是都違反了『外親之服皆緦』的原則的。何以要違反，而成爲兩個例外？傳文對外祖父母的解釋是『以尊加』，對從母的解釋是『以名加』，以有母名，故加。外祖父母與姨母總算不壞，死後可以得到五個月的紀念，而娘舅吃了虧，只有三個月。其實講尊講親，娘舅又何嘗在這幾個人之下？舅者，久也，舊也，他的尊與親是久而至於舊的；母系制度下的久與舊，到了父系與父權制度之下就不得不革新一下了。即其爲尊與親不得不打折扣，說打一個六折罷。打折扣就是抑制。

從母服五月，而祇服三月，對此最初提出非議的，晉有袁准，六朝宋有庾蔚之。到了唐代，終於把上面所說的折扣給補上了。太宗貞觀十四年詔議將甥對舅服改爲小功五月，舅報甥猶服緦；高宗顯慶年間，又改甥舅之間同爲小功；玄宗開元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之間，改修五禮，詳定凶禮之制，這修正案始完全確定。宋司馬光的書儀㊃、朱熹的家禮㊄、聶崇義的三禮圖、明會典、清會典，都沿襲未再改動。朱熹對於儀禮喪服所定的緦服雖亦曾勉作解釋㊅，但總覺有所未安，所以他說；『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爲而獨輕也？』㊆無論如何，他在家禮中是接受了唐人的修正的。修正，則合乎自然之情，不修正，則合乎社會之禮，合乎目的在維繫與鞏固父權的禮。貞觀年間反對修正的人，和後來對此修正作攻擊的人，所用的主要理由就是這個；甚至於有人認爲唐代韋氏武氏之亂，便是這一次輕率的改變禮制的舉動所引起的。不過贊成修改的人，大概認爲父權的體系原屬天經地義，決不因此區區的修改而發生變遷。或者更準確的說，父權的發展到此已是蒂固根深，不再有退回到母系社會的危險，因此，對於甥舅間的情感上的聯繫，不再有故意抑止的必要。既然無須抑制，則服制自不妨由三月擴充到五月，而在民間的實際習慣裡，更有擴張到大功九月以至於期服的。把人情上原有所不得已的一個死後留念的期限，定要用近乎功令的方法，加以緊縮，不是抑制，是什麼？後來到無須抑制時，把抑制撤銷，更足以證明當初這舉動是屬於抑制的性質的。

甥舅服制的受到抑制是無獨有偶的。舉其偶，我們的獨就可以更見得顯然。叔嫂的服制也是受過抑制的，禮有『同爨緦』的原則㊇，又有『同居生親』的原則，故女爲娣姒服小功，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服緦：同爨同居則有恩義，有恩義則有服，親則小功，疏則緦；也自說得過去。妯娌有服，堂妯娌也有服。叔嫂一樣的同居共爨，卻無服，豈不甚怪？是很怪。我們以爲怪，從三國魏到唐初，不少議禮的太常博士先生們也以爲怪。一直到貞觀開元年間，和甥舅服制的改定同時，把叔嫂服初次規定爲小功，紛紛的議論方才平息，後來文公家禮，明清兩代的會典也就率由舊章，未再改動。叔嫂無服的所以爲一種故意的抑制，比舅甥的例子更見得清楚，舅甥服緦，而此則根本無服；其所以必須抑制的理由，我們也比較熟悉，就是男女之嫌，在所必避。其實舅甥服制之遭受抑制，也何嘗不爲了避嫌？避男女之嫌，事實上等於防止蒸婚的再度出現；避舅甥之嫌，事實上等於防止母系的捲土重來。道理是完全一樣的。上文云云是反面的證據之一。

舅甥在母系與舅權社會裡的關係，事實上等於父子在父系與父權社會裡的關係，就是，財產名位的承襲，一則自舅而甥，一則由父及子。一到父系父權的時代，舅甥之間其它方面的親密關係，有如服制所表示的，固然應當限止，此種承襲的關係自更在絕對必須防閑之列了。抱外甥做兒子，來承繼宗祧，事實上儘有，並且還不少，但禮教是絕不許可的。據說孔子作春秋，褒貶的筆法裡，對於這一層是特別嚴厲的。最好的一個例證見於魯襄公六年。經：「六年……秋……莒人滅鄫。」穀梁氏在三傳中『傳』得最詳：『莒人滅繒（即鄫），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這異姓是誰呢？這卻須參考前一年的公羊傳才清楚。公羊襄五年說：『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㊈也。』注文更說明：『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外孫，就下一輩言之，就是外甥。鄫人之後不以同族，而以外甥，是自取滅亡；莒人以其公子後鄫，是滅人之國。是何等嚴重的一個說法！穀梁氏所云『別之而不別』一語，最可玩味。父系好不容易從母系分別出來，是『別之』；如今卻要把外孫或外甥取來，作爲繼立之人，是『不別』，是行了夷狄之道，是把父系攪亂了，把父權顚覆了，眞乃非同小可、值得重重的貶斥的一件大事。說『滅』，是重貶了鄫人；（下轉69頁）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之研究

——釋辰

周谷城

辰字古文字學者或釋為蚌殼，或釋為犂頭。其實這個字既不像蚌殼，也不像犂頭。然則像什麼呢？就形體言，正像人在崖下鑿石之狀。辰字甲骨文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分開來看，實包括兩大部份。上面一部份為石頭，這大概沒有什麼疑義了。石在甲骨文中，幾乎都如此形。例如從石之磬字，甲骨文作□，作□，作□，作□。裡面的石，便是□□□□等形，與辰字的上部無異；因此我們且斷言辰字的上部為石，亦即石崖。

至於辰字的下半部，則為人在崖下鑿石之狀，包括人形，手形，器具如槌形與鑿形之類。我們就字的全局看去，也確可看出這些因素的一種或兩種以上。若拿與畏字下半部比較研究，還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畏字的下半部與辰字的下半部完全相同。吳夌雲小學說畏字上從田，下從辰省，這是不錯的。畏與辰較，不過一從鬼頭，一從石頭而已。畏字甲骨文作□，作□，作□，作□。金文作□，作□，作□，作□。鬼頭之下，有人形，有手形，有器具形；而且最完全的形式中，器具有兩件。商承祚不懂這個道理，謂既從卜，如加攴，初形已失矣；其實這正是一個最完全的初形。器具兩件，左右手各執一件，不是很好嗎？我們常於旱災嚴重之時，看見農民用紙紮成雷公之形以求雨。其形為頭上有兩角，全身墨黑，牙齒長而露出，眼球白而突出，左手執鑿子，右手拿槌子；初看很覺可畏。據農民云，雷公能把天鑿一個洞，雨就會落下來。這紙紮的雷公形，最足以幫助我們了解畏字的下半部，同時也恰恰足以幫助我們了解辰字的下半部。畏字的下半部大概是以手持杖擊人之狀；辰字的下半部則象徵右手拿槌子，左手拿鑿子，在崖下以槌擊鑿鑿石之狀。

以槌擊鑿鑿石，必有震動，必發大聲，必有崩潰，必有破裂，必有分開，必有開啓，必有潰散，等等現象。這等等現象，正是辰字的基本意義。我們的祖宗拿這辰字作字根，造出許多派生的字來。如代表蚌殼之蜃，代表農具之傉或鎒，便是由辰派生出來的，其他如震，振，侲，晨，農，□，蓐，耨，脣，□，宸，賑，脤，娠等字無不含有辰字的基本意義。我們現在且用科學方法，一一證明如次：

雷發聲，連房屋都可以打破，叫做震。說文云，劈歷，振物者；從雨辰聲。易說卦云，震為雷。春秋僖十五年震伯夷之廟，疏云雷之甚者為震。釋名云，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春秋文九年云地震，疏云：公羊傳曰，震者何？動地也。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震字含有震動，破裂等義，這是人人曉得的，且不多說。

使潛伏的東西爬起來叫做振。說文云，振，一曰奮也；廣韻云，裂也，又動也。禮月令云，孟春蟄虫始振，便是說潛伏的東西爬起來了。敲鑼鼓使發聲也叫做振；孟子裡面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都屬這類的意思。把人家的智慧發掘出來也叫做振；莊子田子方篇是必有以振我也云云，便是啓發我的意思。

以震動身體為業的小孩們叫做侲。說文云，侲僮子也，從人辰聲。方言云，燕齊之間謂養馬者曰侲；廣韻云，侲子逐厲鬼童子也。養馬者必能跳動，逐鬼者必須舞動，故以辰字為偏旁描寫之。侲從辰，含有震動之義，故又可與振字互用。史記淮南王傳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廣曰西京賦（西當作東）振子萬僮，駰按薛綜曰振子童男女；是古字作振，今東京賦及注文皆作侲；西京賦侲童程材，李注引史記亦作侲，並後人所改謂之振者。再其次侲不獨與振互用，且與萬對偶：振為動，萬為舞；上面所謂振子萬僮，意即動的孩子與舞的孩子。左莊二十八年傳振萬注云：振動也；萬舞也。振與萬義，同是舞動。

胎兒在母體內分別成長活動曰娠。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左

哀元傳后緡方娠注，懷身也；廣雅釋詁四云，娠傷也；晉語太任娠文王注，有身也，段借爲跟；爾雅釋詁云，娠動也，注猶震也。這些說法，都說明母體之內有小體，分別成長而活動。

軍隊被打敗，分裂潰散曰辰。胡厚宣教授提供這一例子，謂甲骨文中有文曰「師無辰」，即軍隊不會被擊潰之意。

屋檐自屋脊分開，向兩邊斜披曰宸。說文云，宸屋宇也。什麼叫做宇呢？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藏也；這正像屋檐自屋脊分開，向兩邊斜披之狀。屋脊或棟有時叫做柍，即中央之意；屋檐或宸有時叫做桭，即兩邊之意。說文段注云，屋者以宮上覆言之，宸謂屋邊；故古書言柍桭者即棟宇也。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柍桭，伏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即楣，即檐）也，是知柍桭即上棟下宇之謂；柍即央字，桭即宸字。這裡所謂上棟下宇，實即屋脊屋檐；脊高檐低，故分上下。再者這上與下之分，亦中與邊之分。徐箋曰，許云屋宇者，渾言之也；賦云柍桭，亦兼舉中邊之辭。蓋屋宇覆下，通謂之宸；指其中棟而言，則曰宸極。「宸極」即屋檐分開之處，即棟，即柍；「宸」即已分開之屋檐，即宇，即桭。

祭社之肉，一塊一塊分開，賜給部下，叫做脤。脤即說文裡的祳字。不過許氏把這字完全解錯了。說文云：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從示辰聲，春秋傳曰石尙來歸祳。既曰盛以蜃，又曰從示辰聲；然則蜃與辰到底是一件東西，還是兩件東西？我想許氏自己一定答不上來。老實說，祳或脤這個字，並非成於蚌殼盛肉之義，而實成於辰字的「分開」之義。左昭十六年傳受脤歸脤注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從這兩句裡，祇能看出把肉分開或歸還的意思，看不出以蚌殼盛肉的意思。又公羊定十四年傳云：脤者何？俎實也。這更祇能看出一塊一塊分開之義，看不出以蚌殼盛之之義。以蚌殼盛肉之說雖講不通，但居然有人明知其不通，却曲爲之辯。清王筠說文釋例硬曰：祳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言故者取其義也。石尙來歸祳，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這辯護實在沒有力量。既曰盛以蜃，又曰蜃省聲；自己莫衷一是，總由先把辰字看成蚌殼之故。倘識得辰字的分開之義，便沒有問題了。且春秋時代，金屬器物盛行，還要以蚌殼盛肉嗎？

把倉裡的粮食分給貧民，振起他們來，叫做賑。史記平準書云：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賑貧民。前漢文帝紀云：發倉庾以賑民。

太陽從東方爬出來，衝破黑暗，叫做晨，俗曰破曉。釋名云：晨伸也，日而日光復伸也。陸機挽歌，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大暮安可晨，即黑暗何時可以衝破之義。

開發山林叫做辳。

開發土田叫做農。辳農兩字，大家或以爲是一字；其實不然：一爲開發山林，一爲開發土田。或又以爲這兩字都祇是農字的變體，其實亦不然：這兩字是正體，農字才是一個容易被人誤解之形。農字所從之曲，當是井田的田字。井與田是一件東西，都表示橫直界畫之意。我們若注意於橫直相交之十，則四個十恰恰成一井字。我們若注意於橫直所包圍之方形，則四個方形恰恰成一田字。這道理我在「中國通史」第一篇講井田時已說過。把井與田合起來，很容易寫成□，或曲字，實則井田而已。甲骨文農字作□，作□，作□。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云：說文解字農耕田也，從晨囟聲。籀文從林作□，此從林從辰，或加又象執事于田間，不從囟。諆田鼎作□，予所藏史農觶作□，並從田。散盤作□，亦從乂。與卜辭同；從田，與諆田鼎史農觶同。知許書從囟者乃從田之譌矣。商說極是，但仍把辳與農看爲一字，實則不是一字：辳爲開發山林，農爲開發土田，都取了辰字的開發之義。

抓破面皮曰辱。說文云，辱恥也，從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畺，戮之也。說辱的意義爲恥爲戮，都講得通。抓破面皮是恥辱；又戮與辱同聲，戮之也當然也可以解爲辱之也。荀子非相篇爲天下大僇（戮），史記田單傳僇及先人，都把戮當辱字用。祇有失耕時於封畺一句，不必排在中間：蓋犯着其他錯誤，也可以辱之或戮之也。辱又可解成汚。鄭氏注禮記云，以白造緇曰辱，老子曰大白若辱：把辱與白對舉，是汚的意思。破壞白的，使成不白，是爲汚辱。賈誼新書道術篇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汚；書胤征舊染汚俗。破壞了行爲之潔，破壞了風俗之純，都可稱爲汚或辱。又釋名釋言語辱衄也，言折衄也，說文云，衄鼻出血也；廣韻云，衄挫也；綱目集覽，敗北曰衄。這些解釋，又幾乎都與抓破面皮有直接聯繫。

藉抓破面皮之義解釋除田之器，又得槈字，鎒字，及作動詞用的耨字，薅字等等。說文云：槈，薅器也，從木辱聲；或從金。徐鍇曰：薅音蒿，

即耨田也；槈，其器也。清沈濤說文古本考槈下云：濤案一切經音義卷八卷二十一引作除田器也，蓋古本如是。除讀爲糞除之除，爲除去田草也。易繫辭引釋文孟注云耨除草；淮南氾論訓注云耨耨除田穢也；皆與除田義合。今本作薅器也；案薅訓拔去田草，亦即除田之義。國語晉語注云，耨茠（古文薅字）也，釋名釋用器云耨以鋤嫗薅禾也：耨與薅皆從辱，同聲。薅器之訓，其義甚精。照此說看來，槈與鎒爲除田的器具，是名詞；耨與薅爲除田的工夫，是動詞。然皆從辱，取了抓破面皮之義。

嘴有緣能自由開啓曰脣。說文云，脣口耑也；至篇云，口脣也；釋名云，脣緣也，口之緣也。春秋元命苞脣者齒之垣，穀梁傳僖三年語曰脣亡則齒寒，都是講的嘴緣。嘴緣何以要用辰來描寫？因其自由開啓，符合了辰字開啓之義。

發笑至於張口曰辴。左思吳都賦云，東吳王孫辴然而咍，註云楚人相調笑曰咍。莊子達生篇云，桓公辴然而咍。束皙玄居釋云，束子閑居，門人衆侍下幃深譚，隱几而咍。咍究竟是一種什麼笑呢？說文云，蚩笑也。蚩字的意義，據六書正譌云，凡無知者皆以蚩名之。無知蚩笑，張口不合，就是辴然而咍。

蚌有殼能自由開啓曰蜃。說文蜃下云，雉入海化爲蜃，從虫辰聲。這是對的；辰並非蜃，取其開啓之義，加在虫上，可成蜃字；正如它並非蛇，取其卷起之義，加在虫旁，可成蛇字一樣。古文字學者知道蜃是蚌殼，於是把辰也當蚌殼看待。辰既視爲蚌殼了，則農具如槈如鎒當然也可以視爲成於蚌殼了。更進一步，或竟把辰解爲犂頭。其實不然：辰既非蚌殼，也不是犂頭，祇是人在崖下鑿石之狀而已。

（上接72頁）我們讀那些情歌的時候，不要像過去的文人學士們一樣只是欣賞那裏面表現出來的熱烈的愛情，而還應該想到隨着那種短暫的熱情而來的悲劇的結局。

民歌的作者們自己所說過的唱歌的作用，大致可分爲三種：爲了解除勞動中的疲乏，爲了解除別的愁悶，爲了達到戀愛的目的。

詩歌本來起源於勞動。在中國的農村裏，不僅打夯歌，吆號子，車水歌，栽秧歌等是勞動歌曲，其他許多民歌也仍然和勞動結合着。在生產技術落後的區域，民歌反而比較發達。它的原因之一，也可能就是由於在那種條件之下的勞動特別辛苦。當然，舊社會的勞動人民還有其他種種不如意的事情。

我們在民歌中所看到的，主要並不是消極方面，而是許多積極的方面，代表着勞動人民的立場和利益的方面。就是主題與題材並沒有什麼積極意義的民歌，和其他民間文學的有些作品一樣，也常常在它們的表現過程中流露出來了勞動人民所特有的大胆潑辣的精神。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開始以後，中國農民的命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不久就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農民戰爭。在這種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中，中國農民的覺悟程度和組織起來的程度，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這種根本的變化，不能不也反映在農民的抒情文學上面，就是說不能不在舊的民歌之外，產生了新的民歌。這種民歌就不再是農民的悲慘生活的表現，而主要是革命的戰歌和對於新社會的生活的讚頌了。

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新民歌中，情歌也有了從來不曾有過的新的內容。婦女們選擇對象以政治條件爲主了。

也許有人有這樣的感覺，新民歌的思想性很高，但它的藝術性似乎不及舊民歌。如果把一般的新民歌和那些最好的舊民歌互相比較，這種感覺當然是有些根據的。但是，不要忘記，那些最好的舊民歌是經過了很長時間和很多人的選擇與加工的結果。

新民歌中也有一些在藝術上相當成熟的作品。只是由於還沒有經過更多的時間的磨洗，另外一些作品又常帶有比較粗糙或者不完整的缺點而已。

普希金和高爾基都強調從民間文學學習語言的重要。我們學習勞動人民的語言，當然更重要的是從他們的生活中去學習，但從他們的口頭文學中去學習却也有一種另外的好處，這就是這種語言是經過了提煉的。對於那種還不大能夠把勞動人民口頭上的語言提煉爲文學的語言的作者，這種學習就是特別重要了。而民歌中的語言又是比別的篇幅較長的口頭文學（如民間戲劇、說書等）更加洗練，也更少濫調的。

高爾基說：「沒有民間文學知識的作家是不好的作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許多位作家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不是從勞動人民中間生長起來的人，更特別需要像普希金那樣，從注意並研究民間文學來矯正我們過去所受的腐敗的教育的缺陷。

（「人民文學」三卷一期）

學術討論

本欄的增闢，是為了對各種重要的學術問題，展開自由討論，和培養學術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編者

論對於殷代史材的研究態度

楊紹萱

在今天要澈頭澈尾很詳盡地談中國古代社會問題，顯然是為時尚早；可是中國史學界裡又很有人在那裡研究這個問題，因為中國人民時時在需要了解自己社會的歷史。在這個情況下，我曾寫了關於『殷周殉人』以至『舊案新提』二篇短文，發表在北京『光明日報學術版』上，引起了一種反響，這個反響是預料中有的現象，因為那是對於『殷代奴隸社會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反響雖然是反響，而反響中却始終沒有能够從殷代甲骨文和青銅文中提出關於『奴隸經濟』的紀錄來；相反地，倒顯露出那些論者對於殷代史材尚缺乏研究，引證更為不確，理解上也頗有偏差。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雖然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若就今天情況來說，恐怕還得從學習馬克思學說和研究具體史材著手；就是對於接受前代學者的遺產，也得要眞正通過科學的評價，纔能做到批判的接受，凡此都得靠足够的精力以求之，憑藉任何什麼別的東西，都不能代替這個工作。

我對史學界的著作只是一個平凡的讀者，就目前所見到的提出三點意見，請史學家諸先生研究一下：

第一，關於殷代殉人遺骨問題，照考古家的報告來說，那只能肯定為殷代殉葬制度的史材，而殉葬制度的發生、成長和衰落的過程，尚待研究。如果說這堆殉人遺骨裡有沒有奴隸或究有多少，那只是一種設想，單靠設想不能解決科學上的問題。在研究工作中經常是可以試做假定的，即殷代殉葬遺骨可以設想為是奴隸，也可以設想為非奴隸，至於那一個設想是對的，則需要一般客觀的史材來證明；如果只許這樣設想，而不許那樣設想，那就叫做武斷，不能算是以理服人。我覺得殷代史材在今天已有一批明確的紀錄，可以研究出殷代社會的構成規律，可以說明與殉葬制度的關係，却看不出有什麼『奴隸經濟』的形成，我想全國史學界裡很有熟悉材料的專家，請澈底檢查一下，可明究竟。

第二，關於殷代物質生產力的理解問題，現在流行着這樣論調，就是說殷代青銅器的『花紋』如何『精美』，因斷定那時代生產力如何高，其目的無非在企圖證明『殷代奴隸社會』，這是不能取得正面史材的反映；並且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非科學的。因為，『花紋精美』是屬於藝術方面的事情，藝術文化一般是受着時代的物質生產力的決定，但是藝術的發展與生產關係的發展常是不平衡的，這是歷史科學中的常識。在古代歷史某一階段中，共藝術的造詣常常引起後世的驚歎，以至覺得學它不來。古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在藝術上的成就，都有這種情況；即中國封建時代的藝術成就，也常使歐洲近代藝術家驚歎。這是人類意識形態史的特點，當在某種情況中生活安定而有優閒的時候，很可能在幼稚的生產力時代，練習出一種絕技，造出某種驚人的藝術品，如滿清時代雕鼻烟壺和刻象牙之類。拿藝術形態估計物質生產力是極不科學的方法，殷代龜甲獸骨文字的刻畫，同樣有高度藝術的屬性，在受物質生產力的限制上，最原始而不能再幼稚的象形字都歷歷在目；在藝術不平衡的發展上，有一些文字就刻得很精美，後人覺得學它不來，其實並不是今人不如古人，而今人沒有古人那樣時代，也就不能幹那樣事情了。研究物質生產力恐怕還得從它的硬度和組織以至怎樣生產什麼生活資料和怎樣交換生活資料來研究吧？從藝術上『花紋精美』來估計，只能做到似是而非；拿藝術形態來代替物質生產力，結果會顚倒是非。

第三，關於甲骨文字的引用問題，『殷代奴隸論』中經常引出幾個字給人們看，就是『奴、妾、奚、僕、宰』等等。這很反映了這些論者對於殷代史材的態度，是很不正常的。讀者在這方面沒有什麼研究，姑且查一查材料來看：

先說所謂『奴』字，這是有一段歷史的，開始是見於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曾經採用為『奴隸階級』的第一證據；但是到了『卜辭通纂』時期便覺察了，原著說：

『[illegible]字多見，義不明。[illegible]字羅釋奴，亦不確。』

這是一個進步的研究，也是一個批判，通過這個研究和批判，到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時期

，便採用了另一解釋，以此二字爲『娩嘉』，案文理字義是可以講得通的。儘讓二字還有研究的餘地，但是這個字斷然不是『奴』字是完全可以確定的。事實是如此明顯，『殷代奴隸社會』論者，就這樣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傳到山東，傳到東北以及別的地方，廣泛地傳播着。現在檢出幾條原文，研究一下：

『辛卯卜□貞，乎多父、逐、□獲、己丑卜殻貞翌庚寅，帚孜□貞翌庚寅，帚孜不其□一月』（續編卷四、二九）

『辛丑卜殻貞，兄（祝）于母己，庚子卜殻貞，帚孜㞢子』（通纂別二）

『帚□□、不其□、』（後下·三四）

『戊辰卜□貞、帚□（巳—祀）子』（後下·三四）

這可看出，上一字象形，下一字從母從力，都係關於孕育生殖方面的紀錄，故釋娩釋嘉，其義可通。更如：

『戊戌卜大占、□、癸巳卜會牧、□、』（通纂四六七）

這是關於卜田牧的紀錄，前一字訓吉，可釋嘉；後一字不識，應闕疑。

關於這種文字，『卜辭通纂』在十餘年前已有啓發，得有正確方向；乃十餘年後尚有人引用久被批判的謬說，似不能委之於無心之過。

再說所謂『妾』字，一般的解釋很不正確。茲引相關的幾條如左：

『貞來庚戌、㞢于示壬□妣乙、牝』（殷虛書契續編卷一）

自維振玉把□釋爲妾字之後，至今陳陳相因，未加考慮；但是如果稍加研究，便知斷非妾字，其意義且恰恰相反。如左列兩片。

『丙寅卜貞王□大乙□妣丙翌日亡尤』（前編一·三）

『乙巳卜大㞢大乙□妣丙一牝』（寫本三三六）

卜辭通纂將□字釋母，於義無解。案，□□二字有相通的意義，非必即爲一字。□爲母字，但非父母、母女之母，應係母性母系之母，前條所見之□字正與這裡的□□字同義。復考妣乙非示壬之配，乃殷人最初母性祖先之妣乙，如卜辭中『辛亥口口上甲，歲，告于妣乙，衣』，從古文獻取辭，□字應釋王母，較合。即從形式推之，□可釋母，則□字亦應釋母，此母字只能係母性母系之母，斷非母女父母之母，更斷然不是妾字。這個道理十分淺而易見，乃『殷代奴隸社會』論者，只爲了自己找證據，就不加研究，濫於引用，將錯就錯，以訛傳訛，這總應該檢討一下吧？靠這樣的引據，要企圖說明什麼歷史問題，那是絲毫沒有可能的。

再談所謂『奚』字，卜辭中可舉出這樣兩條：

『壬子貞、隹我□不正（征）』（前編六·一九）

『祖戊妣口（辛？）□貞』（續編卷一）

兩字釋奚固可，但前者爲邦名，後者爲人名。字係象形，應理解爲圖騰。對於奴隸制度，了無關係。

再談所謂『僕』，原片只有兩字：

『□卜』（通纂八〇〇）

卜辭通例，卜字之上常係人名，此字亦然。字不識，應闕疑；即如通纂所論，謂與周金某字相類，爲以人名邦名關係，亦不宜遽斷爲奴僕之僕，以免望文生義之嫌。卜祀爲當時大典，亦斷非奴隸所能主持。總之，靠這兩個字研究不出什麼『奴隸制度』來。

再談所謂『宰』字，卜辭原形如左：

『甲子卜貞、勿（物）、乎多□伐𢀛方弗其㞢又、』（續編卷三·四）

通纂釋爲宰字，並謂爲『奴隸之類。……說文云：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顧亭林在日知錄中會批判說文這樣說：『宰爲罪人在屋下執事，遠於情理。』這批判是正確的，中國古代文獻中殊無宰爲奴隸之事，且恰恰相反。卜辭中的『多宰』正是詩經中的『諸宰』，楚茨云『諸宰君婦』，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在金文『宰椃角』和『散氏盤』（直作宰）均有所見，皆屬族長一流，斷然不是什麼奴隸。如果以爲宰字之上有一個乎（呼）字，而所呼者亦不必就是奴隸，如上引卜辭一條是『乎多父』（續編卷四·二九），所呼者顯然不是奴隸。如果以爲『多父』有受命的關係，這是周代所無而殷代特有的現象，便反映了社會制度的變革，受命的爲『多父』則發令者就可能爲母系，至少這總該是一個問題。

由於我前此寫了兩篇短文，談及到這種問題，引起了一種『反響』，使我們更看到最近『殷代奴隸社會』的論調，所引用的甲骨文字仍然有那種將錯就錯、以訛傳訛的情況。我想大家對於『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虛心學習』『自我批評』等等都是講得爛熟的，而『殷代奴隸社會』論者對於殷代史材的態度，還不免於無批判地引用。因此就反映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史學界裡還缺乏科學性的史學評論，我想史學家諸先生將會開展這種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關於「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

蔣學模

本刊三卷一期發表了樊弘先生的「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以後，引起了各方的重視和討論，這是學術界的一個好現象。由於這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中心論題之一，我們歡迎讀者繼續展開討論，來求得一個正確的結論。為了節省篇幅，我們希望儘可能寫得緊湊一些，並把所根據的資料來源註明出來。——編者

在「新建設」三卷一期上讀了樊弘先生的「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以後，覺得有一些原則性的問題，需要提出來談一談，向樊弘先生和讀者們請教。

樊弘先生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想把馬克思的恐慌的見解加以嘗試的整理」。為了說明樊弘先生和我之間對於這個問題看法的分歧，這裏首先應該把樊弘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樊弘先生是在引徵了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的「……現實的恐慌，只能由資本主義生產之進一步的發展，競爭和信用表示出來」（註一）那一句話以後開始他所分析的。他首先介紹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和利潤平均化法則，肯定了資本家為了追求額外利潤，必定以改良生產技術作為競爭的手段；接着，他分析了恐慌週期各階段工資和利息率的變動，在他那篇文章第二節的開頭得出初步的結論說：「週期的恐慌是怎樣發生的呢？在資本家的追逐利潤的競爭下，平均利潤率陡然下落必然會引起經濟恐慌的。」

但利潤率的陡然下落顯然只是恐慌開始時的表象，而不是恐慌的原因，以恐慌的開始來解釋恐慌是不能說明問題的本質，所以接着他就分析利潤陡然跌落的原因。

據樊弘先生的分析，利潤率陡然下降的原因有下面這幾個：（一）在繁榮期間，投機活動活躍起來，「……錯誤的投資也隨投機的狂熱而日漸增多，這必然會降低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平面的」，但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如同貨幣的工資在恐慌之前夕會要高漲」，「在充分就業之時，生產的價值總量不增，然而工人階級所分得的那一份增加了，利潤率必然不落」；（二）「在繁榮的後期投機的活動」，「吸取了大量的貨幣資本」，以致利息率高漲，利息率的高漲使企業利潤下落；（三）「恰當利潤率下落之際，促成利潤率下落的主要因素資本有機構成高度化又加强了。利潤率勢必還要更為加速度的下落的。」在這三重因素（註二）的壓力之下，「資本家們痛感貨幣資本籌措不易，然而又需要有貨幣資本來作支付手段的資金，於是便在市場上拋售債券及股票，到了股票價格慘跌之際，證券交易市場便坍台了。商品於是如狂潮一般的湧現市場，但在市場之上的買主甚少，商品的價格於是慘跌。資本薄弱的銀行、工廠、商店於是紛紛倒閉，直到一部份競爭能力薄弱的資本便逐出於市場之外為止。這便是馬克思的週期恐慌的理論。」

樊弘先生的結論是：「資本是靠剝削勞動來發展的，到了充分就業之時，資本突然喪失了他們的剝削勞動的能力，恐慌便爆發了。經過恐慌之後，工人的失業增加，資本的有機構成降低，利息率隨之降低，工業的疾病逐漸康復，於是又把過去的由繁榮而到恐慌的老路重復一次。」

× × × ×

我覺得樊弘先生對整個問題的提法——即從利潤率低落這一現象來分析恐慌產生的原因——以及他在分析利潤率低落時的個別論據，都頗有商討的餘地。現在我把個人的意見寫在下面。

從現象的後面來發掘事物的本質，是經濟分析一個正確的方法。但同一事物的現象表現，可以有許多方面，例如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它的現象表現有利潤下降、失業增加、生產過剩、銀行工廠倒閉等等，但我們應該從這種種現象裏，挑出一個根本的現象來作為我們進一步發掘的出發點。經濟恐慌的根本現象是什麼呢？馬克思自己告訴我們，「恐慌的根本現象」是「過剩生產」（註三）。企業利潤率的下落之所以不是危機的根本現象，是因為在危機到來的時候，資本家常以銷毀成品等方法把物價拖住，藉此阻止利潤的急劇下降，所以，利潤率下降的程度，是不能正確反映恐慌的深度的。例如：以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大恐慌而論，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美國製造業的生產額從六七九·九億美元劇降為三〇五·六億美元，降低了五五·一%，但同期的利潤率，則從一四·九%降為一一·二%，僅降低了二五%（註四）。所以，我覺得從利潤率下降這一現象來發掘恐慌的本質，是不很妥當的。

關於樊弘先生分析利潤率下降原因的那一部份，我的意見是：

第一，雖然正如樊弘先生所說，工人的實際工資會在恐慌前夕高漲，但這却並不是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下面這些數字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註五）

	美國每一工人的實際收入指數（一九一九等於一〇〇）	美國製造業的利潤率
一九二六年	一〇九	一一·九
一九二七年	一一三	一二·三
一九二八年	一一六	一三·一
一九二九年	一一五	一四·九

從表面上看，這個現象是無法理解的。但「如果工資高則利潤低，如果工資低則利潤高」這一原則，是建立在「價格與價值」一致的假定之上的，而馬克思告訴我們：「在恐慌發生以前，一切隸屬在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商品，通例會發生一種一般的價格騰貴現象」（註六），同時，由於生產技術改進的結果，每一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却減少了，即商品的價值降低了。資本家是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在繁榮期間出售他的商品。「這並不是勞動價值論中理論上

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的矛盾」（註七）。所以，恐慌前一時期工人實際工資的增高，並不會減低資本家的利潤率。

第二，關於繁榮期間信用、利息和利潤的關係，樊弘先生引證了馬克思所說的「商業繁榮的時期或意外利潤的時期，利息率有一般的降低，在繁榮和恐慌的過渡期，利息率高漲，而在恐慌的時期，利息率達到極端剝削的頂峯」這一段話，來作爲他關於恐慌前利息高漲的論據。但據我對這一段話的了解，利息的高漲應該是指恐慌已經出現或至少已經非常迫近的時候說的，因爲馬克思在另一處又指出：「大體說來，貸放資本的運動，——那會在利息率上表示出來——是與產業資本的運動，採取相反的方向。……在產業循環的開端，則低的利息率是與產業資本的收縮相一致，而在循環的結束，則是高的利息率，與產業資本的過多相一致。」（註八）但不管怎麼樣，把「投機活動」、「錯誤的投資」、「信用」這些因素當作恐慌的基本原因來論列，我覺得總是不妥當的。因爲馬克思曾告訴我們：「近代產業所取的特徵的途徑，就是通過相當活躍、生產繁忙、恐慌、停滯諸階段，而每十年一度的循環。……生產規模之突發的伸展，是生產規模之突然的收縮之前提。……信用伸縮的現象，不過是產業循環週期轉變的徵候，經濟學却把它看爲是那種週期轉變的原因，那足顯示它如何淺薄。」（註九）

第三，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高，導致利潤率的降低，只是一個一般的趨勢，並不能作爲說明危機產生的原因。所謂在繁榮的末期，資本有機構成才顯着提高這一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美國製造業的資本的有機構成（註十）

一九二五年	七·三九
一九二七年	七·一六
一九二九年	七·一〇
一九三一年	八·三二
一九三三年	九·五三

從上面這些數字可以看出，在繁榮後期的一九二七和一九二九年，美國製造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並不曾顯着地提高，反而降低了一些，而在危機年代的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三年，資本有機構成非但沒有降低，而且反而顯着地提高了。

×　　×　　×

根據馬克思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原定計劃，他本來是準備要在「世界市場」的後面專闢一章來分析經濟恐慌的，他爲自己擬定的標題是：「恐慌，建立在交換價值上的生產方法和社會制度的瓦解。個人勞動到社會勞動的實際轉變，以及相反的過程。」（註十一）不幸，馬克思不曾能夠完成這一著作，因此，在馬克思的著作裏，我們找不到經濟恐慌理論的有系統的闡釋。但關於恐慌的基本理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決不是難找的。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的總爆發，所以恐慌的基本原因也必須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中去尋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宣示，經濟恐慌「是現代生產力反叛現代生產關係，即反叛作爲資產階級及其統治地位存在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註十二）

在分析貨幣流通手段的機能的時候，馬克思指出，單純商品生產「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之矛盾，私勞動必須表現爲直接社會勞動之矛盾，特殊具體勞動必須表現爲一般抽象勞動之矛盾」，巳「包含恐慌的可能性」（註十三）。當然，在單純商品生產中，這種可能性是不會成爲現實性的。但當商品生產成爲主導生產方式的時候，包含在商品內部的私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便發展爲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到這個時候，恐慌的可能性就要發展成爲現實性了，它就要以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的形式，以生產過剩的形式表達出來。馬克思明白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爲恐慌所指示的各種現象，形成一個內在的基礎。這個加大生產的界限，是資本自身，是生產條件的現有規模，是資本家的無限的致富衝動和資本化衝動，而決不是消費。消費自始就是有限制的，因爲人口的最大部份，即勞動人口，只能在極有限的界限之內，擴大他們的消費，而在另一方面，跟着資本主義發展，對勞動的需要會是相對的越是減少，雖然絕對的說，它是會增大的。」（註十四）

從馬克思自己的話裏，我們只能引伸出：資產階級對額外利潤的追求，導致出生產力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但勞動人口的絕對和相對的貧窮化法則，却限制了國民購買力的增長，生產與消費之間這種愈來愈大的裂痕，就使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成爲不可避免。這就是馬克思恐慌理論的基本內容。恐慌的原因，並不是因爲「資本突然喪失了他們的剝削勞動的能力」，而正巧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長期進行殘酷剝削的結果。

列寧和斯大林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和資本主義總危機階段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的恐慌學說。他們的分析都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社會潛在的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註十五）脫離了列寧和斯大林對馬克思學說的發展，企圖另闢蹊徑來解釋馬克思的恐慌學說，是必然徒勞無功的。

（註一）：「剩餘價值學說史」，郭大力譯，實踐出版社版第六一九頁。

（註二）三個因素的（一）、（二）、（三）是我爲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按樊弘先生的行文次序代爲劃分的。

（註三）：「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下册六四一頁。

（註四）：「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編，五十年代譯本，第六十二頁後的附表。

（註五）：見「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第六十二頁後附表及第八十六頁統計表。

（註六）：「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下册第六二五頁。

（註七）：「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世界知識叢書，第十二頁。

（註八）：「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本，第三卷第四〇〇頁。

（註九）「資本論」第一卷第五三二頁。

（註十）：資料來源，同註四。

（註十一）：見「論馬克思資本論」，列昂節夫著，三聯譯本，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註十二）：「共產黨宣言」，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百週年紀念版，第四十三頁。

（註十三）：「資本論」第一卷第七〇——七一頁。

（註十四）「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三篇第四章第一節「恐慌的原因」，郭譯本第五九八頁。

（註十五）：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政治總結報告」中指出：「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和它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裏。恐慌的基礎是在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結果底資本主義形式的佔有兩者間的矛盾裏。資本主義的這個根本矛盾的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為要取得最大限度利潤而發展的生產可能猛烈地增高，但百千萬勞動羣衆的購買能力相對地縮小，而且資本家又時時努力要把這些羣衆的生活水平線束縛在極低限度的範圍之內。為了要在競爭中取得勝利且多得利潤，資本家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合理化，加緊剝削工人，且把自己企業生產的可能性提高到極大限度。所有的資本家，誰也不願比誰落後，因此，他必須用種種方法走上使生產可能性迅速發展的道路。但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以及主要的購買者（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購買力，還是在很低的水平線上。從此就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從此就發生一定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多少有定期的爆發，它的表現就是商品賣不出去，生產縮小，失業工人增多，工資降低；因此，就使生產水平線和購買支付能力的水平線中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起來。生產過剩的恐慌，是這個矛盾表現的最激烈而且破壞性最大的形式。假使資本主義能夠把自己的生產不用它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用它去有系統地改良民衆的物質生活，假使它能夠把利潤不拿去滿足寄生階級的需要，不拿去完成剝削的方法，不拿去作資本輸出，而拿去有系統地提高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生活，那末恐慌就不會有了。但是，那時候的資本主義就不得成其為資本主義了。要稍減恐慌，須先消滅資本主義。」（見東北新華版斯大林選集第四卷第一六五—一六六頁。）

敬答蔣學模先生

蔣學模先生，對於我所摸索的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提出了兩點好意的評判：（一）他說我脫離了列寧和斯大林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發展。因為列、斯二氏指出「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社會潛在的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只我沒有明白的說出這一句話來。（二）（1）工人的眞實工資的漲高並非利潤率下跌的原因。（2）「把投機的活動，錯誤的投資，信用這些因素作為恐慌的基本原因來論列……總是不妥當的。」（3）資本的有機構成增高，並不能作為危機產生的原因。現在容我答覆如後；

（一）我以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潛在的矛盾，不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的發達決定於生產技術的改良，或生產過程的擴大。生產關係的作用表現而為資本家對於額外利潤的追逐。又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則表現而為利潤率和利潤量的驟而烈的下降。我說經濟的恐慌是以利潤率的驟而烈的下降為前奏，我並說利潤率的驟而烈的下降是由資本家們相互競爭剩餘價值所引起的。我以為我的這種看法似乎並不等於「脫離列寧和斯大林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發展，企圖另闢蹊徑來解釋馬克思的恐慌學說」因為馬克思自己就是以資本家追逐利潤的暫而突的失敗，即以利潤率的暫而突的下降，在資本剝削勞動的前提下，來說明經濟恐慌的。

（二）（1）工人的眞實工資的漲高，在利潤量上昇的時候，固不足以引起利潤率的驟而突的下落。但這並不等於說，工人眞實工資的漲高，在利潤量不增或所增極微的時候，亦不影響資本家的利潤率的下落。馬克思的經濟恐慌的學說正是建築在工人的眞實工資的增加可以影響利潤率的驟而突的下落的前提上。因為馬克思說過：

增大的資本C+△C不能生產比較尚未擴大△C時更多的利潤，或甚至只能生產更少的利潤。在這兩種情境下，平均利潤率均要為强烈而突然的下跌。但這必是由於資本構成起了變化。這種變化不是由於衆多生產力所引起的，而是由於可變資本的貨幣價值的高漲（因為工資增大了）和相應的剩餘勞動對必要勞動的比率的降低。（Capital, Val.III, Ch. XV, Sec, III, P. 295）

（2）我在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一文中，明明白白的說，週期性的經濟恐慌是由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對於剩餘價值——利潤的追逐所引起的。這即是說，資本家們對於最大利潤的鬥爭是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因為經濟的恐慌雖係由於資本生產的過剩，但資本生產的過剩並非指生產手段生產的絕對過剩，而是指的生產手段的生產的相對過剩。即以生產手段當作剝削勞動的資本來說，他們確是過剩了。因為他們的價值雖已有增加，但他們所剝削的利潤量不增加。不但不增加反而大減少，所以他們是過剩了。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家生產的眞正障礙就是資本自身。」我沒有說投機的活動，錯誤的投資，信用的破壞等是經濟恐慌的基本原因，但我確指出了資本家間對於剩餘價值——利潤的競爭才是。

（3）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在解釋平均利潤的下落上，應當是指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提高。在繁榮的末期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傾於提高。一來呢，是因為在不變資本的耐久的各要素被生產出來了。二來呢，是因為原料的漲價。三來呢，是因為眞實工資漲高，資本家傾於多用機器、少用人工。除非這三點理由不存在，或工資為强烈的增加足以抵銷上述三個條件的作用，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才會不高。我以為蔣先生所引的統計尚不足以否定在繁榮的末期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提高，儘管此時美國製造業的有機構成是降低了。因為依據同一來源的統計，美國的製造業在恐慌爆發期中，利潤率不但不減，反而上增。在一九二九年利潤率為一三·一，一九三一年為一四·九，如果把它當作一般的，那便不是恐慌而是繁榮了。我以為蔣先生所引的統計資料，恐怕只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非一般的現象。因在恐慌爆發後，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

二年美國的生產減少一半。一般的說，企業必定是賠本的，然而製造業的利潤率反而增加。所以我說，這種現象恐怕是特殊的，否則便是計算的方法有錯誤。根本沒有把資本的消費與消耗計算在損失範圍之內。

關於經濟的恐慌是由大衆的貧乏的問題。從一方面說是的。因為工人沒有充足的購買力。從他方面說，又好像不是，因為這個說法尚欠深刻。誰都知道，大衆的貧乏，是由工人的相對工資的降低。然而工資卻又是工人所生產的商品成本的構成要素之一。假令利潤量沒有顯著的變化，工資的增加是會驟而烈的降低資本家的利潤率的。我以為資本主義的「工資制度」或「利潤制度」是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除非澈底廢止工資制度或利潤制度，經濟的恐慌必是不可避免的。

樊　弘

關於「希臘時代的藝術為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

朱光潛

「新建設」第三卷第四期七十頁，王家傑先生問：「古代藝術的起源是怎樣的？希臘時代的藝術為什麼會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常任俠先生答：「(一)古代藝術的起源，是原始人類從勞動中所創造的。(二)若果我們說希臘時代的藝術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那是與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合，而且也與事實不合的」。

關於第一點，常先生的回答是正確的。關於第二點，常先生否認希臘藝術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卻很有待商酌的餘地。希臘藝術比資本主義時代的較高明，首先作這個斷語的人是馬克思。他說：「人都知道，有些藝術最高度發展的時期並不與當時社會一般發展有直接關係，也不與那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和輪廓構造有直接關係。拿古希臘與近代國家，甚至與莎士比亞相比較，就可證明這一點」。(見「文學與藝術」)所謂「近代國家」便是資本主義國家，莎士比亞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的藝術家，馬克思以為拿這一類的資產階級藝術家和古代希臘藝術家相比，便相形見絀，便是證藝術水平和經濟水平的發展有時確不平衡。

原因在那裏呢？馬克思也曾經提出了很正確的答案。資本主義社會所着重的是「量」，是「交換價值」，古典藝術家所着重的是「質」，是「使用價值」。(見「資本論」卷一)換句話說，希臘藝術與生產接合較密切，要求配合實用，要求好；資本主義藝術成為商品，成為牟利潤的工具，受了商品化的影響，要求多，大量製造，所以不免粗製濫造。

此外，還有一層理由是馬列主義藝術論者所特別着重的，實際上與上述一點還是相關的，就是希臘城邦是一種有限制的民主，藝術家和民衆打成一片，能表現多數民衆的思想和情感。資本主義藝術家卻處在一個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的作品成為商品，必須聽商人支配；一方面對現實不滿，對惡濁的社會生嫌惡，因此走到逃避現實和逃避社會的路。他在社會上成了一個孑然孤立的人，不能反映民衆的實際生活，所以他的藝術沒有生命。常先生所提的資本主義藝術比希臘藝術進步的理由之一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技術，比之古希臘要進步得多。」着重技術，正是頹廢派資本主義藝術家的一個逃避現實的辦法，從馬列主義文藝觀點看，這也正是資本主義藝術衰落的一個原因，太着重形式了，實質便變成無足輕重，藝術所以失去眞正的生命。

說希臘藝術高於資本主義藝術，當然只能就大概情形說。希臘藝術有千餘年的歷史，紀元前四世紀以後，也有一段頹廢的時期。資本主義藝術有五六百年的歷史，在它的新興期，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造型藝術，十六世紀的英國戲劇，也還是很燦爛的。另有一點須注意的是藝術體裁形式是隨歷史情境而轉移的。古希臘所特長的是史詩悲劇和雕刻，近代資本主義的代表藝術是小說和電影。我們不能責近代人做不出史詩和悲劇，也正猶如不能責希臘人不能做小說和電影。優劣的問題不能從「技術」「題材」的觀點來解決，要從藝術所表現的眞正生命和所盡的重要任務來解決。如果這看法是對的，我們能說資本主義時代的小說和電影在所表現的生命和所盡的任務兩點上，要高於希臘的史詩悲劇和雕刻麼？這問題還值得常先生和一般讀者再考慮一下。

答朱光潛先生

關於王家傑先生所提的問題，其第一點是以我自己的意見去答覆的，其第二點是吸取滲和了從事研究西方藝術的朋友們的意見去答覆的。未能更深入的研究問題，去作圓滿的解答，承朱光潛先生指正，甚為感謝。但藝術的各部門，有為古希臘時代所優長的，也有為古希臘時代所短絀，而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高度發展的。小說與電影，固不必論，即就繪畫與音樂兩種藝術說，近代超過了古希臘時代，應該也是事實。若就全面加以觀察，則這個問題仍待有更好的說明。古希臘時代所最優長的是史詩建築與雕刻，史詩傳唱於古代的社會，在印度也是如此。後世這個藝術不再發展，只有讓古代獨擅其美。但雕刻方面，後世如米蓋爾朗基羅和羅丹的作品，便不能把他們都視為「沒有生命的」藝術。而一筆抹殺。馬克思所說也只是「有些藝術」，在古希臘有最高度的發展，並不是指所有的藝術各部門而言，若就全面去研究，這個問題是仍待更圓滿地去加以說明的。

常任俠

譯文

愛因斯坦的新理論

波蘭・L・印菲爾德作
饒毓泰譯

在一九〇五年，當我們的世紀還年青的時候，愛因斯坦剛好是二十六歲，在瑞士專利局做個書記。就在那年，他寫了一篇文章，把科學的面貌改變了。它包含了特殊相對論的基本原理，使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起了革命。在我們的行星上，愛因斯坦是首出第一人把質和能底關係導引出來——一個簡單但是基本的關係，四十年後對於原子能的發見與利用担任着一個重要角色。這樣，四十五年前，科學上第一次愛因斯坦革命就完成了。

假使從那時以後，他甚麼也不做了，他的名字在科學史上仍會世世活着下去。然而，僅僅十年後，在一九一五年左右，愛因斯坦完成了他的普遍相對論。自牛頓以來一個新的引力理論至是才形成了。此一理論解釋了地球怎樣吸引着月亮；行星怎樣環繞太陽運動着，雙星怎樣各自環繞運動着，還論及宇宙之構造。作爲一個邏輯體系，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是勝過牛頓的舊理論。任何時候，如果牛頓的與愛因斯坦的結論有異義的話，觀察——一切物理的理論之最高裁判者——似乎總是站在愛因斯坦這一邊。這樣，三十五年前，科學上第二次愛因斯坦革命就完成了。

愛因斯坦天才的特質就是他的思想底完全獨立。他不接受任何人的成見；他自己想着，永遠想着，一切。自從一九一八年到剛才過去的一年，三十多年來，愛因斯坦研究了科學上一個最深邃、最困難的問題：去尋找一個理論，會要賅括大型現象(像他的引力理論所會做到的)，同時又照顧到小型現象，像構成原子的質子等。許多科學家會認爲(現在還認爲)像這樣一個大的計劃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他們認爲支配着星球和星雲的規律與那支配着在原子裡的電子的規律是根本不同的，他們認爲一個統一的，小大精粗無不賅備的原理是不可能的，也許會是永不可能的。然而，就在這個問題上面，愛因斯坦不斷地思索着，找着了又扔掉了許許多多的解決方法，因爲它們不滿足他的邏輯簡單與完美底高度標準。一個好的、物理的理論，愛因斯坦覺着，定要反映出宇宙底完美與光輝。

去年愛因斯坦整整七十歲了，他找到了他信爲是他三十年來所尋求的解決。他的最近兩個決定性步驟所達到的結論，會發表於加拿大數學時報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及「相對論之意義」(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Princetor university Press) 新版。

是不是愛因斯坦就已解決了他的大問題呢？就已找到了一個定律是以賅括大型兼小型現象呢？這需要一個長時間，直到數學的分析和觀察頒下它們的判決書——直到我們找到在愛因斯坦方程式裡潛藏着的寶庫。所以現在還沒有誰知道科學上第三次愛因斯坦革命是不是完成了。

電磁場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爲了了解、即使僅僅粗略地了解愛因斯坦三十年來所研究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十九世紀，回到麥克斯威爾的時代。麥克斯威爾是一個成功的場理論 (Field Theory) 底首創

者。

從廣播天線到我的收音機，無線電波，就是說，電磁波，以光之速率散佈着。從霓虹燈內的原子到我的眼裡，光線（又是電磁波）以光之速率散佈着。無線電波和光波都是受同一定律支配的，這些定律表現在麥克斯威爾的方程式裡。它們告訴我們，電磁場怎樣在空間和時間裡變易着，電磁波是怎樣傳播的，什麼是它們的物理的性質。麥克斯威爾的理論是個場理論，因爲它所關切的是在時間上和在我們的三維空間裡的變動。它和機械的理論所討論的問題，像月球繞地而動之類，逈然不同。在一個機械的理論裡，主要的是質點和質點底運動；在一個場理論裡，主要的是場在時空間的變動。

可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我們並不單用場概念來描寫電磁現象。電子，就是說，帶負電的質點，動着時發生一個電磁場。所以，在麥克斯威爾的理論中，後來在羅侖茲的理論中，我們仍然遇到一種場和質點方面的混合體。質點（電子）在一個電磁場內運動着，又以其運動影響到電磁場。雖然如此，決定了麥克斯威爾的理論底新的、優越的形態，究是場的一方面。

電磁場，如其名的函義，是兩種不同的場底結合——電場與磁場。讓我們舉例來說：電場。在一定的地點與一定的時刻的場，可以用（a）它的強度和（b）它的方向來標誌着。就數學來說，它的強度可用一線之長來代表，所以，在任何一點的場是由有定向的一線之長來代表的。設想所說的長度像一根棍子，一端放在一間房間的一角，它端舉起來，和兩邊牆與地面各成某一角度。顯然的，它的長度和方向就被確定了，假如你說明從一端到它端，你必須沿着地面和一邊牆的交截線平行先走若干寸，跟着沿着地面和另一邊牆的交截線平行又走若干寸，最後又沿着兩邊牆的交截線平行走了若干寸。可見，我們是用三個互相垂直方向的長度來確定一個定長度和它的一定方向。同理，在一定點與一定時的電場底強度，我們可用三個數字來確定，這三個數字代表着它的強度底互相垂直方向的三個成份。

但是，場是跟着時與地而變的，這三個數也就會同樣的變。所以，我們需要三個數學函數來完全確定電場，每一個函數告訴我們，它的在某一定方向的強度是怎樣隨着時與地而變的。爲了確定磁場，我們又需要三個這樣的函數。總括起來，一個完全的電磁場是由六個函數來確定的。

這些函數告訴我們，電磁場是怎樣隨着時與地而變的。但是它們並不是各自獨立的。麥克斯威爾方程式告訴我們它們中間的關聯，換句話說，就是支配電磁場在空間與時間裡變動的規律。

引力場（The Gravilational Field）

現在我們可以把愛因斯坦的二次革命粗略地標舉出來，至少它的一方面：它在引力現象這方面所做的和麥克斯威爾的理論在電磁現象方面所做的一樣。

牛頓的引力理論，是個典型的機械論。質點（例如月球或地球）被它質點（例如地球或日球）吸引着。在這個理論裡，場概念還沒有發展出來，也沒有引力場在時空間傳播的概念。

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不是牛頓的理論的修正新版；它是建築在新的假設上，邏輯上比牛頓的更調適的，一個嶄新的理論。但就觀察考驗過的結果來說，這兩個理論是甚相似的。共間同的範圍大，異的範圍很小。最顯著的新現象爲愛因斯坦的理論所預見者，就是經過太陽邊緣時光線會繞彎改向。這個現象是當着一次日食的時候被發現了的，因爲在那時候太陽被遮住了，人們能夠看見站近它傍邊的恒星。事實上，正是這個現象把相對論和它的創造者的聲名揚播了。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關於行星繞日的運動。由此兩種理論計算出來的偏差雖則甚小，但在水星——最近太陽的一個行星——是可以觀察到的。任何時候如果類似的差異存在的話，任何時候，如果實驗能夠宣告它的判決的話，它似乎（謹愼一點說）總是站在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一邊。但是愛因斯坦成就的重要性，與其說是在新現象之發現，無甯說是在它的理論底完美與簡樸。

在愛因斯坦的理論裡，萬有引力場是由十個隨着時與位而變的函數來標誌着的。它們所担任的角色和那六個函數在麥克斯威爾的理論裡所担任的相似。愛因斯坦的引力方程式告訴我們，這些函數怎樣在空間和時間裡變易着。

我們記得：在電磁場理論裡，我們有一個由場和質點概念組成的混合體。場是由電子和它們的運動所產生出來的。同樣，在愛因斯坦原來的理論裡，引力場是由物體（恒星和星雲）和它們的運動所產生的。因此，比較麥克斯威爾的和愛因斯坦的理論，我們得到下列的擬義：

電磁場 ⟷ 引力場

荷電質點 ⟷ 吸引質量

荷電質點的運動 ⟷ 吸引質量的運動

我們的擬義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會引起誤會的。我們現在必須指出愛因斯坦方程式底一個新的特色。引力場不特被吸引的物體影響着，而且也受到電磁場本身的影響。所以，一個引力

場底泉源在動的質量，在動的電荷，又在電磁場。一個純引力場可以不藉電磁場而存在。但是一個純電磁場不能脫離引力場而存在。

物理與幾何（Physics and Geometry）

現在讓我們回到一九二〇年的觀點，那時候相對論底構造已完成了，沒有它，我們不能了解其後的發展。我們看見在引力場與電磁場中間有個本性的區別：引力場是個幾何的場，電磁場是個物理的場。

把引力場了解爲一個幾何的場，是所有物理觀念中最偉大最革命之一底成果。不深深體會這一點，就不可能掌握住愛因斯坦成就的重要性。歐克里德空間底性質我們從中學起就知道：從一直線外的一點我們能夠畫一條，只一條線和所說的線平行。但是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我們曉得歐克里德幾何只是許多可能的幾何之一種。譬如說吧，在一個球面上生活着的二維的動物的日常經驗，就是非歐克里德幾何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他們會察覺到一個一直向前的行程（就是說，沿着大圓周）會引導他們回到他們的起程點；他們又會發現圓周與直徑之比是小於π。

物理的事體底背景是個四維的世界（a four dimensional world），這絲毫沒有什麼神秘。每一事體，比方說，凱撒之死，是用共事發生之「地」與時來標誌的。一事之「地」要三個數來標誌着，加上時間就成四了。一切可能的事體之總和，構成一個四維的世界。所有這些，自從一九〇八年大數學家閔可斯基賦予了愛因斯坦特殊相對論一個完美的四維的數學的形式以後，都是已經知道了的，而且成功地被應用了的。

普遍相對論却更前進了一步，並且是重要的一步。我們問：我們的四維世界是平的像二維的平面呢？還是彎的像二維的曲面呢？雖則人們很容易形像到一個二維的平面或曲面，想要同樣來做就困難了，如果空間是四維的話。這就是這些問題困難的所在。然而，我們的直覺雖有止境，數學却並不停住。即使在愛因斯坦以前，描繪多維空間的數學就已有了，雖則，只是因爲受了相對論的激盪才更充分地發展出來。這一部門數學之發展，是與Gauss, Lobachevski, Bolyai, Riemann, Ricci, Levi-Civita，和其他的名字分不開的。這裡我們只說：一個四維空間是由十個函數標誌着的；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些函數，我們就知道這樣一個空間底幾何；我們就知道這樣一個空間是不是曲的，而且它的幾何是怎樣一點一點地變易着。

在我的房間裡，我的鉛筆一端之地位，我可以它與天花板和兩面垂直的牆之距離來標誌的。一般說來，一點的地位是以在一定坐標系內的三個數字來指明的。在一個城市裡，街名和住宅編號構成兩個坐標，相當準確地把它的居民的地位註明了（至少當他們在家時）。同理，在我們的四維世界裡，我們定得要一個坐標系以便定名此四個坐標數，用來註明一件事體。但是除了這些，我們還需要十個函數來告訴我們，究竟我們所描寫的世界（在任一個定坐標系）是平的，還是非平的，引句流行語，也就是說，歐克里德的還是李曼的。

我們現在可以把愛因斯坦偉大的新的觀念表式出來：標誌我們四維世界底幾何的十個函數，也就是標誌引力場的十個函數。一個世界沒有質量，沒有電子，沒有個電磁場，是個空世界。這樣的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質量出現了，如果電子出現了，如果一個電磁場出現了，那末，一個引力場也就出現了。如果引力場出現了，我們的世界就變成着曲的。它的幾何是李曼的，也就是說，非歐克里德的。

可見，同一組的十個函數標誌着度量場兼引力場。「度量」（"Metric"）一詞表示這十個函數與我們的世界底幾何中間的關聯。「引力的」（Gravitational）一詞表示着這同一十個函數又描寫了在我們世界裡的引力現象。此兩詞可以別用，亦可兼用，這一事實正表示着物理的引力場有它的幾何的對印。就其與引力場有關來說，物理反映，便是幾何。我們的世界底幾何和引力場是由動的質量，電荷，兼由電磁場來形成的。因之，這個關聯：

物理⟷幾何

祇爲引力場而存在。我們重複的說：引力場也是個幾何場；電磁場是個純物理場。

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普遍相對論呈現出一種不調適的、由物理與幾何組成的混合體。要了解愛因斯坦後來的努力，我們必須了解他爲什麼不滿意於當時所知道的那一些場之構造理論。譬如，在麥克斯威爾的方程式裡，我們有

所與的：電荷和它們的運動

未知的：電磁場。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裡，我們有

所與的：質量，它們的運動

未知的：引力場或度量場。

在相對論裡，所與的與未知的形成一個奇怪的混合體。質與能沒有幾何的對印。但是場却有！

普遍相對論之出世是由愛因斯坦對于古典引力理論之不滿。新理論之出世是由他不滿意于普遍相

對論。它的弱點是幾何和物理的概念的不自然的混合。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弱點，另一個也許還更重要。

電磁理論和引力理論都是二元的理論。兩種理論都包函着場之泉源（電荷，質點）與場本身。一句話，兩種理論都是兩種概念，質與場的混合體。假如我們能够的話，在純一的質或場概念之基礎上建立起來一個統一的理論，就哲學上講，那就會令人更加滿意了。場理論的勝利確實是太偉大了，不容許我們捨棄場概念。所以愛因斯坦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來一個純場理論。在這樣一個理論裡，會只有場概念和場之方程式。但是我們要問：單是方程式，我們怎能滿足呢？我們曉得物質是眞實的，和我們碰到的石頭一樣眞實。統一場理論的擁護者會說，所謂物質之存在，應是從場之方程式裡抽繹出來的。所謂物質就是在那些場來得特別强的區域裡。物質底運動就意義着那些場特別强的區域跟着時間在變動着。譬如，在一個統一的電磁理論裡，一個靜電子定得用一個微小的區域來代表着，在這區域裡場是很强的，在這區域外很快的就消滅了。這樣一個區域，內有强度的但是有限的場，代表着集中的能，也就是說，代表着物質。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場理論是以場之强度來描寫並解釋物質的。更可見，從邏輯簡單底觀點來看，很大的進步是會促成的，如果麥克斯威爾的理論和普遍相對論都變成到一個純場理論；這樣一個理論所交接的，會只是電磁場的概念（用六個函數來標識着）和引力場的概念（用十個函數來標識着）。但是這些場的規則定得改變一下。不像麥克斯威爾的理論和普遍相對論，類似的新理論定得容納能代表物質的解（Solutiors）。舊的理論在這方面是失敗了。

可是，即使我們能够成功地形成了一個純場理論，如是的理論，仍然沾染了一層塵障。我們曾經說過，在舊的理論裡，引力場也是個幾何場，但是電磁場却是一個純物理的場。這種分別又是勉强的，而且照愛因斯坦看來，一個滿意的理論應該有下列特色：

1. 它應該是一個純場理論。
2. 在這個理論裡，電磁場和引力場應該受到同等的待遇，就是說，它倆都是標識着我們宇宙底幾何。

愛因斯坦所曾努力的就是把這層塵障從我們的理論裡洗滌乾淨。這層塵障，上面已經說過，是由一個雙重對偶而起的。即：質與能之對偶，物理與幾何之對偶，也就是說，電磁場與引力場之對偶。他相信爲我們宇宙尋求一個簡單的，但是比李曼還更廣義的幾何，是會引導我們得到一組純場方程式以描寫電磁的與引力的現象。不僅如此：這樣一個理論，如果成功的話，應會把構成原子的基本質子的性質給我們透露出來，而同時又能解釋行星、恒星和星雲的運動。

愛因斯坦相信，他也許已經解決了這個大問題。事實上，他的新理論完全地是個統一的場理論。在這裡呈現的只是場本身，沒有場之泉源。物質之存在必須從場方程式裡抽繹出來，必須從方程式的解中去找到代表能的集中處。他的新理論又是個單純的幾何理論。依照麥克斯威爾的理論，電磁場是由六個函數來標識的，依照愛因斯坦舊理論，引力場是由十個函數來標識的。但是度量場，依照愛因斯坦的新理論，乃是由十六個（就說10×6＝16）函數來標識的。（用專門術語就是說：電磁場是由一個由六個成分組成的反對稱張量來標識着，引力場是由一個由十個成分組成的對稱張量來標識着，而新愛因斯坦世界的幾何，乃是由一個二級的，由十六個成分組成的廣義張量來標識的。）

在普遍相對論裡，愛因斯坦的場方程式標識了我們世界底李曼幾何。但是我們世界底幾何，依照愛因斯坦的新理論，是個非李曼的幾何，且與愛因斯坦的新場方程式是協調的。在新理論裡，每一個概念自有它的幾何影像。單純的物理概念和概念之兼有一個幾何解釋者之分別，不復存在了。物質與場之分別，也不存在了。這兒只有場，它是幾何的，又是物理的；這兒只有場方程式，它們代表我們世界底幾何，又代表物理的定律。

當場之强度微弱時，我們從新理論中又得到舊理論中諸定律，就是說，麥克斯威爾的與引力方程式。這必須如此，因爲每一個新理論定要能够解釋它所放棄的理論所曾解釋了的現象。正如科學史例所昭示的，所放棄的理論是以新理論的初次近似値的身份而出現。

雖則愛因斯坦的新理論有許多引人入勝處，我們還不知道它究竟是不是一個成功的統一的理論。在舊理論裡，物質之存在是得單獨假定的。會不會是新理論的成功正在舊理論失敗了的地方？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問題，我們現在還不能作答。情形是複雜的。近代物理學之發展是關於量子規律，這些規律在原子裡是正確的。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此類規律能否與如何從愛因斯坦的場理論中導引出來。但是人們不要太懷疑。愛因斯坦的工作每每遭遇到一時的懷疑因爲他的天才是比他的時代前進。這類事曾發生過兩次了，說不定還會發生。

（譯自Discovery一九五〇年四月號，倫敦版）

新編「哲學史」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 譯

自一九四七年日丹諾夫在『西歐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之後，蘇聯哲學家就積極準備編寫一部眞正科學的『哲學史』，聞該書初稿現已寫成。『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開始發表該書第二卷的第四、五兩章。第四章譯文已刊載於『新華月報』第十三、十四、十五期。經商得譯者同意，將第五章的譯文，先在本刊發表。第五章全文約七萬字，將在本刊連載。

——編者

第五章 巴黎公社後（一八七一年——一八九五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一 工人運動底廣泛增長和群衆性的社會主義政黨底建立

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在西歐，照列寧底規定，是風暴和革命底時期。到這時期底終結，在西歐國家裡資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完全確定了，資產階級底民主改革也完成了。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後開始的新時期，如列寧所指出，『同第一個時期的不同之特點是「和平的」性質，缺乏革命。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已告結束。東方尙未成熟。

西歐進入「和平的」準備未來的改造時期底階段。無產階級的、按其基礎是社會主義的政黨到處都在形成，它們學習利用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創立自己的日報，自己的教育機關，自己的合作社。馬克思底學說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並向廣度上發展。無產階級力量積聚底過程和準備未來戰鬥的過程雖然是緩慢地，但却確定不移地在前進着。』㊀

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的生產還是按上昇的路線推進。這樣的工業部門，如機器製造業、電氣技術工業、化學工業，這些工業事實上以前是不存在的，現在都發展起來了。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底不平衡性、跳躍式底規律底作用越來越看得明顯。英國在七十——九十年代失去了自己的『世界工場』底特殊地位，美國和德國趕上它并超過它。英國在世界生產中的份額減低了一半，雖然它在對外貿易和銀行資本發展底領域還保持着領導權。法國在一八六〇年佔工業生產的第二位，到十九世紀末已退居於第四位。德國迅速工業化了，特別是從被戰勝的法國取得了大量的賠款。

經過改革的俄國也踏上緊張的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寫到這個時期說：『從一八六一年起，俄國現代工業在一個偉大民族所應有的規模上開始發展起來。』㊁

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掩蓋資產階級社會底驚人矛盾底試圖相反，資本主義越來越暴露出自己的對抗的性質。生產底劇烈的增漲爲尖銳的長期性的危機所代替。『繁榮底時期——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寫道，——已經再不可能達到自己的完全發展……』㊂

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四五——五四六頁。第四版。

㊁馬恩通信選集第四四七頁。一九四七年。

㊂馬恩全集二十七卷第三一三頁。

一八七三年底嚴重的經濟危機同蕭條一起，一直繼續到一八八〇年，接着在兩年的『繁榮』之後，歐洲重新又投入經濟危機底不安中，這次危機是從一八八二年開始的。一八八九年短期的生產上昇更引導到一八九二——一八九五年底蕭條。資本主義底對抗的矛盾底發展削弱了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底基礎；工業高漲底時期同時又是個別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體系衰頹底開始。

『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年，——列寧說，——是向新的帝國主義時期的過渡。』㈠

到十九世紀末，大的資本主義强盜之間的世界瓜分已告完成，從自由競爭中生長出壟斷，產生了財政寡頭，資本主義體系底衰頹徵候愈益表現得鮮明，『文明的』國家同被奴役的殖民地之間和資本主義國家本身之間的矛盾加深了。這些矛盾由於勞資之間增長着的對抗而變得更加尖銳。

工業革命底完成，大工業底迅速發展相當增加了一切歐洲國家和美國無產階級底羣衆。

從巴黎公社重重地打擊了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資本主義新時期，『自由的』資本主義生長成爲帝國主義的時期乃是工人運動廣泛增長和羣衆性的工人政黨創立底時期。

『第一國際——列寧寫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讓位於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無比增長的時代，即工人運動廣泛發展，羣衆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在各個民族國家基礎上成立的時代。』㈡

一八七七年由蓋德所組織的報紙『平等』宣傳無產階級反對資本階級的不調和的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底不可避免。在蓋德派底發起之下，於一八七九年在馬賽召開的工人代表會議，奠定了法國社會主義工黨存在底基礎，法國的工黨組織是在一八八〇年正式形成。就在這一年，這個黨底領袖蓋德和拉發格發佈了黨底競選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直接參加這個綱領底製訂。黨底進一步的發展引導到分裂爲以蓋德和拉發格領導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部份和以瑪倫和不魯士爲首的機會主義的部份。

在自己的活動中，法國的社會主義黨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恩格斯曾對它作了尖銳的批評。由於恩格斯底影響它在九十年代成長爲羣衆性的社會民主黨。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底領導之下，在工人中間獲得了廣泛的聲望。在普法戰爭時期，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作爲德國國會底代表，站在正確的、國際主義的立場，拒絕投票對普軍底軍事貸款。這個革命的行動，如同他們對英勇的巴黎公社的公開支持（爲了這件事，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曾坐過牢。）一樣保證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在工人階級中享有光榮的名譽。在一八七四年的國會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有九個代表獲選。它的影響不斷增長起來。

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拉薩爾主義者底統一大會上通過了一個綱領；這個綱領貫穿了拉薩爾底機會主義的思想。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後的機會主義變質底來源之一。馬克思主義底奠基者警告德國社會民主黨不要過早地同拉薩爾主義者統一，并要求後者先要承認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對哥達綱領作了毁滅性的批評。可是，馬克思所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事實上已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導者推翻了。雖然這樣，工人階級以自己的階級的期望解釋了哥達綱領，更加團結在社會民主黨底週圍。即在一八七七年幾乎有五十萬選民投社會民主黨國會候選人底票。以俾士麥爲首的普魯士政府懾於社會民主黨力量底增長，決定採取絕望的措施：一八七八年國會通過一個反對社會主義者的『特別法案』，置無產階級的政黨於非法的地位。

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幫助，黨轉入了秘密的狀況。在十二年中間它鞏固了自己的處於地下的組織，利用國會講壇和非黨的工人組織來同無產階級底廣泛的羣衆保持着直接的聯系。黨鞏固了自己的隊伍，在支持它的工人羣衆中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在一八九〇年有一百五十萬選民投社會民主黨底票，結果達到使『特別法案』取消和俾士麥辭職。恩格斯對此寫道：『在德國，俾士麥在十二年中使社會主義者處於非法地位，但是社會主義者踐踏了特別法案，他們趕走了俾士麥并成爲現在帝國內的最强大的政黨』㈢

由於黨底合法化而產生的黨的工作條件底根本改變，進一步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同時也包含了合法的鬥爭形式底過份估計底危險——這個危險，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曾對『國會的白痴主義』作了消滅性的批評，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始終是估計不足的。

㈠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〇四頁。
㈡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十三頁。
㈢馬恩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二九頁。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不同在它腹內發展起來的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無情的鬥爭而保衞馬克思主義學說底純潔性，誇大合法的國會的勝利底意義和懼怕『特別法案』底重複，一步一步離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立場。

在英國，由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在世界市場上二十年之久的壟斷底結果，工人階級長期處於資產階級政策底直接影響之下。只是由於英國資本主義對世界的領導權逐漸的喪失，才促成英國工人運動中革命傳統底生長。英國工人運動底基本形式是職工組織——工會，工會把自己的任務局限於經濟鬥爭底範圍，對無產階級底階級任務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敵視的。

可是，從八十年代開始，標誌着社會主義思想在英國工人中間影響底生長。在一八八四年社會民主聯盟組織起來了，以海因德曼爲首領，他自稱是馬克思底後繼者。但是，海因德曼底機會主義的路線，宗派主義的拒絕工會中的工作，同保守主義者的無原則的選舉集團使得聯盟在一八八四年發生分裂。以後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聯盟，也表現無力實行工人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和落到無政府主義去。在八十年代末參加罷工，獲得了日益廣泛的羣衆性質，組織了粗工、海員和火夫、瓦斯工廠工人底工會。最後的頑强的和持續的罷工達到工作日縮短到八小時。倫敦的船塢工人罷工持續兩月之久，它鼓起了一切英國無產階級底政治積極性。從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二年，工會會員底數目增加了兩倍，達到一百五十萬。一八九三年組織了獨立的工黨，但是它也表現着無力實行工人運動中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推翻了階級鬥爭，『這個政黨，——正如列寧所强調指出，——只是對社會主義是獨立的，而對自由主義却很依賴。』㊀

因此，在這時期增漲着的英國無產階級底羣衆性的運動實質上沒有越出經濟鬥爭底界限，沒有克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影響，離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還遠得很。

美國底工人運動也表現着類似的特點，這個國家在本世紀末已充當了資本主義底大堡壘。在一八七七年國際底美國支部（被一八七六年的費芝得爾菲會議底決議所解散）組成爲社會主義工黨，以佐爾格爲領導者。可是這個黨主要是從德國的流亡者組成的，它對羣衆的工人運動採取宗派主義底立場，這就使它失去了進一步增長底陣地。

然而，美國的工人組織獲得了日益廣泛的羣衆的性質。在一八八七年『勞動騎士』底組織有會員七十萬。工人底相當數目的羣衆聯合組成美國勞動聯合會，這個組織一成立就追隨着英國工會底政策。同時，自發的工人運動緊密無間地引導到工人階級底羣衆的起義，這是具有革命意義的。

當說明這個時期英國和美國工人運動底一般的、基本的特點時，列寧寫道：『這些特點是在無產階級而前缺乏某種巨大的，全民族的民主的任務；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策的完全服從；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對無產階級的宗派的隔離；社會主義者在工人羣衆面前在選擧中任何微小的勝利也沒有，如此等等。』㊁

一八八二年產生了意大利工黨，同年產生了波蘭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一八八五年產生了比利時工黨，一八八八年產生了奧國社會民主黨。

在七十年代，在俄國的工廠中發生了一七〇次以上的罷工，并且其中許多次如在列夫的紡織工廠的罷工（一八七〇年），在克連哥爾姆的工廠底罷工（一八七二年）帶着持久的、頑强的性質。在一八七五年產生第一個工人的組織——『南俄工人協會』，在其規章上反映出第一國際底思想。在一八七七年工人彼得·阿列克塞葉夫底演講震動了俄國，他在五十個政治犯受審時預言地聲稱：『舉起百萬工人羣衆底青筋綻出的手，使那被兵士的刺刀保護着的專制底重荷化爲塵土。』在一八七八年產生了『俄國工人北方協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着俄國革命事變底發展，在一八八二年寫道：『俄國是歐洲革命運動底先鋒隊。』革命運動底中心已從西方轉移於東方；使俄國成爲列寧主義底故鄉的歷史條件已形成了。英明地預見到未來，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寫道：『革命這一次是從東方開始，東方一直是反革命底不可動搖的堡壘和後備軍。』㊂

在一八八三年，卡爾·馬克思逝世。『在馬克思逝世之後，——列寧說，——恩格斯一個人繼續是歐洲社會主義者底顧問和領導者……他們都從年老的恩格斯底知識和經驗底豐富的寶庫中汲取一切東西。』㊃一八八三年普列漢諾夫在日內瓦創建了第一個俄國的社會民主的組織『勞動解放』社。一八九五年列寧創建有名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這時期革命運動發展中的重大事

㊀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三一頁。

㊁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二四頁。

㊂馬恩通信選集第三一一頁。一九四七年。

㊃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十二頁。

件。

羣衆性的工黨底發展，使社會主義底意識同自發的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要，各國無產階級之間的國際聯系底發展提出了建立新國際的問題。由恩格斯底領導作用，法國機會主義者『波西比主義者』[21]想把國際組織底領導權抓在手裡的企圖就被擊破。第二國際底第一次會議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召開。會議宣佈『五一』是無產階級底每年的國際的節日，組織八小時工作日底鬥爭，製訂以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精神對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底綱領。這就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勝利。

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已深入工業區的羣衆裡面去……』[22]，他同時又同馬克思主義底機會主義的曲解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他所寫作的對愛爾福特的社會民主綱領（一八九一年）底批判可作爲對於這件事的鮮明的例證。

一方面承認這個綱領比之拉薩爾的哥達綱領略勝一籌，同時恩格斯又批評了其中包含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對專制主義底革命的顚覆底必要性默爾不言。揭發了這個『愛和平的機會主義』之後，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黨底基本任務是準備用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關於這點綱領裡也一字不提。然而，恩格斯底這些最重要的指示，事實上并未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領袖所採納。

執行了對歐洲社會民主黨底領導，恩格斯曾同它們的活動中所表現的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由於他的堅持，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愛爾福特大會從黨內開除了無政府主義的集團所謂『青年』，他們宣傳宗派主義的拒絕職工會中的工作，否定國會鬥爭等等。恩格斯反對德國的機會主義底另一集團的鬥爭也是同樣的堅決，這個集團底首領佛爾曼要求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列入保護富農份子的條款。

在『法國和德國的農民問題』那篇論文中，恩格斯批評了法國社會民主黨底農業綱領，因爲它宣稱必須進行反對農民無產階級化底鬥爭。推翻了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見地，恩格斯寫道，無產階級的黨應當爭取使農業生產手段過渡爲集體所有，想保護小農底私有而避免資本主義發展底企圖只是保護它的奴役制，而不是解放。

『……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恩格斯寫道：——我們不要想到用暴力去徵收小農（有補償或沒有補償反正都一樣），如像我們迫不得已對待大地主那樣。在對待小農方面，我們的任務首先是在於使他們的私人的生產和私有的財產變爲共同的，但不是靠暴力的方法，而是靠爲達此目的的社會互相底實例和建議。』[23]

以上所述的歷史時期，照列寧底規定，這是羣衆的、成份上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黨形成和生長底時期。在這時期發生了：社會主義思想底廣泛的傳播，無產階級各種組織底空前的成長和它準備着執行它所担負的全世界歷史的任務。

在這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發行了相當的數量，譯爲法文、俄文、英文、意文以及其他語文，他們的著作已被一切國家底先進的無產階級所熟知。資產階級的報紙長時期內對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底著作默爾不言，如今被迫打破了沉默底陰謀，而展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公開進攻。可是，資產階級反對科學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底討伐只是使它傳播得更廣些。

第一國際就已號召工人研究『資本論』。歐洲底工人政黨用自己的資金來組織印行馬克思主義奠基者底著作。隨着黨底生長，大量的社會主義的報刊也建立了起來，這樣的報紙和雜誌有幾十種之多。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思想在俄國也相當流行。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理論上總結了巴黎公社和資本主義發展底以後階段和無產階級底解放鬥爭底歷史經驗，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學說，使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生根在工人運動裡，準備了無產階級的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革命幹部，總結了幾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底發展，當他們在自己的英明著作中宣傳這種哲學的時候。

在上述的這個時期，馬克思寫作了著名的『哥達綱領批評』。恩格斯創作了幾部巨著，這些著作獲得了全世界的聲譽，並且對工人底共產主義世界觀底形成具有永久的意義。其中最主要的是『反杜林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留得維格・費爾巴哈和古典的德國哲學底終結』，關於歷史唯物論問題底通信，『自然辯證法』。

恰恰就在這個時期辯證唯物論問題是被同此時期底自然科學底最重要的總

[21] 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極端的機會主義者。它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底雜湊的集團；執行同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底政策。——譯者註

[22] 馬恩全集二十九卷第一八六頁。

[23] 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五四——四五九頁。

結聯系起來考察。在這些總結底理論的總結底基礎上，恩格斯創立了和闡明了辯證法底主要的規律，進一步研究了認識底唯物論問題和對辯證唯物論世界觀作了深刻的說明。歷史唯物論底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歷史底唯物論的理解底許多根本問題得到進一步的研究和具體化。哲學理論底這個發展適應於新時期底工人運動底迫切要求，當時馬克思主義流行更廣，而要求以展開的形式來敘述革命的世界觀，以便用它來武裝工人階級底先進階層。

在一切主要國家中，工人階級政黨底形成要求製訂階級地限定的綱領和正確的策略。而爲了使綱領和策略擺脫開一切機會主義的曲解，必須在綱領和策略底構造中是從現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出發。

有鑒於用共產主義世界觀底精神教育工人羣衆底迫切需要，反對一切輕視理論、反對對它的曲解底鬥爭底迫切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賦予研究和闡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以特別的意義。

的確，不論是馬克思，不論是恩格斯，都沒有對自己的世界觀作出系統的敘述，雖然他們也曾有此打算，只是因爲更迫切的任務而沒來得及做。可是，恩格斯估計到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底連貫的敘述底需要時機已經成熟，他就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反對馬克思主義敵人、反對一切對這理論底不正確的解釋底試圖底論著來達到這個目的。

在巴黎公社後開始的這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採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及其政黨底問題上作了前進的一大步。

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英明地總結起來的巴黎公社底經驗，具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這個經驗允許指出這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措施，這些措施是無產階級在取得了政權以達到社會底共產主義改造所必須實行的。自然科學上和歷史領域內的研究者所發現的新的材料，對於研究馬克思的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也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恩格斯批判地考察和總結了摩爾根及其他的研究者所收集的關於古代歷史底材料，對過去歷史上的某些重要的問題作了科學的答復，這對奠定歷史底唯物的理解有着現實的意義。

二　巴黎公社經驗底理論的總結和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底進一步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爭取改良底鬥爭，同非無產階級政黨協同的行動，其目的在於爭取工人和農民生活底暫時的改善，任何時候也沒有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基本目標——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作爲引導勞動人民走向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唯一道路。

由於細心研究了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德國和特別是法國工人底革命鬥爭底實際經驗底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達到了最重要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底條件是破壞、打碎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馬克思在他的著作『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年）裡作出了這個結論。

根據着巴黎公社底經驗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馬克思於一八七一年四月寫信給庫格曼說：『假如你讀到我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見，我認爲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歷來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隻手轉交到另一手，而是要毀壞它，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眞正的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嘗試恰恰就在這裡。』㊀

闡明和發展馬克思關於大陸上的人民革命的時候，列寧指出說，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都不佔人口底多數，因此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底國家的官僚的機器底打碎，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能達到，就是說，這個革命要得到勞動者底其他階層，首先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支持。『因此，在說到「眞正的人民革命」的時候，馬克思絲毫沒有忘記小資產階級底特性（關於這些特性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到），他最嚴格地估計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的大多數大陸國家的階級底實際對比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國家機器既是工人利益，也是農民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把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關於剷除「寄生虫」而用某種新東西來代替它的共同任務。』㊁

認爲打碎國家機器是大陸國家革命發展底必須的階段，馬克思，如衆所週知，又指出了例外的情況，特別是對於英國和美國，列寧對這個的解釋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強大的官僚警察機關，它是在帝國主義時代而特別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才

㊀馬恩通信選集第二六三頁。

㊁列寧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九頁。

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十五次全蘇代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也肯定列寧所解釋的這個原則底正確性，他指出說，在帝國主義時期，英國已變成『同任何其他大陸國家一樣，不大不小軍國主義的了。』㊀

積極地保持着歷史經驗底實際的基地，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那等待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當時，經驗還沒有給予提出這個問題底材料，只是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的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去。』㊁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用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豐富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學說。它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底原理底正確性和提供了豐富的材料來創立這個理論底新的原理。公社證實了和事實上奠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打碎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底結論，並提供了材料來解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了的國家機器這個問題。

馬克思在英明的文獻『法蘭西內戰』內曾對公社底經驗從理論上作了分析和總結，這部著作寫於公社失敗後兩日。

『馬克思底學說，——列寧寫道，——就在這裡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哲學的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所闡明的經驗總結。』㊂

馬克思和恩格斯規定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是從工人起義中合法地產生出來的，它是以巴黎底無產階級爲首領的。

無產階級吸引了小資產階級羣衆和相當數量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在自己的周圍，這證明了只有它才能成爲領導者，只有它才能成爲民族解放鬥爭中和實行最高限度的民主改革的革命中的首領。澈底地施行民主改革以利於一切被壓迫，被剝削者，堅決地保衛祖國反對外國侵略者，無產階級就必然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改革，無產階級用自己的鬥爭證實了馬克思關於不斷的革命，關於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鬥爭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底聯系這些原理底正確性。在說明巴黎的無產階級起了革命首領底作用時，馬克思指出廢除資本家底統治是民族安全底必要的條件，因爲『工人階級底政府首先是爲了拯救法國免於滅亡和瓦解所必需的，而滅亡和瓦解對法國的威脅是從統治階級方面來的……』㊃

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在那裡，資產階級已是反革命的階級，共同的民族的任務只能用無產階級的方法來解決，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領導底思想作出了基本的輪廓，宣佈爲什麼無產階級能夠把一切最忠實的，優秀的巴黎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當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時，無產階級實行了最高限度的民主改革，明顯地證明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底最高典型，是工人底眞正自由。因此，不只是巴黎底手工業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跟着工人走，並且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前進部份也跟着工人走，他們認爲工人是自己的救星。

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改革同最高民主底澈底執行的不可分離的聯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底嚴重的錯誤是在於把社會主義的任務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等量齊觀。巴黎公社社員在他們還沒有軍隊的時候，拒絕追擊梯亥爾政府。他們沒有把法蘭西銀行國家化，沒有剝奪工人敵人底選舉權，遲遲不實行革命的，社會的措施。巴黎公社宣傳民族底統一，然而作爲一個民族總是分裂爲彼此敵對的，相互鬥爭的階級。『我們不需要任何階級，——巴黎公社底領導者宣佈說：讓我們只有一個階級—人民。』他們斷言的確存在着『勞動的資產階級』，它『按照自己的勇敢和自己的願望是無產階級底親姊妹。』列寧發展馬克思底原理時說巴黎公社是這樣的政府，它『不懂得而且當時也不能區別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變革底因素，它混同爲共和的鬥爭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任務。』㊄巴黎公社底基本缺點是勞動者底鬥爭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領導。領導公社的是左派普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他們不理解社會發展底規律，階級鬥爭底規律。

如列寧所指出，公社不懂得誰創作了它，因此由公社社員所自發地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是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依據巴黎公社底經驗直接達到這個最重要的結論：共產黨底領導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實行有決定的意義。

列寧，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估計了帝國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底新的經驗，於是說，更爲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一個黨，馬克思主義底黨底領導之下才能實現……』㊅

㊀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五一頁。
㊁列寧全集第二五卷第三八一頁。
㊂列寧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七九頁。
㊃馬克思和恩格斯『巴黎公社』。選集第九四頁。一九三八年版。
㊄列寧全集第九卷第六三頁。
㊅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九八—九九頁。

公社失敗底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不能在事實上實行同勞動農民底聯盟，雖然也曾企圖這樣做。並且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是由於碰到中等階層而首先是農民底反對。

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闡明了巴黎公社底偉大意義，同時也指出了公社領導者所犯的錯誤底根源，於是達到了最重要的理論結論：必須用巴黎公社型底國家新形式來代替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是以反對榨取的國家，反對一般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爲目的革命，而不只是反對榨取社會裡的國家政權底這一個或那一個形式。巴黎公社由於羣衆底革命的創造性消滅了舊的官僚制度和舊的軍隊，在事實上證明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打碎。

巴黎公社並不限於舊的國家機器底消滅：它開始創造新的國家機器，直接與勞動者聯系，勞動者通過人民新選出的機構來行使立法權。公社結束了行政權（在資產階級的國家它是與選民脫離的）與立法權底對立安排，根本改變了兩者底性質。在短促的時間內巴黎的工人組織了政權和管理權，它是建立在勞動羣衆底積極性和主動性上面；每一個負責人員都是勞動者底代表，直接向他們負責，按照他們的要求任命和撤換。公社所建立的武裝力量不是與人民敵對的力量，如在資產階級國家裡的情況那樣，而是代表着已走上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的道路的人民底實際的權力。「公社——馬克思說，——應當不是國會的機關，而是工作的集體，聯合立法權與行政權於一身。」㈠「……它本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階級反對佔有階級的鬥爭底結果，是最後發現的政治形式，只有在這種政治形式之下，勞動底經濟解放才可能完成。」㈡

巴黎公社所建立的新的政權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國會底榨取的性質，明顯地證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按自己的階級內容，並且因此也按自己的國家形式與資產階級國家有原則上的區別。斯大林同志强調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認爲一般的共和國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底政治機構底形式，而在巴黎公社以後，他們解釋這個名詞時說，這個共和國應當是巴黎公社型的共和國。」㈢

公社存在底短暫，巴黎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完全的和不穩固的這種情況，公社存在底歷史條件底特殊性，它是在凡爾賽和普魯士的軍隊包圍之下，這一切都不允許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具體地規定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底基本特點。這一點是列寧完成的，他依據俄國革命底經驗發展了馬克思底學說，在理論上總結了人民底革命的創造，發現了與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相適應的國家形式，這個專政就是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共和國——斯大林同志說，——因此，是這種最後被找到的、被發現的政治形式，在它的範圍內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應當完成。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它的發展和完成。」㈣

巴黎公社底經驗證實了馬克思底學說和以新的材料豐富了它，這些材料是進一步發展唯物史觀所必要的，給予統治着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底形式以新的致命的打擊。

雖然巴黎公社底失敗招致工人運動底暫時的低落，公社底傳統終歸是工人階級鬥爭底以後的高漲底基礎之一。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和代表他們的利益的國家的鬥爭由於巴黎公社而踏入新的階段。

列寧和斯大林從理論上總結了無產階級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解放鬥爭底經驗，他們經常依據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底經驗底總結。列寧寫道，公社教育了無產階級更具體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底問題，上了實際上很重要的一課：利用革命的形勢，利用某些有利的，戰爭所造成的條件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轉變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列寧寫道：——是巴黎公社底經驗所指出的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的口號……」㈤

因此，巴黎公社底歷史經驗無論對於全世界的工人運動，無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發展，以及進一步豐富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取專政底道路、關於無產階級國家底學說都有很大的意義。

（本節完，全文待續。）

㈠馬恩選集第一卷第四七七頁。
㈡同上第四八一頁。
㈢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一一三頁。
㈣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二二頁。
㈤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十七頁。

學術問答

〔問〕**什麼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聯合國組織和戰前的國際聯盟有沒有什麼不同？聯合國組織是否也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

（長沙　王永昌提）

〔答〕（一）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可以從聯合國憲章的序文和第一章（宗旨與原則）的文字看出來。憲章第一章關於聯合國的宗旨列舉四項，關於爲求實現這些宗旨而爲聯合國組織及各會員國所應遵行的原則列舉七項，都明載於憲章中，可以查閱，這裡不細說了。但爲易於了解起見，也可以從這裡面抽出一兩項，來簡要地說明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例如：「本組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原則第一項），「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宗旨第二項）。現在試從這些字句出發，來衡量美帝國主義者在聯合國組織中以及在聯合國組織外所表現的種種行爲，特別是利用聯合國組織來掩護它在朝鮮的侵略，以及干涉別國內政、破壞別國主權、奴役別國人民，宣傳戰爭不可避免和積極準備戰爭等等，就證明美帝的這些行爲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的。（關於這一方面，請參看人民出版社最近印行的「美帝怎樣破壞聯合國？」一書，梁純夫作——編者）

（二）聯合國組織和戰前的國際聯盟是有着本質上的不同的。首先，國際聯盟原本是帝國主義集團的一種組織，目的在維持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而被重新分割的世界的所謂「現狀」或「均勢」，保全戰勝的帝國主義國家新獲得的特殊權益和勢力範圍。聯合國組織是根據於完全不同的原則，它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爭）中大國合作擊敗軸心國家的侵略的寶貴經驗發展出來的，因此它的目的是藉各國、尤其是大國的合作來維持並發展世界人民對於法西斯的勝利，而不是維持帝國主義國家的既得權益。其次，聯合國組織與國際聯盟的基礎也是不同的。國際聯盟一開始就排斥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參加，後來因德、日、意相繼退出國聯，威脅着英法等帝國主義者的既得權益，才想利用蘇聯一下，不久蘇聯證明不被利用，便又把它「開除」出去了。因此這個國聯本質上是反蘇反共和反人民的。今天的聯合國，蘇聯是發起者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蘇聯參加聯合國，是以兩種制度能夠在相當長期內並存合作以維持世界和平的基本政策爲出發點的。蘇聯當時不能夠利用國際聯盟來實現它的集體安全的主張和維持世界和平的目的，是因爲那時候它的國際地位還沒有現在高，在它背後的人民力量也沒有現在大。今天的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蘇聯本身有力量來實現它在聯合國所提出的主張，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也已經團結起來，願爲蘇聯的和平政策的後盾，這一點可以從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以及和平簽名運動方面得到明證。再次，聯合國組織的機構與國際聯盟也有些不同。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會成爲聯合國組織的最高執行機構，以五大國家爲常任理事國並保持大國一致原則（否決權）。雖然美帝國主義者屢次企圖取消聯合國組織的這一特異優點，搞一些所謂「小型聯大」和「保障和平的聯合行動（七國提案）」來以大會代替安理會的職權，但是在世界人民的巨大壓力之下，這些把戲已被證明不起重大作用了。簡括來說，聯合國組織與國際聯盟不同，基本上是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同，從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形勢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啓示。

（三）聯合國組織是否會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根據上面第二題所指出的幾點，我們認爲，只要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以行動來響應蘇聯在聯合國中的和平主張和建議，粉碎美帝國主義者利用聯合國組織和破壞聯合國憲章的種種罪惡陰謀和侵略計劃，聯合國組織是有它的積極意義的。保衛世界和平與保衛聯合國憲章是同一件事情，同一個目的，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爲它而鬥爭到底。

（梁純夫）

〔問〕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可以實行計劃經濟以避免經濟危機？

（桐廬　董昌榮提）

〔答〕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能用任何辦法來避免經濟危機的。要避免經濟危機，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其理由簡述於下：

1、照這個問題的提法看來，好像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的無計劃或無政府狀態。其實不是的。我們知道：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是無計劃的，就是在簡單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也是無計劃的。可是在簡單商品經濟之下，祗有危機的可能性，還沒有危機的現實性，因爲『這種可能性轉化爲現實性，必須種種關係，這種種關係在簡單商品流通範圍內，是都還不存在的』（資本論第一卷俄文本一二〇——一二一頁。郭王中譯本七一頁）。

2、引起危機可能性轉化爲危機現實性的種種關係，也即是決定危機必然性的種種關係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祗有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能完成。它包含在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中，即包含在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之間的矛盾中。這個矛盾內在於資本主義，並且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能克服的。這個矛盾才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3、正是生產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的佔有方式間的矛盾表現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特點。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其他矛盾都是這個根本矛盾的體現者。其中最重要的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敵對；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生產剩餘價值的條件和實現剩餘價值的條件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也同樣體現了生產社會性和資本主義佔有方式間的矛盾。列寧批判愛弗露西時說過：『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生產的無計劃性，這是體現着什麼的呢？這是體現在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間的矛盾。』（列寧全集，第二卷，俄文第四版，一五二頁）。

總而言之：在生產社會性和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危機必然要週期地發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爲這個矛盾綜合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一切矛盾，而又由其中的每一個矛盾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的每個矛盾所以會成爲危機的原因者，是因爲它是資本主義這個根本矛盾之體現者。這就是說，危機的原因，危機的不可避免性蘊藏在資本主義的本性中，固存於資本主義的階級敵對中。所以，如果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不消滅，經濟危機是決不能以任何辦法來避免的。

4、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不能實行眞正的計劃經濟的。因爲實行計劃經濟必須具備容觀的前提條件，其中最根本的條件有二個：第一個是政權操在直接生產者手中，就是說，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來掌握政權；或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衆來掌握政權。第二個是一切重要的生產手段都由私人的資本主義的所有制轉變爲社會的所有制。就是說，一切工廠、製造廠、土地、鑛山、銀行、交通機關等等，都收爲國有。例如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蘇聯，這二個條件都完全具備了。所以，在趕走十四國帝國主義干涉者和消滅國內白匪，並於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就開始實行建設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了。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二個前提條件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政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同時生產手段和生產品都爲極少數的資本家所有。每個資本家，每一資本家集團都是爲獲得高額利潤，一方面對無產階級日益加強剝削，而企圖增多剩餘價值量和提高剩餘價值率，他方面又爲實現剩餘價值而彼此展開猛烈的競爭。雖說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的資本主義，即發展到帝國主義，但壟斷並沒有消滅競爭，剛剛相反，競爭不但和壟斷並存，而且更加尖銳，在這種情形下，是決不可能實行眞正計劃經濟的。

自從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及爲資產階級服務的經濟學家們，一方面要想方法來和緩與克服危機，他方面看到蘇聯五年經濟計劃的勝利完成，因此也想要『東施效顰』，妄想實行計劃經濟了。（例如羅斯福的新政）。但是，實行的結果，不但沒有克服危機，而是危機更加嚴重，更形尖銳。

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也想實行『計劃經濟』來預防危機的發生。例如，美國一九四六年的所謂『充分就業』的法案，和戰後法國所實行的『莫納四年計劃』。但是實行的結果怎樣呢？美國失業人數依然增加着。法國的經濟危機也愈形惡化了。這是因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發展了。

根據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特性，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都是不能改變的。因此，經濟危機也就不能用任何辦法來避免的了。

斯大林曾經說過『爲了消滅危機，就應消滅資本主義』，這是一個眞理，這個眞理已經由蘇聯的實際經驗證實了。

（李陶達）

【問】我們說，在黑格爾的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瀋陽　何玉冠）

【答】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敍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為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中譯本一一——一二頁）

在馬克思的這段話裡，有兩點意見是非常顯然的：第一，在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中，有其一定的合理的內核。但這個內核卻給他的唯心論的神秘的外衣隱藏着，必須剝去這個外衣，合理的內核才能發現。這就說明，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唯心論和辯證法在一定意義上雖是不可分的統一體，但卻也不是絕對不分的東西，只要把他的神秘的外衣剝去，即把他的唯心論的外殼去掉，就可以看出他的辯證法中的革命因素來。

第二，馬克思認為在黑格爾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才能發的合理的核。這就是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可用唯物論來加以改造的。而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確是這樣做了。如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所規定的辯證法三大規律（即質量互變、對立物的互相貫通、否定之否定），在黑格爾的「邏輯科學」中都有詳細的規定和說明。但如果以為黑格爾在「邏輯科學」中所規定的和恩格斯所規定的是完全一樣，那就大錯特錯，因為在恩格斯手上，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是賦與了實際生活的內容，與自然現象和社會歷史現象相結合，並且是從後者的客觀規律中抽象出來。所以，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惟過程是現實的創造主；現實僅為思惟過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卻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資本論」序文）

列寧在他的「哲學筆記」中，說到黑格爾的「邏輯科學」時，也曾有如下的批評：

『在這黑格爾的最唯心論著作中最少唯心論，最多唯物論。』

『若不研究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而特別是其第一章。』

這些話，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和馬克思的唯物論的辯證法，在其發展過程中的關係。但必須重覆着重指出的是：儘管這兩者有着一定的關係，但這兩者究竟是完全相反的東西，如同馬克思自己告訴我們的。

（馬　特）

請批評！
請介紹！
請訂閱！

編後記

「實踐論」的發表，對於我國的學術研究工作，是有極大意義的。李達先生在百忙中，給本刊趕寫了這篇「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我們非常感奮。現在，各地的學術團體正在展開「實踐論」的學習運動，我們歡迎將學習心得，交本刊發表。

華崗和饒毓泰二先生，都抱病為本刊撰稿，謹致崇高的謝意。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和分期問題，至今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我們希望全國的史學工作者，對於這個糾纏多年的舊案，展開一次新的討論，爭取早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它對新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將有極大的貢獻。關於這方面的論著，我們也歡迎在本刊發表。

這期的稿件，特別擁擠，有幾篇稿子，祇好臨時抽了下來，請作者和譯者鑒諒。由於篇幅的關係，「座談記錄」一欄，要延到下期發表，同時，這期刊登的「一九五〇年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也縮減了一部分，這都是很不得已的。即使如此，本期的篇幅，依然超過了四頁。

承各地讀者紛紛來信，給本刊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正在研究，以後要力求改進。

書評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原書有兩種版本：(一)一九四九年八月華北大學版，(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新華書店的新華時事叢刊本。

李光霖

劉先生這本書，筆者見到過兩種本子。一種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華北大學本；另一種是同年十一月新華書店的新華時事叢刊本。後者書名改爲「美國侵華簡史」，內容和前者完全相同，只是爲眉目清醒計，加上一些小標題。新華時事叢刊本流行較廣，本文所引頁數，即以此本爲準。

在這本書問世以前，中國出版界也曾有一兩本關於中美外交關係的著作，例如唐慶增的中美外交史（民十七，上海商務初版），李抱宏的中美外交關係（民三十五，南京獨立出版社）等等。但都因作者不能掌握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以致讀者讀完這些書之後，不只不能對美國對華政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反會引起許多錯誤，有違事實的看法。一句話，在這些書裡，都充滿了「超階級」、「唯心」的觀點，政治水平極低，對讀者是完全有害的。

劉先生的書就根本不同了。由於他能正確地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所以，他能明白地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一貫是侵略的政策；他還根據具體的材料，指出美帝侵華的發展過程：「起先是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其次是逐漸獨立的侵略中國，再其次是爭奪中國霸權，最後則進行獨佔中國。」這樣的見解，如果我們從研究中美外交關係的角度來看，應該承認這樣的見解是非常深刻而有力的，它把以前流行的錯誤看法都一掃而空，它揭開了歷史的眞面目，使我們從本質上，對美國的侵略政策有了正確的認識。無怪此書出版以來，銷行極廣；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有的報紙更予以全文轉載。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本書在澄清國人對美帝的各種錯誤看法上，實在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以上所說，是指出這本書的價值和貢獻，其次，讓我們也冒昧地提出一些意見：

第一：材料方面：作者在本文前的「說明」裏，開始就稱這本書是一本「小冊子」，又提到「……寫作時許多需用的書籍難以覓到，直接史料一時更無法搜集……。」我們想到老解放區的圖書設備情況和當時作者的研究環境，就不能不欽佩作者能夠寫出這樣的一本「小冊子」來。對於材料方面，似乎是不應過分苛求的。不過，本書雖名爲「小冊子」，而我們從它的章節和附註來看，就覺得它和一般「小冊子」大不相同，稱之爲學術著作也未嘗不可。所以，我們仍不妨來討論一下：

（1）來源：全書中作者大量地引用了李文忠公全書，林文忠公全書，東華錄等「直接材料」，這是本書材料方面的精華，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引了一些書籍雜誌，像萊丹內的「美國外交政策史」（J. H. Latane and D. W. Wainhouse,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和杜勒斯的「中國與美國」（F.R.Dulles, China and America）甚至儲玉坤在東方雜誌上的論文。這些著作和文章，不但觀點有問題，就從它們的內容來說，也祇能算是一般性的作品，它們都是根據別人的研究所編寫而成的，並不是「專著」。我們轉引別人的著作，最好引證「專著」，除非萬不得已（劉先生當時可能即是處在這萬不得已的研究環境裡），最好不要去引這種間接而又間接的材料。一因這些材料的本身可能已有錯誤，二因它將減低了自己作品的權威性。劉先生的這一本書，是一部相當重要的翻案著作，要通過它來戳穿美帝的假面具，清刷傳統的錯誤思想，倘若引證的材料權威性不足，似會減低本書的戰鬥力。例如第二十七頁註四所指的美日秘密協定，作者的根據只是萊特（Q. Wright）的一篇演講辭，這樣的材料，說服力自然不高。若能引出密約的原文或告訴讀者原文在那

〔問〕我們說，在黑格爾的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瀋陽 何玉冠）

〔答〕 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辯證法雖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綜合地意識地、敍述辯證法一般運動形態的，仍須以他為第一人。在他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然後才能在神秘的外殼中，發現合理的核」。（中譯本一一—一二頁）

在馬克思的這段話裡，有兩點意見是非常顯然的：第一，在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中，有其一定的合理的內核。但這個內核卻給他的唯心論的神秘的外衣隱藏着，必須剝去這個外衣，合理的內核才能發現。這就說明，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唯心論和辯證法在一定意義上雖是不可分的統一體，但卻也不是絕對不分的東西，只要把他的神秘的外衣剝去，即把他的唯心論的外殼去掉，就可以看出他的辯證法中的革命因素來。

第二，馬克思認為在黑格爾手上，辯證法是倒立着，必須順過來，才能發的合理的核 。這就是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可用唯物論來加以改造的。而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確是這樣做了。如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所規定的辯證法三大規律（即質量互變、對立物的互相貫通、否定之否定），在黑格爾的「邏輯科學」中都有詳細的規定和說明。但如果以為黑格爾在「邏輯科學」中所規定的和恩格斯所規定的是完全一樣，那就大錯特錯，因為在恩格斯手上，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是賦與了實際生活的內容，與自然現象和社會歷史現象相結合，並且是從後者的客觀規律中抽象出來。所以，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不僅在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且正相反對。在黑格爾，思惟過程是現實的創造主；現實僅為思惟過程的外部現象。但在我，觀念界卻不外是移植在並翻譯在人類頭腦中的物質界」。（「資本論」序文）

列寧在他的「哲學筆記」中，說到黑格爾的「邏輯科學」時，也曾有如下的批評：

「在這黑格爾的最唯心論著作中最少唯心論，最多唯物論。」

「若不研究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而特別是其第一章。」

這些話，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黑格爾的唯心論的辯證法和馬克思的唯物論的辯證法，在其發展過程中的關係。但必須重覆着重指出的是：儘管這兩者有着一定的關係，但這兩者究竟是完全相反的東西，如同馬克思自己告訴我們的。

（馬 特）

請批評！
請介紹！
請訂閱！

編後記

「實踐論」的發表，對於我國的學術研究工作，是有極大意義的。李達先生在百忙中，給本刊趕寫了這篇「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我們非常感奮。現在，各地的學術團體正在展開「實踐論」的學習運動，我們歡迎將學習心得，交本刊發表。

華崗和饒毓泰二先生，都抱病為本刊撰稿，謹致崇高的謝意。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和分期問題，至今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我們希望全國的史學工作者，對於這個糾纏多年的舊案，展開一次新的討論，爭取早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它對新中國的學術研究工作，將有極大的貢獻。關於這方面的論著，我們也歡迎在本刊發表。

這期的稿件，特別擁擠，有幾篇稿子，祗好臨時抽了下來，請作者和譯者鑒諒。由於篇幅的關係，「座談記錄」一欄，要延到下期發表，同時，這期刊登的「一九五〇年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也縮減了一部分，這都是很不得已的。即使如此，本期的篇幅，依然超過了四頁。

承各地讀者紛紛來信，給本刊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正在研究，以後要力求改進。

書評

評劉大年著美國侵華史

原書有兩種版本：(一)一九四九年八月華北大學版，(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新華書店的新華時事叢刊本。

李光霖

劉先生這本書，筆者見到過兩種本子。一種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華北大學本；另一種是同年十一月新華書店的新華時事叢刊本。後者書名改為「美國侵華簡史」，內容和前者完全相同，只是為眉目清醒計，加上一些小標題。新華時事叢刊本流行較廣，本文所引頁數，即以此本為準。

在這本書問世以前，中國出版界也曾有一兩本關於中美外交關係的著作，例如唐慶增的中美外交史（民十七，上海商務初版），李抱宏的中美外交關係（民三十五，南京獨立出版社）等等。但都因作者不能掌握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以致讀者讀完這些書之後，不只不能對美國對華政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反會引起許多錯誤、有違素的看法。一句話，在這些書裡，都充滿了「超階級」、「唯心」的觀點，政治水平極低，對讀者是完全有害的。

劉先生的書就根本不同了。由於他能正確地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所以，他能明白地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一貫是侵略的政策；他還根據具體的材料，指出美帝侵華的發展過程：「起先是追隨或通過別國向中國侵略，其次是逐漸獨立的侵略中國，再其次是爭奪中國霸權，最後則進行獨佔中國。」這樣的見解，如果我們從研究中美外交關係的角度來看，應該承認這樣的見解是非常深刻而有力的，它把以前流行的錯誤看法都一掃而空，它揭開了歷史的眞面目，使我們從本質上，對美國的侵略政策有了正確的認識。無怪此書出版以來，銷行極廣；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有的報紙更予以全文轉載。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本書在澄清國人對美帝的各種錯誤看法上，實在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以上所說，是指出這本書的價值和貢獻，其次，讓我們也冒昧地提出一些意見：

第一：材料方面：作者在本文前的「說明」裏，開始就稱這本書是一本「小冊子」，又提到「……寫作時許多需用的書籍難以覓到，直接史料一時更無法搜集……。」我們想到老解放區的圖書設備情況和當時作者的研究環境，就不能不欽佩作者能夠寫出這樣的一本「小冊子」來。對於材料方面，似乎是不應過分苛求的。不過，本書雖名為「小冊子」，而我們從它的章節和附註來看，就覺得它和一般「小冊子」大不相同，稱之為學術著作也未嘗不可。所以，我們仍不妨來討論一下：

（1）來源：全書中作者大量地引用了李文忠公全書、林文忠公全書、東華錄等「直接材料」，這是本書材料方面的精華，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引了一些書籍雜誌，像萊丹內的「美國外交政策史」(J. H. Latane and D. W. Wainhouse,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和杜勒斯的「中國與美國」(F.R.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甚至儲玉坤在東方雜誌上的論文。這些著作和文章，不但觀點有問題，就從它們的內容來說，也祇能算是一般性的作品，它們都是根據別人的研究所編寫而成的，並不是「專著」。我們轉引別人的著作，最好引證「專著」，除非萬不得已（劉先生當時可能即是處在這萬不得已的研究環境裡），最好不要去引這種間接而又間接的材料。一因這些材料的本身可能已有錯誤，二因它將減低了自己作品的權威性。劉先生的這一本書，是一部相當重要的翻案著作，要通過它來戳穿美帝的假面具，清刷傳統的錯誤思想，倘若引證的材料權威性不足，似會減低本書的戰鬥力。例如第二十七頁註四所指的美日秘密協定，作者的根據只是萊特 (Q. Wright) 的一篇演講辭，這樣的材料，說服力自然不高。若能引出密約的原文或告訴讀者原文在那

一本書裡，它就更加出色而有力了。」

北京解放後，研究的環境比以前要好得多。譬如：美國務院的公文檔案「美國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全部都可以在北京圖書館或其他各大學的圖書館中找到。泰丹內的書，也就可以由鄧奈特 (T. Dennett) 的「美國人在東亞」(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MacMillan, New York, 1922) 和福斯特 (J.W.Foster) 的「美國在東方的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Houghton, Boston, 1926) 來代替，因爲泰丹內書中關於中國方面的材料，也都是從這兩本書裏得來的。一九〇五的美日秘密協定，也可以從鄧奈特的另一專著「羅斯福與日俄戰爭」(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Doubleday, New York, 1925) 頁一一二至一一四中把密約原文查出來。

（2）處理：或許由於客觀形勢需要本書趕速出版的原故，作者對一些已經得到的材料，也還沒有很好地予以處理。這裡可以指出兩個例子：

【第一例】在第十頁上，談到美國幫助日本侵略琉球一節，作者只揭露了中日談判中和日本勾結，而未能揭發更重要的一點：即美國和日本曾經共同設計一個騙局，來從中國騙走琉球。這個騙局清楚地寫在李鴻章的外部函稿卷三，二十二至二十三頁，七月二十四日與美副領事畢德格面議的節略上。作者在同章註三十七裡曾引過這篇會談節略，但也許沒有仔細地讀，所以竟把更重要的材料忽略了。事情是這樣：日本想奪走琉球，先在條約公文上造證據作口實，騙中國把「琉球水手」寫成「日本屬民」，訂在台事專約三款上，好做日後硬指中國已經公開正式承認琉球歸日本所屬的證明。美國副領事畢德格在會談中，就向李鴻章獻詭計，說什麼「不必提琉球，免致彼此爭較屬國」，然後再用恐嚇手段威脅李鴻章，不依從他的辦法，就難免「決裂交兵」，「各國只能坐視各保商民而已。」李鴻章眞聽了他的鬼話，上了當，日後日本也就眞以此爲憑來狡辯。作者倘能把美國這一個無恥行動，也揭發在讀者面前，一定會使讀者更加深對美帝的認識和仇恨！

【第二例】在第十九頁上，作者敘述美國在義和團運動中的侵略行爲時寫道：

……緊接着又向清廷表示扶助政府鎮壓革命的決心，七月二十三日美總統覆清政府國書：

「美國派兵在中國登岸願爲援衛使館……知中國「亂匪」騷擾，並非貴國朝庭祖縱……敝國樂爲貴國効勞。」

對中國反動統治者表示多麼親切！對中國人民却又是如何地仇恨！

從作者的敘述和李鴻章電稿的删引上，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借重「敝國樂爲貴國效勞」這句話來指出美國企圖扶助滿清政府屠殺中國革命人民的事實。但我們仔細對照原文，就會發現作者在删引時未能仔細小心，以致生出斷章取義的毛病來。原文是這樣：

……知中國「亂匪」騷擾，並非貴國祖縱，謹擬辦法，切盼施行……倘蒙允行則此次擾亂之事不難與各國妥商了結，各國如允敝國調停，敝國樂爲貴國效勞。（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二十四頁二上下）

根據此文，加上別的材料，我們可以指出美國在對清廷示惠以取得信任好感，作爲日後在華擴張利益的資本，但決不能引這一段話來證明美國願扶助清庭鎮壓革命。美國有意幫助統治階級來鎮壓人民，雖是事實，但斷章取義地引一段不相關的材料來佐證，後果是很不好的。

第二，附註方面：著書加註的目的有兩個：其一，向讀者表明，書中敘述各節，都有所據而云然，並非杜撰，因而增加全書的說服力。其二，使讀者能準此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給後學以寶貴的指導。所以一部好的研究著作，常是附註連篇，這是很有必要的。像馬克思和列寧的許多學術著作，也都是如此的。

我國學術著作附註的習慣，一直不很好。在一本書裡，往往載着許多寶貴的資料，但因沒有附註，價值就不算大了。劉先生在這本「小册子」裡倒附了這樣多的註，這不能不算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但筆者認爲還可以提兩點意見：

（1）註不够詳：這種情形多得很，就引李文忠公全書作例吧。作者只註明奏摺的名稱，若是電稿就只註「電稿」二字，第幾卷、幾頁、上頁或下頁全未標出。對讀者極不方便。文忠全書電稿不知有幾千個，雖然能依時間先後，慢慢搜出，究竟太費時費事。對很多書的出版處未曾標出，又沒有標明出版日期，這時只出一版的書還無所謂，而一本書出了幾版，倘不予以標出，查起來就極困難，因爲版次既變，頁數也可能完全不同了。對線裝書註明版本更有特殊的必要。把附註標得詳細一些，對作者講，多費不了許多工夫，對讀者則可節省不少時間精力。

（2）註不够多：作者雖然已附了不少註，但還有些地方應該加註而被漏掉。例如頁三十六關於美國退出銀行團的原因，作者的說法和以前流行的

說法大不相同。據筆者所知，後者共有三種：一種是出於威爾遜的道德高尚，不願干涉中國的行政，此種意見不值一駁，暫不必提；一種是威爾遜代表美國工業界利益，不代表銀行界利益，因而退出銀行團；一種是美國資本家感覺當時在中國無利可圖。除開第三說和劉先生意見還比較可能接近外，前兩者却差得太遠。劉先生的說法很合乎情理，若能註明出處，則對迷信威爾遜的道德之流，不啻給以當頭一棒，可以撕破威爾遜的那副慈祥的假面具，這當然更可加深讀者對美帝侵華歷史的認識了。」

以上僅就材料和附註兩方面提出幾點簡單的意見。另外一點關於政策的背景方面，筆者以爲，劉先生敍述的還比較少。研究了解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若不把政策的背景搞清楚，就很難有正確的結論，作者似乎應該再多寫一些，使讀者有一個更深刻的印象。更容易把握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過程。至於有人覺得此書頭緒太亂，筆者也有同感。希望作者修正再版時能多分一些章節，背景再多些，自然就會比現在更有頭緒，更有條理了。

在本文之末應該聲明的，是筆者並不是什麼專家學者，對馬列主義的認識也極膚淺，所以不能對劉先生的大作提出正面的批評，特別是立場觀點和方法方面。筆者只是一個普通讀者，不過，最近有一個機會必須仔細地讀一下本書，並把附註儘可能地和出處校讀一遍，因而有一些意見存在心裡。最近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看到報章雜誌所載美國侵華歷史的文章甚在有些其他的「小冊子」，（除去進步日報由清華大學歷史系主編的美國侵華史專刊和光明日報學術版的一兩篇文章）常常引用劉先生這本書的材料，有的幾乎是全文抄襲或縮寫，覺察出此書在目前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不揣孤陋，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作爲劉先生日後重訂此書時的參考。不妥當和不正確之處，還要請作者和其他先進學者指正。

答覆李光霖先生

李光霖先生肯對拙作「美國侵華簡史」提出批評，我表示熱烈歡迎和感謝。李先生的批評是對的，特別是關于材料來源方面。最初這本小冊子是一九四七年在太行山草成的，當時所能找到的需用書籍，確實極爲有限，後來雖略有增改，仍有若干間接材料沒有能够撤換掉。從這方面看，應該說它是一部陋書。北京解放後，可搜得的史料很多，本可重新修訂，但由于某種客觀原因，一直沒有執筆。李先生文中又指出有兩處史料處理不當，也確係事實，當在修改中注意糾正。至關于附註方面的意見，我想還可以商量。本書其他錯誤一定還有，希望讀者能够嚴格提出批評，倘若能集中更多的意見寫出一部比較合用的美國侵華歷史，對當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將有些好處。

劉大年

訂　正

本刊三卷四期第六十一頁「朝鮮解放後的新文學運動」上欄第一段開首「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應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又，第六十三頁下欄第二十行「從延安亡命歸來後」應爲「亡命延安歸來後」，特此訂正，並向作者致歉。

又，同期第七十七頁「學術簡訊」第一則第四行「五國人民大學」應爲「中國人民大學」。

（上接43頁）說『萬人滅』，是嚴斥了萬國。後世立嗣不許立姊妹之子，各家家譜上至於特別申戒『異姓抱養不書』，不用說，是有關於『萬人滅鄫——』的一類例子而來的。這是反面的證據之二。

恩格斯說到父權社會初期，舅甥之間的親密程度不免依然表現得比父子之間的親密程度爲高。正面的事實，情理上決不會沒有，零碎的事實經驗也有一些，但直接見於文獻紀載的卻幾乎沒有。反面的證據，即對於舅甥間親密程度的限制，使其不發展，使其不因發展而回復到母系時代原有的狀態的一些事實，則中國文獻中並不缺乏。上文舉了兩個，一是關於服制的特殊的，一是舅甥繼承，在所必禁，都是相當有力量的。

㈠ Tacitus. Germania,
㈡ Avunculate,
㈢ L. H. Morgan,
㈣ 溫公書儀。
㈤ 文公家禮。
㈥ 見聶崇義三禮圖引語。
㈦ 答佘正甫書。
㈧ 禮記，檀弓上。
㈨ 即甥；爾雅：姊妹之子曰出。

科學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受了歪曲的亞洲大陸

李四光

在亞洲發育很清楚的弧形山脈或弧形褶皺帶中，有三種弧形構造，分佈很廣，排列的方向有一定的規律；每一種都有它的特色，爲了討論整個亞洲大陸的運動，似乎特別值得注意。

* * * *

山字型弧形構造，由前面弧、反射弧、以及脊柱三部分組成。前面弧向南凸出，它的兩翼各向東北和西北延展，漸漸變更走向，各形成一反射弧，向北凸出，實際上前面弧（亦名正面弧）和反射弧是連續的曲折帶，大致成正弦曲線狀。在前面弧的後面，即北面常常有一條走向南北的直線曲折帶，或軸向南北的脊隆形，這叫作脊柱。脊柱和前面弧之間，往往有一個馬蹄形的區域，叫作中間盾地。

在這兩個曲折帶中，首先有很多斷層；或者因張力而生的，走向與摺軸垂直；或者因扭力而生的，走向與摺軸斜交。還免不了有許多節理和劈理等裂縫和裂紋，而與兩翼扭斷層平行的節理尤其重要。

像這樣的弧形構造，在中國，已經確定了十五六個的存在，即：隴江山字型系、祁呂山字型系、隴海山字型系、淮陽山字型系、淮南弧型、巴康山字型系、康滇山字型系、昆明系山字型、滇東可能還另有一山字型系、黔西山字型、廣西山字型系、湘南系山字型、贛南系山字型、閩西系山字型、粵北系山字型、臨安系山字型。

* * *

向東南凸出的邊緣弧——這些無脊柱的弧形，都分佈在亞洲大陸東部的邊緣，大致的，但是不完全的，與太平洋的西岸平行。這些弧分成三列：最外一行是一羣念珠狀的島嶼，千島羣島成一弧，日本本州成一弧，雖然這一個弧不好，因爲中間折斷；琉球羣島成一弧，中間一列，由所謂通古斯弧、高麗弧、閩南弧構成；最內一列，還由大興安嶺、燕然山脈、太行——看山弧，雪峯——苗山弧（貴州東南）構成。

* * *

向西或西南凸出的邊緣弧形——這一類弧形只發生在亞洲大陸的南部，瀕印度洋方面，從西藏、青海、祁連山，經過西康、滇西、緬甸，一直到安達門、尾科巴、印尼羣島、都屬於這一個弧形構造的範圍。

* * *

我的認識和解釋，上面所說三種弧形的方式是這樣的：

第一、我們要知道兩系或兩系以上的構造型式的各部分，在一個地域裏，同時或先後發育是可能的，在那種混雜的狀況之下，我們必須依據重接、斜接、反接、截接四種交接的方式，把兩個或兩個以上構造型式組成的成份分析清楚。

第二、我們必須依據各個構造成分發展的次序，來定它的構造等級，因爲等級不同，一個因張力而發生的斷層，可能發生在一個地域裏壓力作用的方向，譬如此類的實例很多。

第三、構造型式的鑑定，必須有力學上或者實驗上的根據，關於山字型發生，用泥和紙漿調和，敷在平板上，讓它緩緩的流動，就可以表示出來。將板傾斜，利用重力的分力，或者使板旋轉，利用離心力，都得到類似的結果。用鉛粉調和纖維漿，敷在球面上加以轉動，在鉛粉纖維膜滚動不勻的部分，也發生山字型構造。

關於各種張性和扭性斷層的發生，也可用比較乾的泥塊加以適當的壓力，使張力和扭力表示出來。

根據各種實驗的結果和亞洲各種構造型式，我們現在知道了：至少從古生代以來，歐亞大陸的北部和中部，整個的同時又是局部的往南推動。另外還有一個趨向，就是亞洲的東部，尤其是東南部，向西也就是向印度洋方面推動。向太平洋凸出的邊緣弧形，以及和那些弧形有關的新華夏，以及中華夏摺皺。大義山式祭山式撲斷層等，無疑

的是出自亞洲大陸對太平洋底盤所施的壓力；美國的地質人們，特別如張伯倫、維理士等，大都主張壓力來自太平洋方面，而我們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壓力起源於亞洲向南的運動的。

如果地球因爲冷縮，或者因爲重物質向深處集中的原因而增加旋轉速率，到相當的程度，在整個地球的扁度不夠的時候，就可以發生大陸向赤道方面推動的趨向。同時也應該發生一種趨向，讓全世界的大陸向西滑動。但是各大陸構成的質料，不完全相同，各部分粘在地上聯繫不完全一致，可能這一塊粘住，那一塊滑動了，於是在滑動較大部分的西邊，就不免發生向西凸出的弧形山脈。在東南亞的西面，波斯的西面，印度洋的西部，東南歐西面臨海的邊緣，雖然都有這一類的山脈，但是要和南北美洲西岸的山脈比較，那就相差太遠。看起來大西洋是比東非洲大破裂帶更大的一個裂口。

這樣，我們的結論是：隨着地球旋轉加快，亞洲站住了，東非、西歐破裂了，美洲落伍了。

[illegible]（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報）

美國對華侵略的作風和路綫

邵循正

初期的中美直接貿易是微小不足道的。美國根本沒有貨物來換取中國的茶和絲，但是它採取了「轉運貿易」的方式，向歐洲再向印度三番四次的出貨進貨來到廣州。

轉運別人的貨物以外，他很快的又轉運落毒品—土耳其和印度的鴉片。鴉片戰爭實際上中國也是對美國煙販子作戰的。美國一面猾兒，一面却又能置身事外。就鴉片貿易以及一般對華關係上說，它都不備是英國的隨員而已。

在鴉片戰爭前後，英美兩國在對華貿易上已經有了矛盾的跡象。美國輸華產品的逐年增加，雖然當時數目依然不大，已經使英國人頭痛，却也使美國人相信前途是大有可爲的。所以他們不但堅決要分取英國人掠奪來的果實，而且一開頭就希望要得到比英國人「更要有利的通商條件」。望廈條約給了美國對華侵略的基礎，同時也給它對英競爭的保障。

更重要的，美國一開頭就相信政治和經濟的侵略，是不可分開的。英國的佔奪香港，使它由羨慕而妒忌，鴉片戰爭之後十幾年中，照各樣各式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提議所表示的，美國的政策，是集中在如何取得相當於香港的根據地。（德涅特，美國人在東亞，頁一八二）因此當時種種在中國沿海侵占的計劃，特別是一八四七——九年對台灣的接連調查，一八五三年的侵略琉球，一八五四年吞併琉球的擬議（同上，頁二七四）以及吞併台灣的討論，都是嚴重破壞中國的主權和宗主權的。我們不得不說首先要宰割中國鄰邦，特別是當時和中國都有特殊關係的鄰邦（琉球、朝鮮）者是美國，不是別人。

* * * *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它一面猾兒，一面說遵守中立。天津條約裏而美國調處中外糾紛的條款，是它得意之作。從此它就以友人的姿態出現於中國利權爭奪的場所上了。另一方面它已經注意到以文化教育箝制中國。

我們回顧望廈條約之後十幾年中，美國對華貿易一直在增加，它比英國更有把握地認爲中國必將成爲它的市場。但是接續而來的美國南北戰爭給中美貿易的發展以嚴重的打擊。一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中美貿易沒有什麼進展，而且數量上雖然上升，實值反而降落。

至於列強對華工業投資的競爭，在六十年代已經表現得很尖銳，鐵路電線權利的爭奪，美國也不後人。

所以一八六零年之後，幾十年中，美國對華政策之顯著的成功，是在各方面有了事先的佈置，又使中國人深信不疑。就整個遠東局勢說，它一貫的政策，是培植日本以加深中日的矛盾，支持日本以抵抗沙俄勢力的南下，通過日本以侵略朝鮮以及中國的東北和台灣。

從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都參加了宰割中國的競爭。美帝國主義，在瓜分中國的筵席上，是晚到的客人，沒有座位，它連勢力範圍都沒有。但是它和英國同看着席捲中國的遠景。英美帝國主義，基本上是有矛盾的，但此時正好合作，而且一八九九年初在華爭奪利權的英美資本家集團已具有默契，所以不久英國就同意美國提出所謂門戶開放的口號，出了一番大風頭，接着又提出所謂領土完整的原則。

美國不但在政治上乘人之危，在經濟上它還不動聲色地割掉中國人民的命脈。海約翰和柔克義（W.W. Rockhill）力阻法俄提高中國關稅以便償還庚子賠款的提議，爲了怕賠款的負担被中國轉嫁到美國貨物上面去。結果協賠的重負，就都落在中國農民身上，這說明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一意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的。

* * * *

從義和團運動經過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美國是站在反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它支持清室、袁世凱，以及其他北洋軍閥。它經常喊的除了「門戶開放」「領土完整」之外，還有「行政完整」「強有力的政府」「統一」等口號，這都是它所支持的反動統治者必須有的條件。

清末民初的中美關係，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是金元外交的活躍，一方面是攻心政策的推行。一面我們看到東北鐵路計劃，湖廣借款，銀行團；一面看到退還庚款，派送留美學生等等。這個雙重的政策，到民國初年而變本加厲；特別是在威爾遜總統時期，也就是芮恩施（Paul S. Reinsch）使華時期，可以看得更清楚。

根據公開的材料和芮恩施的記載，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六夏間袁世凱身死之前，中美借款合同共有五個。

美國固然是一貫支持袁世凱，不管是帝制失敗之後的袁世凱。但是當時美帝國主義還沒有發展到杜魯門主義的階段，袁政府最後兩三個月，命運已經明顯注定，美帝國主義不見得肯隨便給他大筆錢花。美國三番四次受日本排擠，一九一七年底就有藍辛石井協定，暫屈求伸，出賣中國，得到一時的妥協，跟着「芝加哥大陸銀行」和「太平洋拓殖公司」就又肆行活動了。這是五四運動以前美國的金元外交。

至於攻心政策呢？芮恩施說得非常清楚。他來華之前，威爾遜和他談話，所着重的都是教育和「政治楷模」「道德提倡」等問題，而不是金融和商業（使華記，頁六十三）。因此他在華的活動範圍，是可以注意的。簡單地說，知識分子是他聯絡的對象。攻心政策就是金元外交的另一方面，沒有人比他說得更清楚。

* * *

這位「特別朋友」拿什麼酬報中國人民呢？除了組織新銀行團活動之外，幾年之中，他在支持直系軍閥以壓迫一切革命或是進步的力量。孫中山就是他始終最討厭的人物。美公使對陳炯明却很重視，因爲和吳佩孚多少有聯系。一九二一年底他相信孫陳會分裂，曹吳也會分裂，然後吳與陳聯合；但是吳佩孚却告訴美國人「陳炯明靠不住」（美國對外關係，一九二一，頁三一七）。迷信武力統一的吳佩孚，是最合美國口味的人。第一次直奉戰爭，美國和吳佩孚確有勾結。至於一九二三年支持曹錕賄選的事件，也可以確信無疑的。

一九二四年直奉二次戰爭。九月初旬，日本告訴美國，報上所傳「美助吳、日助張」不足信，日本願守中立。（同書，一九二四，頁三七三）這等於說日本要求美國不再支持吳佩孚。戰爭結果由於馮玉祥的十月北京政變，直系瓦解，十一月底，北京出現了奉皖兩系同意的段祺瑞執政府。

其實此時美國所切盼於段祺瑞者，不是反日，而是反蘇反共。執政府成立之前，美國只怕段祺瑞張作霖和當時聯蘇聯共的國民黨合作。不久段祺瑞就確切對美表示，「及對蘇維埃的活動」，美國就決定給他相當的支持。接着，十一月底，張作霖也表示堅決反蘇（頁四〇三），而且還獻一條妙計給美國，他說，也許段和他以及其他中國領袖擋不住人民的運動，列强最好先有所舉動（頁四〇三）。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日等帝國主義者，就放心了。日本支持執政府當然更爲有力。美國對執政府，仍然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只是督促他履行條約義務，壓迫人民運動。這樣子經過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就做了所有帝國主義者壓迫人民的工具。

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袁世凱、曹錕、吳佩孚的破壞而完全失敗。爲了阻遏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潮流，以達到獨吞中國的目的，美國不久就另找到蔣介石，培植了一個更澈底反人民的政權。但是一百多年來美國的對華侵略政策，及其所豢養的反動政權，終於由於中國人民長期堅決的反抗鬥爭，而不得不逐一破產！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二日進步日報「史學週刊」）

論民歌

何其芳

我們平常所說民間文學，主要是農民的文學。它或者以口頭的方式創作了出來，並以口頭的方式流傳和保存於農民中間——民歌、民間故事和一部分民間戲劇大概是這樣。我們對於民間文學，如果不是指它的某些部分，而是概括全體來說，當然首先應該充分肯定它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的種種優越的地方。

和民間戲劇比較起來，我覺得民歌又是具有更濃厚的勞動人民的特點，更直接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願望和要求的。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半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在民歌中是有着直接表現的。雖然數量不多，各個地方都可以搜集到描寫佃農的生活的作品。

農民在過去的社會裏被剝奪了掌握文化知識的可能，又那樣緊緊地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或者他們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而他們對於現實的觀察和理解竟達到如此清醒的程度，創作出這樣一些詩歌來，的確是十分值得珍視的。

有人說：「歌謠是婦女的文學與婦女的問題」。這種說法自然是片面的，不妥當的。只是因爲封建社會和半封建社會裏，勞動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比較起來，地位更低，痛苦更多，所以描寫婦女生活的民歌數量不少，而且往往很動人，在整個民歌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封建階級爲婦女們特別準備了一條精神鎖鍊，那就是「夫爲妻綱」或者說「出嫁從夫」。然而，民歌中出現的勞動婦女却常常是不受這些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教條的束縛的。

很多地方搜集到的民歌，都是情歌佔絕大多數。因此，對於情歌的估價是和對於整個民歌的估價很有關係的。在有些地區，特別在有些少數民族當中，情歌似乎主要是青年男女比較自由的互相愛悅的表現。從那些情歌，我們可以想到那是封建主義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但在另外一些更接近內地的地區，情歌却許多都是爲當時當地的社會所不能容許的戀愛的表白，從這些情歌，我們又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對於這種壓迫的反抗。

舊社會裏的不合法的戀愛，不僅是一種必然的產物，也不僅是一種反抗的表現；而且必須知道，這種反抗的結果必然是不幸的，並不能眞正解決問題的。（下轉46頁）

一九五〇年國內期刊重要學術論文索引

本刊資料室

題目	作者	登載刊物	卷期數
哲學			
羅素——哲學上的曖昧主義者	M·康弗士	新華月報	一·五
論邏輯思惟底基本規律	斯特羅果維契	新華月報	一·六
「反杜林論」附註	恩格斯	新華月報	二·二
辯證法	恩格斯	新華月報	二·五
讀書札記	恩格斯	新華月報	二·六
新理學底自我檢討	馮友蘭	新華月報	三·一
反駁唯心論	艾思奇	學習	一·六
論質、屬性、質變諸問題	馬特	新中華	一三·三
論中國的哲學思想	彼德羅夫	新中華	一三·一〇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革命性	華崗	新文萃	二·一二
關於哲學史的幾個基本問題	馬特	新中華	一三·二〇
關於幾個哲學問題	艾思奇	新建設	三·一
從「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說到新舊哲學的區別	馮友蘭	新建設	三·三
列斯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	蘇·F·康士坦丁諾夫	翻譯月刊	二·一—三
羅素與偽自由	英·J·路易士	翻譯月刊	二·三—四
關於「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蘇·M·買克	翻譯月刊	二·五—六
恩格斯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批判	德·萱格爾	翻譯月刊	二·五
史學			
中國奴隸社會	郭沫若	新華月報	二·三
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問題	葉蠖生	學習	三·二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	翦伯贊	學習	三·四
奴隸社會意識形態之研究	周谷城	新中華	一三·一二、一五
關於研究歷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徐特立	新建設	一·一〇
關於學習及寫社會發展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徐特立	新建設	二·五
魏晉思想之歷史背景與階級根源	侯外廬	新建設	二·五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翦伯贊	新建設	三·二
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關係	周一良	新建設	三·三
「從古猿到現代人」的商榷	夏作銘	進步青年	二二三
答夏作銘先生	裴文中	進步青年	二二三
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范文瀾	新文萃	二·九
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學習方法	胡華	人民大學校刊	二
經濟			
論凱恩斯學說	美·W·Z福斯特	新華月報	一·四
價值和價值法則	于光遠	學習	二·二
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	王惠德	學習	二·六—七
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律	沈志遠	學習	二·一二
紙幣購買力的幾個問題	陶大鏞	學習	二·九
從馬列的地租論說到土地改革的意義	沈志遠	學習	二·九
土地改革與國家工業化	石礎	學習	二·一一
論共同綱領經濟政策的過渡性	蔣學模	新中華	一三·一
馬列主義與新民主社會經濟形態	王亞南	新中華	一三·六
馬克思主義的恐慌學說	郭大力	新中華	一三·六
馬克思與工人運動	陶大鏞	新中華	一三·九

馬克思主義恐慌學說的發展	郭大力	新中華	一三·九
舊中國農村土地關係與地租剝削	張魚	新中華	一三·一二
蘇聯的貨幣制度	周伯棣	新中華	一三·一二
土地改革的意義及其對於工商業的影響	王亞南	新中華	一三·一八
工商業政策	薛暮橋	新建設	一·一二
凱恩斯主義的兩個主要變種	福斯特	新建設	一·一〇
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與方法	王學文	新建設	三·一
馬克思的週期恐慌學說	樊弘	新建設	三·一
現階段土地改革的理論分析	朱劍農	新建設	三·二
土地改革——我國新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	吳冷西	新觀察	一·二
土地改革中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問題	鄭新如	新觀察	一·三—四
工業與農業的平衡關係	C·菲利德	國際經濟	一二
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法則	K·奧斯特洛維加諾夫	國際經濟	一三
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問題	K·奧斯特洛維加諾夫	國際經濟	一四
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尖銳化	覺古爾諾夫	中蘇友好	二·三
捐稅與生產	伍丹戈	經濟周報	一〇·三—四
論人民民主國家計劃經濟的基礎	明茲	經濟周報	一〇·七
國營商業和私營商業的關係	王達夫	經濟周報	一〇·一一
我國新稅制的考察	周伯棣	經濟周報	一〇·一二
新民主主義金融體系的基本特點	劉光第	經濟周報	一〇·一七
學習「土地改革法」	周有光	經濟周報	一一·二—三
三種經濟的比較	陶大鏞	經濟周報	一一·五
新民主主義的工資制度	丁忱	經濟周報	一一·六
解放區金融發展簡史	孟憲章	經濟周報	一一·一二
私營金融業的聯營問題	壽進文	經濟周報	一一·一三
關於起草新公司法的問題	千家駒	經濟周報	一一·一八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	英·J·溫特尼茲	翻譯月刊	二·三
中國的經濟問題	蘇·阿斯塔夫也夫	翻譯月刊	二·六
農業生產的基本政策	薛暮橋	中國農報	一·二
全國土地利用的方針和任務	楊顯東	中國農報	一·二
政治			
馬列主義國家學說的幾個基本觀點	懷湘	學習	二·八
預見已成為事實	胡繩	學習	一·五
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	胡華	學習	二·二
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文獻	鄭昌	學習	二·八
論人民民主制度執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職務	L·巴蘭諾夫	新中華	一三·五
「共產黨宣言」與其世界歷史意義	A·列昂捷也夫	新中華	一三·六—八
論人民民主國家階級與政黨	法爾別洛夫	新中華	一三·九—一〇
三十年間的革命鬥爭	盧文迪	新中華	一三·一〇
學習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經驗	平心	新中華	一三·一九、二〇、二三
人民陣線與人民民主	福斯特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九二
美國政體的特性與現政府的軍事冒險性	張志讓	新建設	三·三
論中國人民的統一	嚴景耀	新建設	三·三
美帝的世界擴張政策與聯合國	梁純夫	新建設	三·三
論在羣衆中的政治工作	維·庫洛耶多夫	人民周報	三
人民民主國家的階級本質	孟科夫斯基	時代	一〇·三
人民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	孟科夫斯基	時代	一〇·五
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政府	蘇·柯托克	翻月刊	二·六
法律			
新民法的基本原則的探討	陸季蕃	新中華	一三·一六
人民民主刑法的基本問題	李建釗	新中華	一三·一九
人民民主國家的檢察制度	陳啓育	新中華	一三·二二
論人民法庭	李建釗	新中華	一三·二三
我國婚姻法與蘇聯婚姻法的比較觀	曹樹經	新建設	二·六
中國法律變遷史略與新法學觀	楊紹萱	新建設	二·六
肅清舊法學底影響	何思敬	新建設	三·一
論人民民主國家婚姻—家庭法	斯維得洛夫	新中國婦女	一〇—一一
教育·學習			
新中國的教育和文化	陸定一	新華月報	二·一
關於馬列主義基礎課程的教學方法問題	李卓然	新華月報	二·六
關於學習	陳伯達	學習	二·一〇

學習—思想領域的解放戰爭	艾思奇	學習	二·一
學習馬克思的科學態度	王子野	學習	二·四
論共產主義教育	M·I·加里寧	世界知識	二一·一七
大學工學院的課程改革	錢偉長	新建設	一·九
社會學系怎樣改造	費孝通	新建設	二·二
理論與實際一致和課程改革	費孝通	新建設	二·七
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	錢俊瑞	人民教育	一·一—二
論國民公德	徐特立	人民教育	一·三—五
試論舊有小學的特質	吳研因	人民教育	一·三
對於中國近五十年教育思想進展的體會	馮友蘭	人民教育	一·四
關於「爲學術而學術的學風」	柳湜	人民教育	一·四
杜威批判引論	曹孚	人民教育	一·六—二·一
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	A·C·馬卡倫柯	人民教育	一·六
對於過去教育上的經驗主義的批判	李之欽	人民教育	二·二
語言·文藝			
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領導思想問題	李何林	新華月報	二·三
論「五四」以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許傑	新中華	一三·九
從蘇聯文藝問題所得到的啓示和教訓	王西彥	新中華	一三·二一
高爾基論文學批評	徐中玉	展望	五·二二
語文學習三階段	宋雲彬	學習	二·一〇
中國語言學的新方向	羅常培	新建設	一·一二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試論	丁易	新建設	一·一〇
美術與戲劇	王朝聞	新建設	二·一一
新中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	何幹之	新建設	三·一
關於中國原始藝術的發展	常任俠	新建設	三·二
論文藝上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王淑明	新建設	三·三
發展愛國主義的人民新戲曲	周巍峙	人民周報	一·一
新中國的文化科學	N·努赤金	新觀察	一·二
關於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	斯大林	時代	一〇·一四—一五
關於語言學的幾個問題	斯大林	時代	一〇·一六
論語言	高爾基	時代	一〇·一七

論文學批評底任務	法捷耶夫	中蘇友好	二·一
論兒童文學底當前情況及其發展的幾個問題	K·西蒙諾夫	中蘇友好	二·一
加里寧論戲劇	И·艾文托夫	中蘇友好	二·七
斯大林與文藝	葉高林	蘇聯知識	一·五
關於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	茅盾	人民文學	二·一
談工人詩歌	艾青	人民文學	二·一
鼓詞與新詩	老舍	人民文學	二·二
加里寧論文藝	M·波格洛夫	人民文學	二·二
論中國的新文學	蘇·費德林	人民文學	二·三
列寧主義與藝術	蘇·G·布羅甫曼	人民文學	二·四
論民歌	何其芳	人民文學	三·一
社會主義的生產文化	聶莫夫	蘇聯介紹	五月號
蘇聯的民間藝術創作	托米斯	蘇聯介紹	七、八月號
談劇本創作的幾個問題	光未然	文藝報	一·八
關於美感問題	朱光潛	文藝報	一·八
論文學批評	法捷耶夫	文藝報	一·九
談羣衆創作	趙樹理	文藝報	一·一〇
論美與藝術	黃藥眠	文藝報	一·一二
論文學的民族性	伯林斯基	文藝報	二·一
談大衆化和舊形式	艾青	文藝報	二·二
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陳涌	文藝報	二·三
論個性與民族性	伯林斯基	文藝報	二·五
談詩歌的主題與表現	勞辛	文藝報	二·一一
我們已經達到的和還沒有達到的成就	胡喬木	文藝報	三·一
思想的才能和文學的才能	雪峯	文藝報	三·一
創作與生活	丁玲	文藝報	三·一
論文藝創作與政策和任務相結合	荃麟	文藝報	三·一
改造中國畫的基本問題	李樺	人民美術	一
精確描寫不等於現實主義	王朝聞	人民美術	三
現實主義是進步藝術的創作方法	門兒黑·尼庞雪溫	人民美術	四
工藝美術的提高和普及	王遜	人民美術	五
斯大林論民俗學	蘇·E·瑪卡洛瓦	翻譯月刊	二·一

文學與世界觀	H·藏原惟人	翻譯月刊	二·三
文學與政治	蘇·列蘇乞夫斯基	翻譯月刊	二·五
鬥爭的新階段與藝術家的任務	H·德田球一	翻譯月刊	三·四
論列夫·托爾斯泰的創作	蘇·S·貝奇科夫	翻譯月刊	三·五
巴爾扎克作品的革命性	瑞士·瑪利·波爾	翻譯月刊	三·六
關於翻譯幾個問題	張錫儔	翻譯通報	一·一
我們這一時代的偉大語言	Д·扎斯拉夫斯基	翻譯通報	一·三
論魯迅的翻譯	胡仲持	翻譯通報	一·四
介紹泰特勒的翻譯理論	羅書肆	翻譯通報	一·五

一般自然科學

關於巴甫洛夫生理學說各項問題的決定		新華月報	二·六
數學與物理學	恩格斯	新華月報	三·一
米丘林生物學的哲學基礎	基溫科	新中華	一三·一一
斯大林論科學與實踐的統一	托勃切艾夫	新中華	一三·一九
科學和宗教	蘇·Б·А·伯格達諾夫	新建設	三·二
關於生物學	恩格斯	新建設	三·三—四
近代科學推翻了馬爾薩斯人口論	竺可楨	觀察	六·一二
米丘林選種學	伐龍婆	時代	一〇·一一
人的起源	M·魯利謝茲基	中蘇友好	一·一
論米丘林生物學的辯證唯物論基礎	蘇·B·基汶科	翻譯月刊	二·四
馬克思主義對自然科學家之價值	英·J·B·海斯坦德	翻譯月刊	二·五
科學之地位與任務	英·貝納爾	翻譯月刊	二·五
中國科學的新方向	竺可楨	科學通報	一·二
蘇聯數學家對數學上著名問題的貢獻	華羅庚	科學通報	一·二
列寧與近代物理學	瓦維洛夫	科學通報	一·三
新中國的科學研究	李四光	科學通報	一·五
談數學在科學分類中的地位	關肇直	科學通報	一·五
科學研究和大學教育	竺可楨	科學通報	一·七

本刊三卷三期要目

粉碎美帝侵略，爭取持久和平！（社論）

專著

美國政體的特性與現政府的軍事冒險性　張志讓
論腐朽的垂死的美帝國主義　沈志遠
美帝的世界擴張政策與聯合國　梁純夫
美帝發動侵朝戰爭後的西歐局勢　范承祥
論中國人民的統一　嚴景耀
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關係　周一良
從甲午中日戰爭說起　宋雲彬
從「新理學底自我檢討」說到新舊哲學底區別　馮友蘭
論文藝上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王淑明
美術遺產漫談　徐悲鴻
帝國主義與侵略戰爭（座談記錄）　陳伯達等

譯文

關於生物學（上）　恩格斯原著　曹葆華、于光遠合譯
論蘇維埃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蘇H·關洛夫著　仲英譯
評吳藻溪編近代合作思想史（書評）　周明星

本刊三卷四期要目

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高潮（新年筆談）
張奚若　華崗　林漢達　王學文　周谷城　丁易　李達
林礪儒　華羅庚　徐悲鴻　宋雲彬　周建人　施復亮　孫伏園
謝覺哉　陶孟和　馮友蘭　艾思奇　沈體蘭　湯用彤　羅常培

專著

新民主主義經濟第一年　孫曉邨
論人民經濟的價值法則　許滌新
中國文化之生成及其發展　裴文中
韓非思想探微　楊榮國
論三國時代劉孫聯合抗曹的得失　何幹之
五十年前台灣人民抗日游擊戰爭　繆楚黃
語言學家的新任務　季羨林
關於書的幾個問題　向達

譯文

「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序　陳其人譯
朝鮮解放後的新文學運動　陳秋帆譯
關於生物學（下）　曹葆華、于光遠合譯
評一本美帝的世界歷史教科書（書評）　謝璉造

學術簡訊

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

中央文學研究所已於上月二日在京正式成立，並於八日舉行了第一次開學典禮。

該所係中央文化部與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聯合創辦，由丁玲、張天翼分任正副主任。現已有研究員五十一人，其中有四十二人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工作的，半數以上的人有較長的文學工作歷史並發表過比較成功的作品，如「呂梁英雄」的作者馬烽，「寶山參軍」的作者王血波，「平原烈火」的作者徐光耀。研究員中有六個工人和農民作家，其中有「紅花還得綠葉扶」的作者張德裕，「我的老婆」的作者董廼相，貧農出身的女工吳長英，近四十歲的老工人趙堅，作過鐵衛員的曹桂梅，農民出身的楊潤身。

該所研究員研究期限爲兩年。研究採取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方針，第一年主要進行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及中外文學名著的研究，並學習國家建設基本政策；創作方面，本年上半年只進行學習，下半年組織一部分人下鄉或下廠，一部分人專門創作。

新史學研究會編輯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最近成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由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鄭振鐸、陳垣、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和白壽彝等十一人担任編委，並由徐特立、范文瀾主持。叢刊所包括的範圍：自鴉片戰爭起到五四運動止，而將此段歷史資料分爲十二部分：即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東捻西捻、回變、中日戰爭、中法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北洋軍閥、五四運動。

該叢刊將交由上海神州國光社陸續出版，預定一九五一年底可全部脫稿付印。現在第九種義和團正在付印中，不日即可問世。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週年 華東展覽革命文物

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和上海市立歷史博物館等機關爲了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週年，於上月二十日起在上海舉行革命文物展覽會。此次展出以存留的文物、圖畫、彩繪、模型等爲中心。展覽會計分五個部分：一、第一次鴉片戰爭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太平天國前期（金田起義至建都天京），三、太平天國後期（建都天京以後的政績和苦戰），四、洋槍隊的反動陰謀和暴行，五、太平天國以後的帝國主義侵略。展覽會地點在上海跑馬廳。

上海生物學會 舉行第四屆年會

上海生物學會於一月十四日在楓林橋中國科學院大禮堂舉行第四屆年會，檢討過去一年工作，並討論今後會務的進展。上午有秉志、王志稼、盧于道、張孟聞、王家楫、劉咸、朱洗、羅宗洛諸先生的學術演講，下午四時，並放映生物科學電影。

一九五〇年蘇聯學術界兩大討論 「語言學」和「生理學」

最近數年來，蘇聯學術界舉行了幾次非常重要的學術討論會，這些討論在蘇聯科學的發展上都具有巨大的意義，它們清算了思想戰線上的各種錯誤和缺點，加速了科學的發展，鞏固了科學與生活的聯系。去年——一九五〇年，蘇聯學術界又舉行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討論：關於語言學的發展，以及在巴甫洛夫院士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生理學的討論。語言學家的討論檢討了蘇維埃語言學發展的一切根本問題，如語言與上層建築、語言與階級、修辭學與文法、語言的階級性發展和原素論（四個原素及原素分析法）等問題。斯大林同志發表了兩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章：「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對科學作出了卓越的創造的貢獻，標誌着語言學發展上的一個新階段。

關於發展巴甫洛夫科學遺產的問題，蘇聯科學院與蘇聯醫藥科學院聯合舉行了會議，展開了全面的和批評性的討論。會議指出了巴甫洛夫科學遺產的重大意義不僅是對於生理學和醫學的意義，還有對於生物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的意義；巴甫洛夫關於高等神經活動的學說和條件反射的理論，乃是辯證唯物論認識論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基礎。會議並確定：儘管在整個來說，蘇維埃生理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然而發展巴甫洛夫思想的事業，却不是一向走着正確的道路。

蘇聯文學出版事業計劃 一九五一年

在蘇聯，文學作品的出版，年復一年地增加着。去年僅國家文學出版局就出版了四千二百萬冊，比一九四九年多一倍半，比戰前一九四〇年多十二倍。

個別的俄國古典作家的著作，現代蘇聯作家的著作，以及世界古典文學家的著作，都出版了很多。一九五〇年開始出版二十種全集，其中九種已經完成。這些是普希金、果戈里、莎士比亞、雪萊、莫泊桑、契訶夫、謝夫琴科、杜布羅留包夫、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等全集。

國家出版局在一九五一年內，預定將出版新的托爾斯泰全集，繼續出版高爾基全集，並計劃出巴爾扎克、馬丁・安特遜・尼克索和彼多斐等外國作家的全集。此外尙有數十種蘇聯作家的著作。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五十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新觀察

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目錄

偉大的友誼（封面畫）……丁聰
帝國主義陣營亂哄哄……繁純夫
美國獨佔資本是英國的眞正主人……王佐良
時事漫談 從「打背包」到「心理的新聞檢查」……林淡秋
一幅崩潰的圖景（詩與畫）……袁水拍詩、丁聰畫
中國人民的聲音第一次響澈聯合國……洛人
第一師範時代的毛主席……周世釗
淮陰八十二烈士墓碑記……李一氓
華爾和他的「洋槍隊」……黃苗子
如此美國 「生命中最好的年月」……吳組緗
報導・通訊
平壤被炸目擊記……徐遲
內蒙風光……蔡美彪
廣州人民的控訴……友秋
文學・藝術・生活
從邊疆到北京（詩）……邵燕祥
北京的春節（北京介紹）……老舍
曹桂梅（新人新事）……蕭鳳
探鑛（科學生活）……馬師
千山萬水（畫）……邵宇
愛國詩人杜甫傳（二）……馮至作、光宇繪
文化簡報
畫刊六幅……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發行者
各地新華書店

每冊售價	2,400元
預訂三月	14,400元
預訂半年	26,400元
預訂全年	51,900元

新建設 月刊
第三卷・第五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上海辦事處：上海延安東路中匯大樓六一八室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四千元

訂閱價目：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二千八百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三千二百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千元